

炎黄春秋

第 **6** 期
2011年

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

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

朱永嘉：“评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记杜润生的三次谈话

“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

目 录

春秋笔

1 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沈志华 董 洁

12 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林蕴晖

求实篇

17 解读“韬光养晦”战略子 明

21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考察王也扬

亲历记

26 记杜润生的三次谈话张北英

29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朱永嘉口述 金光耀整理

36 陶铸主政时的中宣部郝怀明

39 耀邦同志向我了解西欧情况宋万国

41 政治与学术：一篇文章的遭遇苏双碧

44 一位党史教员在百家争鸣后的遭遇张寄谦

一家言

48 信访制度存废议邵燕祥

50 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刘泽华

往事录

56 “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 (附:方徨信)
.....钱 江

61 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纪实平乃彬

66 “穷棒子社”白薯亩产之谜刘一皋

70 小说《刘志丹》的三次被禁李 原

72 《大公报》记者笔下的苏军日侨和内战张 刃

人物志

77 吴满有的两段人生朱鸿召

81 夏衍的一次仗义执言方小宁

82 张学良在物资、财政上对陕北红军的援助张友坤

品书斋

85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序程兆奇

争鸣录

87 我对反右起因的解释朱 正

古今谈

90 “做官发财”有传统张绪山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赵德润 保育钧 郭道晖 资中筠

钟沛璋 凌云 展 江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副 总 编 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社 长 助 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经 理: 李 晨

副 总 经 理 兼 网 络 总 监: 张晓鸥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吴 思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奕赵律师事務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 68525374 办公室: 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8.00元

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

○ 沈志华 董洁

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朝鲜战争后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朝鲜政治外交史,其次是朝鲜经济发展的问题。尽管意识到外援尤其是中、苏的经济援助,是朝鲜战后经济重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资料短缺,鲜有针对经济援助的专著问世。研究战后中国与朝鲜经济关系的成果并不多见。

1953年8月5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制定了重建工作的规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阶段是准备时期,计划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执行三年计划(1954-1956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阶段实现五年计划(1957-1961年),建立工业化的基础。本文将梳理1953-1960年中国援助朝鲜的过程。

准备时期(1953-1954)

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字,金日成首先想到的寻求经济援助的对象是苏联。1953年7月31日,金日成交给苏联使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造成的损失情况以及恢复工业所需要的苏联的帮助。同一天,朝鲜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份照会,请求苏联派遣62名专家到朝鲜,帮助制订经济恢复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计任务的计划。照会详细列举了所需专家的清单和恢复项目的主要参数,并强调说,聘请苏联专家“十分必要,因为朝鲜人自己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8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决定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援助,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金日成得到消息后,立即在8月5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六中全会宣布:“苏联政府已经通知,决定

给我们10亿卢布的援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政府也都做出了关于提供援助的决定。在这些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帮助朝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群众性运动。”

莫斯科的热情并没有朝鲜人期望和宣传的那么高。早在停战协定签字前,苏联政府就要求在朝专家向朝鲜人建议,“在确定工业恢复计划时,要以朝鲜国民经济最必要的需求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恢复的内部潜力作为出发点”。但8月7日苏联使馆报告,根据情报,朝鲜政府的打算是请求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对恢复其遭到破坏的工业企业提供全面援助,而苏联要承担的是“几乎全部被破坏的大型企业”。具体办法是苏方提供工程技术人员、设备和材料,朝方则负责当地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从朝鲜的现有计划看,其“主要考虑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潜力,而是指望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获得最大援助”。

金日成于9月初访苏,经过协商,苏朝政府于9月19日签订了援助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6亿用于工业企业的修复扩建,如金策制铁所、城津炼钢厂、南浦冶炼厂、水丰发电厂、兴南肥料厂、平壤纺织厂和一部分电气铁路等;4亿用于新建项目,如平壤丝织厂、沙里院拖拉机修理厂、平壤红十字中央医院、中央广播电台等。苏方负责设计方案、施工图纸、设备供应和安装及培训朝方技术干部。此外,对于此前苏联给予朝鲜的2.98亿卢布贷款推迟了归还期,即从1957年起10年内以商品偿付,利息也从原来的2%降为1%。朝鲜在战争期间所欠非贸易付款债务(约0.73亿卢布)被免除50%,其余部分从1957年起两年内归还。对于专项贷款也推迟了还款日期,

缩减了还款数额。这个援助力度未能满足朝鲜的要求。回到平壤后,金日成一方面派商业相李周渊赴东欧各国求援,一方面准备亲自前往中国。

1953年11月李周渊走访了波、捷、匈、罗、保、阿和东德,争取到大批援助。除阿尔巴尼亚只同意提供1.2万吨沥青及布匹外,其余每个国家都答应无偿援建2-5个工业企业,并赠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资。不过,东欧国家在恢复时期对朝鲜的援助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些国家的援助金额总计11.47亿卢布,其中仅东德就占一半(5.45亿),而使用期限则长达10年。到1954年底,所有东欧国家援助实际使用的金额加在一起只有2.02亿卢布。正如匈牙利学者指出的,“平壤对不能够向其提供实质援助的共产党国家建立联系的兴趣不大”,而“这种冷淡经常被证明是相互的”。

然而,金日成在中国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战后中朝关系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志愿军司令部“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绩展厅中,只有一个专门给中国人看的展厅集中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绩,而在其余所有的展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如此等等。在这种氛围下向中国伸手,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

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北京两个星期访问所得,竟然远远超出了在莫斯科的收获。关于对朝鲜的援助,中方提出签署《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根据已经公开的材料,中国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72900亿元(合14.5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4年(1954-1957)期限内,再提供80000亿元(合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0000亿元(合6亿卢布),这些款项将用于供应工业原料、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粮食和其他用品,以及修复铁路和桥梁;在3年(1954-1956)期限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此外,中国

在其他方面给予朝鲜的援助条件,也比苏联优惠的多。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而按照苏联派遣专家的要求,除此之外,朝鲜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每个专家相当于在苏联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休假补贴费、相当于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高等院校),特别是每月要按照专家的技术等级向苏联政府支付2000-4000卢布的原单位损失费。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差旅费。而按照苏联关于接受实习人员的规定,所有的费用都要朝鲜方面承担,此外还要支付指导实习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100-150卢布。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而苏联则要收取包括教学、住宿等在内的一切开销的50%。比较中苏对朝鲜的援助力度,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感到相形见绌,所以建议与财政部一起向部长会议提出修改有关苏朝协议的条款。

如此看来,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后来人民币与卢布的折算方法有变,苏联对朝鲜无偿援助的金额也因为免除朝鲜归还贷款而有所增加。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中国本身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么这样的援助力度和决心,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此时中苏在援助朝鲜方面已进入了一种“竞争”状态。这样理解未免过于超前,需知当时中苏关系还处在上升时期,况且中国战后的经济恢复也要仰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又怎么可能有意去同苏联竞争?对于中国这种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援助他人的行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而中国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又在历史上与朝鲜颇有渊源,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必须做出非常的努力和牺牲。

在朝鲜经济重建初期,兄弟国家的援助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其提供的资金在 1954 年朝鲜国家财政预算中至少占 31.6%。苏联援助的主要是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截止到 1954 年 10 月 1 日，苏联帮助恢复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 100 个（其中新建项目 22 个，大型工业企业 30 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安排失当，许多发运到朝鲜的机器设备（尤其是金属切割机床）未能及时到达企业，而是长期尘封在仓库里。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那么中国的援助除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外，重点是提供生活消费品。仅 1954 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 13 万吨粮食（1953 年为 20 万吨）、4000 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 1955 年的总产量）、60 万双鞋和 30 万套棉装等。培养朝鲜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仅 1954 年来到中国的朝鲜实习生就有 3000 多人（以后增加到 1 万多人）。

除了资金、技术和物质的援助，中国对朝鲜重建做出的最值得注意且无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几十万志愿军官兵所提供的大量无偿劳动力。这一点，在朝鲜劳动力极为紧缺的战后初期，显得尤其重要。在停战后 3 个月内，志愿军铁道兵便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 308 座，全长 1.5 万米，并修复车站 37 处，协助朝鲜铁路员工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铁路线。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筑水坝、河堤、水渠，植树造林，春播秋种，修建民宅，修复校舍等各个方面，志愿军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仅 1957 年上半年，志愿军投入朝鲜经济建设的人力就达 43 万个劳动工日。到 1958 年全部撤军前，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修建公共场所 881 座，民房 45412 间，修复和新建桥梁 4263 座，修建堤坝 4096 条，全长 429220 米，修建水渠 2295 条，长达 1218.71 公里，进行田间劳动 8.5 亿坪，送粪 1314.6 万担，植树 3608.65 万棵，运送粮食物资 63853 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 2126.05 万斤，衣物 58.9 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 188.39 万人次。

1954 年 3 月 11 日朝鲜内阁通过的决

定宣布，“已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即全面地恢复发展人民经济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工作”，并开始执行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1954-1956）。

三年计划期间（1954-1956）

1954 年 4 月 22 日，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昌玉在最高人民会议第七届会议做关于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几天后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三年计划的法令：到 1956 年，工业总产量要超过战前水平，达到 1949 年的 1.5 倍（其中消费品生产约 2 倍）。在农业方面，水稻总产量超过战前水平 19%，杂粮 9%。国民收入将比 1949 年增长 30% 以上。

在三年计划时期，苏联继续保证工业设备的供应，而中国对朝鲜的帮助，除少量的轻工业设备和企业的援建外，主要是提供生活用品和工业原料。1954-1957 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口总额



朝鲜青年建设队（油画）

9.22 亿元，进口总额 1.27 亿元，其差额 7.85 亿元，主要以外援平衡。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粮食（主要是小米）44.9 万吨，大豆 17.8 万吨，棉纱 3950 吨，棉花 35590 吨，棉布 8847.6 万米，煤炭 345.6 万吨，焦炭 26 万吨，橡胶 1.12 万吨；从朝鲜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海产品、铁砂、化工原料和苹果等。在三年计划施行阶段，朝鲜超过 80% 的工业项目重建是在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完成的。而完全是由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负责建设的工业项目（不算军事项目共 90 个），占此期朝鲜恢复和新建工厂总数的 20%。

朝鲜的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鲜当局公开的材料，1955 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和平建设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已完成计划的 106%，并超过战前 1949 年水平的 56%。到 1955 年底，朝鲜重建或恢复和扩大了 290 个以上的大、中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制造、冶金、采矿等部门。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三年计划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然而，被公开报道和媒体宣传隐瞒的事实是，在三年计划期间出现的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造成预算赤字。由于追求高速度，三年计划不断加大国民经济投资。根据苏联有关部门的统计，朝鲜国家财政收入总额 1954 年 871 亿朝元，1955 年 979 亿朝元，预算支出总额 1954 年 806 亿朝元，1955 年 999 亿朝元，其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投资，1954 年 439 亿朝元（占 54%），1955 年 608 亿朝元（占 61%）。1955 年出现财政赤字 20 亿朝元。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增加 108 亿朝元，而支出却增加了 193 亿朝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基本建设投资（169 亿朝元）。从财政来源讲，来自兄弟国家资金的减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 年的外援 304 亿朝元（占财政收入的 35%），1955 年为 234 亿朝元，减少了 70 亿朝元。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外援在朝鲜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二，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早在 1955 年 1 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有必要提醒朝鲜同志注意，在恢复期间的工业发展方面，“应增加居民消费品各部门生产的比

重”，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的实际条件和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但金日成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据朝鲜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55 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 1954 年增长 62%，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只增长了 37%。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 600-800 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 1500 朝元，但市场上一米棉布就要 300 朝元，一条领带要 300-500 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朝鲜政府坚持还是要工业设备。

其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业。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引起农民不满，加上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从而造成普遍的粮食恐慌。朝鲜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而是寄希望于合作化的高潮。生产合作社在短短 4 个月（1954 年 9-12 月）间从 998 个（1.87 万农户）猛增到 10098 个（33.27 万农户），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低于 1953 年的水平，不足 230 万吨，而计划是 300 万吨。不满的农民屠宰牲畜，吃掉种子，只是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各地上报的粮食收成大约每町步（约 15 亩）30-35 公担，但实际上不到 20 公担。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 50%。1955 年春天，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迅速增加，抢劫和犯罪行为也大大增多。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

中国在 1954 和 1955 年分别提供的 13 万吨和 15 万吨粮食以及苏联紧急援助的 5 万吨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朝鲜解了燃眉之急。面对苏联的批评和建议，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危机得到一定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5 年的粮食总产量 244 万吨，虽然超过了 1954 年，但还远未达到 1949 年的水平（280 万吨）。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计划的 54% 和 34%。

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针对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在1955年4月召开的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粮食危机则归罪于主管经济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击队派),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金日成在会议结束时提出:苏联和中国都不会永远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准备自己应付一切困难。金日成如此说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分别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而这无疑是对金日成权威的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对宣传鼓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又译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金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为了突出“主体”,朝鲜领导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兄弟国家给予的大规模援助,更不能把经济建设的成就归结到这一点上。金日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并非有意冒犯苏联和中国。金日成非常明白,朝鲜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所谓“主体”,只是政治上和政策上保持自立,并不排除经济上依赖外援。所以,尽管在内部讲话如此激昂慷慨,在考虑未来的五年计划时,金日成首先想到的还是要向莫斯科和北京寻求援助。

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内阁副首相崔庸健请求苏联政府延缓贷款的归还日期并免于归还到期款项。此外,还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朴昌玉后来告知,朝鲜希望在未来的五年计划期间再得到10亿卢布的物资援助,并估计中国也会答应给予同等数量的援助。5月出访莫斯科之前,金日成向苏联大使重复了这些要

求,只是把无偿援助的金额降至5亿卢布。同时,朝鲜希望东欧国家(主要是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意免除朝鲜的一切债务,还打算向东德借款。

6-7月,金日成亲自率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收获并不如愿。东欧国家都强调自身的困难,不愿再增加新的无偿援助,只有东德,经过反复商讨,答应从以前援建咸兴市的剩余资金中,拨出1800万卢布作为无偿援助,用于向朝鲜提供日用品。罗马尼亚同意借款,没有确定数额。还是苏联慷慨一些,但只答应提供3亿卢布无偿援助,并取消5.7亿卢布的债务。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冷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朝鲜的不满。苏联大使伊万诺夫(V.Ivanov)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56年4月)的文件表明,朝鲜“在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没有放弃建立自己的闭关自守的经济,也没有关注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及他们之间形成的劳动分工的问题”。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金日成在洋洋万言的总结报告中,对于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大规模无偿援助,竟只字未提。

在困难时刻,金日成当然不会忘记向中国求援。朝鲜代表团自欧洲回来后,便开始进行准备。8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与中国使馆会谈后,起草了关于请求中国提供援助给朝鲜政府的建议。大使乔晓光估计,金日成将率团出席中共八大,届时会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援助的问题。同时,朝鲜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交了1957年商品供应协议草案。根据该协议,中国将向朝鲜出口商品2亿元,而朝鲜出口中国的商品仅4000万元,其差额未作说明,但给中国人的感觉是朝鲜政府有意请中国一笔勾销这个缺口。8月21日金日成在与乔晓光会谈时提出,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无法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然而,几天后发生的劳动党八月事件,导致中朝上层关系急剧紧张,金日成决定不再前往北京出席中共八大。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召见正在出席中国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崔庸健,严厉指责朝鲜党迫害持不同政见的干部的做法,还派彭德怀(米高扬陪同)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



朝鲜经济重建的场面,画面背景是拔地而起的崭新建筑

其结果,中国对朝鲜提供援助的问题自然也提不上议事日程了。尤其是11月朝鲜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后,毛泽东更加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显然,此时朝鲜很难指望再得到中国的援助。

1956年9月朝鲜要求中国第二年再额外给予5000万元的无偿援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朝鲜不得不取消事先商议好的金一副首相访华的安排。在关于1957年贸易的谈判中,中国也没有满足朝鲜关于提供粮食的要求。朝鲜坚持要中国供应20万吨粮食,而中国只答应给9万吨,后经反复谈判才同意提供15万吨。11月28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抱怨说:周恩来不久前召集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讲述了国内状况,表示中国在“二五”计划结束前无法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新的援助。因此,朝鲜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查1957年的计划,并将被迫压缩建设资金,减少购买中国的焦炭和煤气。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只得再次转向莫斯科。金日成请求苏联在1957年额外援助棉花1500吨,并帮助解决该年度3100万卢布的财政赤字。金日成一再强调,“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或许是考虑到上述情况,劳动党中央1956年12月全会决议宣布,三年计划的资金来源不少是

靠兄弟国家的帮助,而“一五”计划将主要依靠国内资源。

朝鲜的态度打动了莫斯科,加上东欧危机已经过去,苏联开始转变了对朝经济援助的态度。1957年2月苏共中央批准了1957年苏朝贸易协定和向朝鲜无偿供货协定,除了按照协定向朝鲜供应大量机械设备、工业材料和其他物资外,苏联还决定在1957年的出口额度之外再向朝鲜发送4万吨小麦,并同意接受朝

鲜提供的10万吨锌精矿、3.5万吨碳化钙及额外的5000吨独居石(磷铈镧)精矿(朝鲜富余但苏联并不需要)。为了进口朝鲜货物,责成苏联财政部和苏联内务部于1957年第一季度向外贸部划拨500公斤国产黄金以兑换自由外汇。苏联还同意将1949年双方签订的商品流转和支付协议的有效期限延长至1957年,同意金日成的特别要求——提前使用500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此外,为了满足朝鲜请求的额外援助,苏联政府同意按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朝鲜进口商品。

五年计划期间(1957-1959)

1957年上半年,中朝关系仍然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苏联新任大使普扎诺夫(A.M. Puzanov)4月10日通报,朝鲜将于5-6月完成五年计划的制订,金日成表示将把计划草案交给苏联和中国,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乔晓光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中国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不过,从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对朝鲜的态度开始转

变。从平息非斯大林化引起的思想混乱,到协助苏联解决东欧危机,中共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开始参与处理社会主义的欧洲问题。特别是在苏共六月“宫廷政变”中支持赫鲁晓夫,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和作用愈加突出,毛泽东的感觉也越来越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和苏共已经成为平起平坐的领导者,毛泽东也有意在这方面负起责任。

1957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李永镐(Lee Yong-ho)时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更加团结起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还表示“我们要和朝鲜继续合作,加强团结”。金日成对此有所感觉,并立即做出反应。7月初,朝鲜劳动党在继续揭露和批判1956年8月“反党小集团”的同时,却决定释放朴一禹,并同意让他回到中国。在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崔庸健坚持不能释放朴一禹,认为这将对叛逃分子的鼓励。但金日成力主或者给朴安排工作,或者让他回中国去。金日成强调,“中国同志一定会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而不是个别不满的人”。随后,朝鲜决定8月底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商讨“一五”计划和双边贸易的问题。

朝鲜代表团7月底到莫斯科商谈五年计划时,曾提出希望苏联同意延期归还将于1961-62年到期的2.4亿卢布的贷款,遭到拒绝。苏共领导人对朝鲜这样层层加码的援助要求已经感到厌烦,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指出,朝鲜的计划不现实,速度过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必须偿还贷款并按期支付利息。赫鲁晓夫说,让金日成偿还贷款,否则不再提供新的贷款,我们的原则是“要算经济账”。遇此挫折,朝鲜人对中国会给予多少援助也没有寄予希望。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表示,过去曾向中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一次我们力求减少。于是,朝鲜希望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保持低调,在访问计划中没有直接提出援助问题,甚至要求不公开活动,不发表消息。然而,朝鲜人又一次得到意外的收获。

1957年9月13日至10月6日,以金一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对朝鲜的五年计划,中方总体上表示赞同,但认为增长速度定得过快(高于中国“一五”计划水平),农业投资不

够(年平均投资低于三年计划),积累率和投资率过高(按同样价格计算远高于中国),消费水平也显得目标偏高(超过中国1962年水平)。中方代表通过讲述中国的经验,间接地就这些问题向朝方提出了建议。在贸易方面,中方确定的方针是:根据双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则,在物资供应上帮助朝鲜解决困难。据中方估计,1958-1961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超将达到人民币8000万到1亿元。其差额中方决定不再以无偿援助或贷款的方式解决,而是尽可能进口一些中国并不急需的朝鲜物资,以促进朝鲜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中国“二五”计划尚未确定,故这次只商谈1958年的贸易问题。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煤炭中国1958年计划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中国自己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只有棉花难以达到朝鲜的要求。中国连续两年未完成棉花播种计划,因此打算1958年从苏联进口几万吨棉花。这样,对于朝鲜要求供应的棉花(12000吨)、棉纱(1500吨)和棉布(1000万米),经过反复谈判,中方最后答应提供的只有8000吨棉花、500吨棉纱和500万米棉布。至于进口物资,水泥、漂白粉、硝酸铵三种大宗物资,以及黑铅等,中国实在不需要,且无法转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尽量接受了朝鲜的货单,如中国的碳化钙已经过剩,而朝鲜要求出口3万吨,最后还是接受了8000吨。朝方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认为“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又做出一些让步,如对贸易差额的处理。因中国无偿援助的款项到1957年已经用完,而朝鲜能够向中国提供的物资很少,故此此前双方贸易额有限。为满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资贷款外,中国采取了扩大贸易的积极措施。中朝年度贸易总额1957年仅5601万美元,1959年即猛增至11584万美元,翻了一番,1960年更达到12037万美元。而中国对朝贸易年年出超,1957-1960年共计6229万美元,这些差额最后基本上都由中国用贷款的方式解决了。

为了彻底改变中朝关系,毛泽东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

东两次约见金日成，当面承认1956年中共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建议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国的干部，然后接受他们回国。金日成表示“朝鲜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毛泽东则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反对朝鲜。为了解除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毛泽东还主动提出将志愿军全部撤回回国，并准备派周恩来亲自前往朝鲜安排。最后，毛泽东表示想亲自去朝鲜访问，金日成立即说，他将组织最盛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后来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毛泽东的谈话“十分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

在这样的气氛中，中朝携手迈进了1958年。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朝鲜则仿效中国开展了“千里马”运动。朝鲜先后派出4个专业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和学习，主要报刊也不断介绍中国“大跃进”的情况。8月3日以李周渊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行前金日成指示他们，要“认真学习，细致研究，把学到的经验带回朝鲜”。在为时月余走访近100个企业、单位后，代表团感触颇深，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它将扭转全世界的历史”。接着，朝鲜报纸开始发表社论，批判保守主义，提出“钢铁和机械是工业之王”的口号。同中国一样，朝鲜也开展了除四害、消灭血吸虫的全民卫生运动，在工业建设中大力提倡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全民大炼钢铁，在农村全力推行合作社合并，大办公共食堂。金日成号召全国“继续苦战1-2年”，并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再斗争4-5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随着双边关系日益密切而不断加大力度。1958年2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说，中国可以继续向朝鲜提供棉花，每年1万吨是有可能的，还主动问朝鲜需要多少焦炭，并答应考虑给予满足。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出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金日成接过话题说，按照日本人的资料，在鸭绿江上可以建设三个水电站）。回国后，周恩来吩咐外交部马上落实上述事项。周恩来的态度对朝鲜是一个鼓励。6月初，朝鲜提出请中国再援建一个纺织厂和两个纸袋厂。根据周恩来和陈毅的指

示，国家计委立即邀集有关部门协商，并很快做出答复：中国同意援建这三个工厂，以无息长期贷款的方式（自1961年开工后起10年内还清）。接着，朝鲜方面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8月3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到京，与中国进行提供工业设备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谈判。在成套设备方面，朝鲜要求中国援建年产1万锭的缂织厂三个，1960-1962年每年建成一个。年产100万套的轴承厂、年产1.5-3万吨的制糖厂、年产10万吨的面粉厂各一个，分别于1959-1960年建成。提供日产30吨的造纸设备6台，1959-1960年交货；50吨/小时的锅炉及发电设备4台，1960-1961年交货。中方基本上同意了这些要求，只是建议制糖厂和面粉厂应根据原料产地建成分散的小厂。在专用设备及机床方面，朝鲜要求从1958年底至1961年为其供应冶金设备17种29台（部）、选矿设备11种97台、大型机床15种20台、针织机50台、宽轨用小型机车7台、宽轨用磨砂车100台等。当时中国正处在“大跃进”中，有关部门感到朝鲜的有些要求交货日期太紧（4种冶金设备、5种大型机床），有些设备中国制造能力有限，国内供应还有缺口（磨砂车）。但最后还是基本上满足了朝鲜的需求。此外，双方还签署协议，共同投资建设云峰水电站，由中方提供贷款，朝鲜政府将自1963年起分十年以货物偿还。朝鲜提出再建一个义州水电站，中方曾有所考虑，但最后未达成协议。根据双方签订的1959-1962年贸易协定，中国方面将供应朝鲜煤炭、棉花、棉纱、轮胎、炼锡、压延钢材、锰铁、硫磺、石蜡、石膏等主要物资。这次两国会谈涉及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确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说：中朝经济关系已进入长期合作的新阶段。

如果说在朝鲜三年计划期间中国主要供应的是生活消费品，那么从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已经转向以提供工业设备和物资为主。为此，10月18日双方又签订了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共同条件，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其工作范围包括互相提供图纸、资料、样品，互相派遣专家、实习生，互相委托技术鉴定等。合作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仅要求上海市承担的工业项目

就有 22 项，并规定 1958 年底和 1959 年初将相关资料提交各朝方。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凡援外商品，商业部优先保证供应，铁道部、交通部优先安排运输。所有援外项目，必须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计划，作为确保项目。临时追加的项目，在设备和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各部门和地区可以从国内项目中尽先调剂使用。金日成对中国的帮助非常满意，并一再表示感谢。中朝关系进一步升温。

1958 年 11 月 22 日，当金日成时隔 5 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气氛已不可同日而语。北京 30 万人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对于中朝关系，《人民日报》报道使用的词汇十分感人：“唇齿相依、安危与共、亲如手足、休戚相关”。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们肯定朝鲜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方针就是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非常激动，一再表示两国关系非同一般，很多朝鲜干部到过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双方表示要更多接触，加强非正式互访，并谈到几年后携手进入共产主义。谈到经济发展时，金日成趁机说，朝鲜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 100 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对这次访问，朝鲜领导人和新闻界予以充分肯定，并大力宣传。其结果不仅把中朝关系推向高峰，而且最终巩固和加强了金日成在朝鲜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

与此同时，朝鲜也向苏联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中国无法提供的设备和物资，如生产载重汽车需要的 5000 吨冲压机，以及 1300-1400 吨不锈钢等。苏联大使感到有困难，表示能够提供的不锈钢数量只有朝鲜要求的十分之一。金日成不得不直接写信给赫鲁晓夫求援。1958 年底苏联贸易代表团访朝，带来了赫鲁晓夫的回信。金日成感谢“苏联政府一贯竭尽所能，充分满足朝鲜方面的要求”，并指出苏联拟定提供的机器、设备、材料，特别是不锈钢、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和汽车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了进一步得到苏联的援助，朝鲜的政治态度也需有

所转变。在 1959 年 1 月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含蓄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提出批评。出席这次大会的金日成立即表示，报告内容十分深刻，“我们从赫鲁晓夫报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究竟该走怎样的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金日成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朝鲜一直在学习“苏联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丰富经验”。两国领导人会谈时，金日成虔诚地接受了苏联对朝鲜不切实的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而赫鲁晓夫则答应满足朝鲜的进一步要求。3 月 17 日，苏朝签订了新的经济合作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价值 5 亿卢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帮助，以协助朝鲜建设火力发电站、化工厂、麻纺厂和毛织厂，及扩建金策制铁所和平壤丝织厂。

由于超强的国内动员机制和大规模的外援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在 1958-1959 年确实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数字，1958 年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增加了 40%，等于 1956 年的两倍，1949 年的四倍。粮食产量超额 12% 完成计划，达到 370 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 341 亿朝元，比前一年增长了 26%。1959 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 75%，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 7%。5 月 8 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发表公报宣布，到 1959 年 8 月 15 日将提前两年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欢欣鼓舞的朝鲜领导人不断宣称，到那个时候，朝鲜人均主要工业品和谷物产量，不仅会超过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还要超过资本主义的日本。

然而，同三年计划一样，朝鲜执行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也伴随着严重缺陷和问题。根据苏联和匈牙利有关部门的报告，在 1957-1959 年间朝鲜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工业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如电力和燃料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其他部门，造成两次被迫缩减计划；工业品质量低劣，甚至用于出口的钢材和耐火砖都无法达到技术标准；大量小型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铸铁等产品完全是废品，造成人力和资金的浪费；城市工人和职员人数激增，导致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55%）大大高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1%）；由于大量劳动力转向城市和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缩减，粮

食总产量(含玉米)呈下降趋势(1958年实际为343.7万吨,1959年340万吨),城市人口增加带来消费品需求增长,被迫消减大宗农产品出口,导致外贸严重逆差,如对苏联的芝麻、蓖麻籽和葵花籽的出口,只完成了计划的6%、7%和27%。朝鲜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缓冲”时期(1960)

对于这些问题,朝鲜领导人是有所感觉的。早在1959年中宣布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时,金日成就提到1960年将成为“休养年”,尽管没有进行解释。8月中旬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公报称1960年为缓冲期,即调节和整顿经济,准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改为七年计划)的一年。为此,朝鲜开展了新一轮求援活动。1959年6月,朝鲜要求苏联紧急供应3万吨小麦,并把1960年到期的1.23亿卢布贷款延长5年。赫鲁晓夫马上答复,不仅批准了朝鲜的要求,还把贷款期又多延长了一年。1960年2月,朝鲜又提出在贸易协定之外,请苏联再紧急供应5万吨粮食,此外还希望能够满足朝鲜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苏联很快就答应将提供粮食。当然,这些临时帮助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5月2日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提出,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很快来朝

鲜,他就要去莫斯科。普扎诺夫试探性地询问朝鲜需要什么帮助,金日成提出,要实现七年计划,朝鲜还缺少9-10亿卢布的外汇,另外希望从苏联得到1.5万吨棉花和10万吨粮食。在分析了朝鲜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苏朝经济关系后,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在计划和协定之外,让苏联再向朝鲜提供补充援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1959年10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为了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双方开始了理论争论,并试图吸引兄弟国家站在自己一边。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为了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竟相对其表示友好和善意,援助金额和规模攀比上升。金日成左右逢源,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1959年10月初,苏联推迟了金日成期待和准备已久的赫鲁晓夫对朝鲜的访问,其实际原因是担心因此破坏他访美后形成的缓和局面。金日成对此极为不满。1960年5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双方在政治上立场取得一致。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金日成赞扬《列宁主义万岁》这篇论文很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还说,赫鲁晓夫1955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还认为我们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后来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决定继续搞下去。苏联也

不甘落后,半个月后,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通报了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错误做法,以及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苏联干预朝鲜的内政。金日成开始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劝说中苏和解。随后,赫鲁晓夫指示把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在那次谈话中,



平壤地铁是在中国的援助下于1968年开始兴建的

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会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看后,果然愤怒异常,并立即表示,朝鲜劳动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苏共中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回国后,金日成召集朝鲜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说“中国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也不会再到中国去了”。

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赫鲁晓夫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要求。金日成走后,7月19日赫鲁晓夫召见普扎诺夫,请他转告金日成,“贷款和供应小麦、棉花的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其他问题也委托有关部门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还说,他决定9月中旬亲自访问朝鲜。几天以后,普扎诺夫把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交给金日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令朝鲜领导人十分兴奋,金日成一边看信,一边连声叫好,说苏联“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请求”。8月,朝鲜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双方签署了贷款协定。苏联同意免除战争期间的军事贷款7.6亿卢布,及延期偿还1.4亿卢布的经济贷款。金日成得此消息后激动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项9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啊!

此时,中国已经注意到朝鲜对华态度发生了变化:领导人讲话和报刊报道“突出苏联,压抑中国”,“只谈中国国内建设的成就,不提对外政策和国际作用”,甚至提出了“彻底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显然,中国再不有所表示,就会失去一个支持者,甚至增加一个反对者。于是,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9月10日,外交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这次访问的宣传通知,要求《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发表欢迎社论,访问期间各报可多登载介绍朝鲜建设成就的文章、消息和照片等。足见中国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和认真。9月17日中国驻苏使馆发回情报:苏联已同意全部取消给朝鲜的军事债务。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领导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中朝签订了贷款协定、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政府将在1961-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工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此外,还将供应朝鲜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在与代表团团长李周

渊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为了履行协定,10月18日双方又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国轻工业部负责承担培训实习生26项(76人),派遣技术援助专家23项(45-48人)。此外,同朝鲜的“缓冲年”一样,1960年也是中国开始进入“大饥荒”的一年。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以及金日成表现出来的亲华倾向,反过来又推动了苏联与朝鲜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了签订协定,朝鲜政府代表团9月就到了莫斯科,但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据驻苏商务参赞处的报告,朝方对苏贸易逆差,但不愿以贷款方式平衡,朝方要求减少原料出口,增加供应机器,苏方不同意,朝方要求调整原协议的成套设备项目,苏方不能满足,朝方要求签署七年协议,苏方只同意五年。苏朝协定迟迟没有结果,中朝协定却见诸报端,使莫斯科处于尴尬地位。此外,赫鲁晓夫再次取消访朝,引起金日成强烈不满。作为报复,对于苏联希望他亲自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的多次要求,金日成坚持称病不去,甚至都没有出席在平壤举行的庆祝大会。然而,苏联驻朝使馆报告,金日成却参加了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平壤举办的所有活动。赫鲁晓夫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12月24日,苏朝终于签订了1961-1967年苏联给予朝鲜技术援助协定和1961-1965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根据援助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扩建金策冶金工厂,使其能力达到年产280万吨钢和230万吨钢材。在博州建设发电能力60万千瓦的火电站,在平壤建设发电能力为40万千瓦的火电站,建设年处理原油200万吨的炼油厂,并由苏联供应必要数量的原油,还有电影制片厂、麻纺厂和毛纺厂等。根据贸易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机器和设备、棉花、石油制品及许多其他商品,5年内双边贸易额将增长80%。

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

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

○ 林蕴晖



龚育之与胡绳(右)

胡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龚育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当今中共党史和国史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和对党史、国史的把握,胡绳、龚育之二位是当之无愧的大家。

从两边争得援助,朝鲜不仅安然度过了“缓冲年”,而且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小结

朝鲜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外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按照苏联的计算,截至1960年4月1日,朝鲜得到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偿援助共55亿卢布,其中苏联13亿,中国9亿。此外,苏联还提供了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中国也提供了三笔无息贷款。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1950-1960年提供的就有16.53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16.38亿美元(含

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指出,党史工作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全面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要求“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使党史成果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胡绳和龚育之二位主持编写建国后党史所提出的指导原则,正是中央上述意见的最早体现。

一、以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观点笼罩全局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49年

3.4亿免于偿还的贷款等)。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应该说,没有外援就不会有朝鲜如此迅速的战后重建,特别是在初期,外援起了决定性作用。

相比而言,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胜于中国,不过就“尽其所能”来说,中国的援助力度应该是最大的。在朝鲜重建时期,中国提供援助是在自己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中国的援助,一方面刺激苏联给予援助,另一方面使得朝鲜的需求层层加码。感激和回报是暂时的,烦恼和困苦却是经常的,说来就来。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对朝鲜援助的结果也是这样。■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至1978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结论。可以认为,这反映了当年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水平。

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引发了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反思。因此,1988年11月4日,胡绳向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编写建国以后的党史时指出:“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六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的第二次大飞跃。虽然这个理论还不是那么完备,但一些基本观点是站得住的。我们现在应当从这个理论的高度来回顾党的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通讯》总2期,1989年1月25日。)可以认为,胡绳的这个意见,对推动党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前进,使之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由胡绳主编,龚育之是建国头十七年的主笔。这本书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胡乔木给予高度评价,亲自为书写了题记。但这是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前的事。中共十四大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表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如何以1981年的决议为指导,又符合党已大大前进了的认识,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就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1994年9月,胡绳在西安就有关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编写问题向有关人员谈话说(大意):

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为指导思想,这样才能有笼罩全局的气势。也才能体现出九十年代党史研究的水平。



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离开经济建设的严重教训,胡绳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的某些事件;另一方面又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建国之初,就摆在了党的面前。

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三大改造的具体途径来说,是有自己的创造,但就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样式来说,则是苏联模式。这一选择,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

党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思想,以至政策。但何以没能坚持贯彻下去,以至很快又走回头路。这显然与当时对苏联的经验教训只限于具体政策,而未能从总体模式上看其弊端有关。而更重要的是,由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转向了肯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反修防修问题的提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我们将探索成就放在上述限度内



来阐述,就可以使二者辩证统一起来。

十四大报告中说,“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

胡绳说,我的意思是想说明:

“对建国头七年、‘文革’前十年的正确方面、成就方面,不要说得过满、不要过高、绝对化,这样前后连贯起来,就可以显现出历史的比较来。不然就使人感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者是强词夺理,难以服人。”

这一番话表明,胡绳要求编写建国后的党史要立足于党在上世纪90年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之上,即以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笼罩全局,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把1949-1978年这段历史讲清楚,使之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这就必然涉及这段历史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施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胡绳说,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的提出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这就是胡绳要求把握的分寸。(1994年10月4

日,龚育之传达胡绳在西安关于建国后党史编写的谈话——录自林蕴晖笔记)

二、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

胡绳有关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笼罩全局的思想如何落实,对具体执笔者来说,显然不是易事。龚育之先生对此多有指示,重要的一条是: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

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是要严格从事实出发。

关于建国后的历史分期,很长一个时期,习惯于把建国头三年称之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有人把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统称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龚先生主张把建国头三年和后四年分开,头三年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立编。其根据是:头三年和后四年,在主要任务、指导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确有不同特点。以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界,能比较客观地描绘出两个时期的历史原貌。过去把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或《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完全淡化的做法,并不合乎历史实际。因此,重新强调那个时期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首先是还原历史原貌,也同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有某种更自然的联系,而不简单是个划分时期的技术层面的问题。(《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关于确认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中国共产党实施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历史,胡乔木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历史决议的说明中曾做过专门的解说,他指出:在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1981年5月19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

胡绳对龚育之的观点是完全赞同的。胡绳本

人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长篇演讲中说道：“到了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那时说，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已经开始。其实，这个说法不大能够服人。毫无疑问，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已经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有了国营经济，这就是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而且共产党取得政权就是重大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这跟社会主义革命是两回事情。建国时，在《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当时认为必须有相当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开始，在这以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8年12月26日。《胡绳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历史是要接受检验的。从1949年建国到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是新民主主义纲领，已经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龚育之先生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并认为那种把领导人个人曾经有过的说法当做不可改变的结论，是不可取的。

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是要写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氛围。

龚先生以“大跃进”的发动为例说，要描述1957年以后上上下下抱着很大信心、很大希望，酝酿“大跃进”，发动“大跃进”的状况。要把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如何在那么一种政治背景下、在那么一股潮流下发动起来的，写得比较具体一点，让人知道“大跃进”是怎么一回事，而不在于花太多的笔墨。作为通史，既要写大轮廓，又要给人一些具体的感觉、感受，对于后来人，一看就大概知道历史是怎么过来的。

所谓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龚先生指出，从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文选》二、三两卷的论述看建国以来的历史，就是现在的新高度。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去任意改写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的

实际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龚育之论中共党史》，第436~437页。）

在书稿的写作中，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比较突出的是如何以初级阶段理论看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龚育之在向胡绳报告对这个问题的写法时说：

“我们觉得现在写这个问题，要有所前进：

1.把酝酿提出总路线的进程，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这个标题加以笼罩，突出地反映总路线与原来设想有所不同。

2.明确指出：由原来经过十到十五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改为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完成，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特别是以后随之而来的加速过渡的改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指出在提出总路线过程中，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评，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向社会主义过渡搞社会主义改造，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对立起来，实际上把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看成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同我们党过去对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和宣传，是不协调的。

4.指出总路线的制定，与学习苏联、照抄苏联的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模式，有密切关系。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又有历史的



2005年1月27日，龚育之（右）与胡绩伟在钓鱼台大酒店亲切交谈（徐庆全摄）

局限和消极影响。当时强调学习总路线要结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历史的发展表明:无论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做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还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看做唯一模式,都不利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和道路。’”(《龚育之论中共党史》,第466~467页。)

对这部分稿子的写法,胡绳表示了赞同,同时指出:

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43页。)

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向全党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以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源头上的反思。

三、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

龚先生十分重视党史编写工作的严肃性。作为指导原则,他着重强调:要做到“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的统一。龚说:“站在党的立场,就是遵循党的基本理论的指导,就是遵循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文选》关于党的历史的论述的指导。”“党的立场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第436页。)基本思想是既要遵守党的决议、党的宣传纪律,又不能躺在决议的“本本”上无所作为。要做到追求真理和遵从决议、服从真理和服从决议的统一。党性原则包含这两个方面,缺一方面就是党性不全。

对什么是党性,龚先生有过专门论述,他说:“何谓党性?遵守党的决议,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纪律,这是党性的极重要的方面,没有这个,党就不成其为统一的有组织的有战斗力的政党。但这不是党性的唯一要求。党性是有丰富内容的。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那种以为只要遵守既定的‘本本’就无往不胜,躺在决议上饱食终日,空洞乐观,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无产阶级党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他说,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思想路线,应该属于党性的要求吧。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没有科学的态度,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者叫做党性不完全。’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还说: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实事求是‘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这是对‘党性’下的科学定义。”(龚育之著:《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编写建国后的历史,要做到“党的立场”和“科学立场”的统一,突出反映在对历史发展经历的曲折过程在叙述中如何把握好分寸,这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部分尤为重要。对这个敏感问题,龚先生指出:“关于这个十年的总评价,要把成绩讲充分,把人民在奋斗、党所作的努力如实地写充分,而且从经济建设、经验积累、干部成长几个侧面讲充分。失误不要渲染,但也要如实地讲透。不是说成就是主要的就大体都很好了,还是有两个侧面,两个趋向,造成过很大损失,‘左’倾错误有起有伏,伏而又起,愈演愈烈,终于占了上风,酿成‘文化大革命’。‘文革’前的‘左’加上‘文革’的极左,构成二十年‘左’的错误。”(《龚育之论中共党史》,第472~473页。)无论是成绩或错误,都要实事求是,不避不讳。既不用成绩遮盖错误,也不因错误而否定成绩,这就是党的立场和科学立场的统一。

由上可见,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时,重温胡绳和龚育之二位党史大家有关中共党史编写指导原则的论述,对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 萧 徐)

解读“韬光养晦”战略

。 子 明

“韬光养晦”在汉语中的意思比较暧昧，并不是那种正大光明的词儿。《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载：“玄德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刘备的这种表现，是为了掩饰自己与曹操争天下的野心（或曰雄心）。在《荡寇志》第七十六回“九松浦父女扬威风云庄祖孙纳客”里，一位老人对受高俅逼迫的陈希真说：“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但愿天可怜见，着你日后出头为国家出身大汗。”所谓“再看天时”，就是等待时来运转的意思。把“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也不是什么好意思。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在出国访问和参加国内外一些学术交流活动的時候，多次就此做解释和说明，强调上面的翻译有问题，“韬光养晦”不是中国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不是暂且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等待时机成熟再出手的意思。其实，如果仅仅是抛弃或者修正“韬光养晦”这一用语，并不是什么大事情，比这好的词在中文中有的。问题在于，有些人是要以否定“韬光养晦”为突破口，全盘否定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乃至国家发展战略。这就要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了。

（一）

什么是邓小平的国家发展战略？简单地说，就是积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对于毛泽东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拨乱反正。所以，要全面理解邓小平战略，还要从毛泽东讲起。

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

士所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执政纲领，如果坚持这一纲领，后来中国的发展会顺利得多。朝鲜战争停战后，毛泽东突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凭借内战和朝鲜战争积累起来的威望，强力推行“三大改造”，迅速建立了计划经济的体制。

在1950年代，毛泽东还是实行开放经济的，但这种开放是只限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片面开放。即使是片面开放，对于中国的工业化也有很大的帮助，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建设的一百几十个重大项目，构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骨架。在毛泽东公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之后，苏联政府撤回了专家，中苏联盟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使中国经济陷入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1960年代中期，鉴于“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国务院在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确定了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原则（即“农、轻、重”的次序）。此时，毛泽东却突然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的主张。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提出了“四保”：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1970年公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又提出：内地的工业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关键设备和车间要“进洞”。结果是造成了几千亿元的经济损失，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沿海地区的发展至少延缓了十五年。

计划经济、自力更生（用拉美左派的学术语言就是与发达国家“脱钩”的“内源发展”战略）、准备打仗，这是毛泽东国家发展战略的三个核心要素。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就是逐一修改了这三条。

邓小平首先否定的是基于“战争与革命”时代定位下的“战时经济”与“战备经济”。进入

1980年代以后,邓小平判断“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此前提下,才可能谈论“生产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优先发展沿海经济;才会大幅度削减军费和军工,提出“军队要忍耐”,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

从经济特区“三来一补”开始,邓小平逐步扩大了经济开放的范围和力度。到1980年代后期,“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投入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已经得到确认。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市场经济登堂入室,正式取代了计划经济。这样一来,邓小平发展战略的三个要素——和平与发展、全方位开放、市场经济已经全面取代了毛泽东发展战略,并在2001年中国“入世”的时候达到了它的顶点;此后,随着新问题的逐渐显现,对它的的不满和质疑多起来了。

一部分人不满足于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而没有勾画出它的蓝图,要求以宪政民主来巩固市场经济,保障国内稳定与世界和平;另一部分人将特权、腐败与两极分化归罪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不是坚持专政,认为他执行了一条“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求从邓小平重返毛泽东。否定“韬光养晦”战略的主要是后者。

(二)

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时候,他的国家发展战略尚未最后定型。1989年底、1990年初,中国外交正处于基辛格访华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而邓小平路线也遇到了他第三次复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韬光养晦”,正是邓小平对这种严峻挑战的回应。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此前,邓小平已经讲过“市场经济”现在退回去讲“计划经济”,他是很不情愿的。在当时

的情势下,他不能不讲这个话,虽然他还想坚守住第二条防线——不要退回到“关闭性的国家”。但是,他当时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对外开放,一个巴掌拍不响,两厢情愿才能做到。你想要开放,别人要制裁你、封锁你,你怎么开放法?他还要“冷静观察”,看看别人是不是真的制裁、封锁。所以,当时讲“韬光养晦”,邓小平笃定要坚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条。

甚至连这一条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根据《何方自述(下)》,1990年初,有人组织了几次会议,批判“和平与发展时代”,强调“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坚持“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硬着头皮顶了过去,没有在时代问题上倒退,也看清了西方国家不想抛弃中国这块大市场,终于在南巡讲话以后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何方从上述经历中“悟到”:“自己无形中被卷进了实际存在但被百般掩盖的路线斗争中。这就是邓小平多次向海外人士说的,党中央也存在分歧。”“韬光养晦”是党内话语,是邓小平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防御性、策略性话语。他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这个话。查中共十四大以后的历次政治报告,也从来没有引用过这个话。

十四大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十五大说:“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十六大说:“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十七大政治报告的一个小标题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中写道:“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韬光养晦”战略的正式表述就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国务委员戴秉国最近撰文指出,“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郑

必坚曾经说过，“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走上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以来，中共就始终坚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和谐社会”。一部分人否定“韬光养晦”，实质上就是否定“和平发展”。他们还停留在“帝国主义时代”，留恋“战争与革命”、“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企图回到“关闭性的国家”和“军工第一”的“战备经济”。

(三)

一些人把毛泽东塑造成“韬光养晦”的对立面，其实也是一种神化。毛泽东是复杂的，他既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家，也是一个务实的国家领导人。“抗美援朝”初期，毛泽东曾设想一次歼灭美军几个师；在实践中碰钉子以后，又提出一次歼灭一两个营；再后来，能够“零敲牛皮糖”他也很满足了。在美韩不同意释放全部志愿军战俘的情况下，毛泽东本来不想停战，由于苏朝强烈要求立即停战，毛泽东就妥协了。1972年，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想，大概像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他接着又说：“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一方面，毛泽东公开喊口号：“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另一方面，他又在1975年10月21日私下对基辛格和老布什等美国人说：“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最好它是在你们手里头。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等到我上天堂去见上帝，我要告诉他，现在让台湾由美国代管还比较好。”

带着一火车的礼品去莫斯科“朝圣”，斯大林生日的时候高呼“斯大林万岁”，当着赫鲁晓夫的面说“以苏联为首”，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效仿刘备的“韬晦之计”，他后来几次讲话，道出了自己压抑多时的一肚子怨气。1958年以前，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是向苏联阵营“一面倒”；1971年以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是与美国、

西欧、日本“一条线”。不论是“一面倒”还是“一条线”，都是在二战后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充当一方霸主的“小兄弟”、“小伙计”。所以说，在毛泽东掌权的27年中，有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奉行“韬光养晦”战略。毛泽东率先在外交上大转向，邓小平才能继续奉行和深化“亲美”外交。在这一点上，是毛规邓随，一脉相承的。

某些人所欣赏的，只是1958至1970年之间的外交路线。当时，毛泽东被“大跃进”初期的“放卫星”和“文革”初期的“红海洋”搞昏了头。1958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两年“超英”、七年“超美”的奋斗目标，苏联就更不在话下了。1965年，毛泽东借林彪之口提出了“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1966至1967年，中国官方媒体在毛的默许下提出了“毛泽东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现全球一片红”的口号。中国外交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打倒帝、修、反”，一时间在全世界只剩下200万人的阿尔巴尼亚这一个“朋友”。

这些人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过去的教训，崇拜和鼓吹已经被毛泽东自己嘲讽过的“革



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提出“韬光养晦”战略

命外交路线”，同样是被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搞昏了头。

(四)

邓小平在讲了“韬光养晦”以后，又讲了“有所作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似乎可以多讲一讲“有所作为”了。但是，不同的人对于它的理解，也是截然不同的。

当年邓小平讲“有所作为”，是要中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一方面要在短暂的治理整顿之后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努力克服眼下的外交困难，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至于中国搞普选、搞宪政，他认为那是儿孙们的事情了。1987年，邓小平在和外国人和香港人谈话时都提到了中国大陆实行普选制的日程表——“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掐指算来，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

现在我们讲“有所作为”，比二十年前的邓小平又进了一步，不仅要埋头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还要有更加开阔的国际眼光。第一，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譬如说批准并落实《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才能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疑虑，确保世界的永久和平。第二，要从“中国经营”观念转向“全球经营”观念。囿于前者，即使是“大进大出”，也只是着眼于解决中国劳动力过剩的老问题。现在中国已经是外汇储备大国、资本大国，要更多考虑国民生产总值（GNP）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了。第三，中国已经成为第二经济大国，有必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在经

济、政治、军事、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各方面的责任。譬如说，在保障海洋航运、共同打击海盗方面，与其他海洋强国开展国际合作，乃至建立联合国海洋警察机制等。第四，中国外交需要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完美结合，增强中国的道义感召力或者说软实力。中国要在东亚一体化、亚洲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当然，有些人现在也讲“有所作为”，他们要回归甚至超越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第一，中国首要的核心利益是政体，谁质疑和反对这个政体就是中国的敌人，哪怕全世界都是敌人也无所谓，中国不怕“光荣孤立”。第二，面对敌人的“C型包围”，中国要发扬“尚武精神”，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第三，凭借现有的经济实力，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各国的边境纠纷，解放台澎金马。不仅要解决被毛泽东、邓小平搁置下来的问题，还要重申毛泽东和江泽民时期已经签署的协议。第四，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要给世界上所有的反美力量撑腰打气。要重新考虑不结盟的政策，重新举起反帝、反修的革命旗帜。这种“有所作为”的观点，是与邓小平理论背道而驰的，是违反中共十四大至十七大政治决议的。假如按他们的意见办，势必会重蹈1958年至1970年的中国外交困境，把中国带入新的灾难中。■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个人按需出版

继续征稿(50本起印)

2004年我公司率先与出版社合作开展按需出版业务。7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包括著名导演严寄洲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海内外的300多位作者出版了各种形式的作品，精美的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具有留世价值的纪念。

作为新的出版方式，按需出版具备三大优点：(1)解决费用过高难以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避免浪费。(3)出版周期短，一般1-2个月。重印1~2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老辈遗作。

印数：100册以下最佳。

资金投入：自费。以50本(大32开)为例，纯文字印制费用200页2000元，300页2800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共为4000~4500元上下(含2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电邮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正文纸张：70克胶版纸(黑白)、128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封面纸张：157克进口铜版纸。印刷质量上乘。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 邮编：100192 热线：13521531088 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考察

○ 王也扬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时说：“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阶级斗争，照搬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依据”。这段话说明，“阶级斗争扩大化”有其一定的理论原因值得探寻。而事实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

中苏论战与反右派，改变八大决议的正确判断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表述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这被后来国内史家称作“八大路线”的主要精神，并认为二十二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对八大路线的恢复和继承。中共八大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决议，其根据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是全国民众的强烈要求及其在党内的反映。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由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决定的，列宁诠释道：“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八大召开之际，中国大陆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摧毁了“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社会经济制度，这就使得阶级差别归于消灭。因此会议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是顺理成章

的，况且“老大哥”苏共也曾如此宣布过。那么，八大路线何以没有坚持甚或说压根没有实行呢？也有两则历史事实值得注意，一是在八大前后发生并且延续十年的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论战；一是八大闭幕后不久掀起的“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震动，政治局成员们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一致意见，予以公开发表，即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两文，由此揭出中苏两党在事关共产党的纲领、路线问题上的分歧。分歧的焦点，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列宁这把“刀子”也“基本上丢掉了”)。“刀子”者，阶级斗争之武器也。在中共看来，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现在世界上议论最多的是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杀人杀多了，但对真正的反革命是杀对了，问题是扩大化。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是要放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该年中发生的“波匈事件”，也恰恰说明这些国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搞好，没有把反革命势力加以肃清。直至八年后赫鲁晓夫下台，中共的论战文章发到“九评”(即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署名的长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才算打住。“九评”被认为是中苏论战的总结性文章，其论点极为重要，如文章说：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

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3. 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 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上述列宁的话,是说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的理论根据。“九评”进而把这种阶级斗争做了阐发:“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这段话是毛泽东加写,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其经验显然来自“反右派”斗争。

1957年,国内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应邀向执政党及政府提批评建议,以帮助中共整风,所提意见中出现逆耳的声音,甚至有人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遂遭到执政党的反击,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同年9月23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右派的进攻说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

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反右斗争的事实证明“所有制的改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更不等于阶级斗争的熄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他最后总结道:

运动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运动证明了: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富裕中农中,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还在向往资本主义,不高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权不巩固。他们是右派分子活动的市场。

运动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在农村的贫下中农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中间也有一小部分人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可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

邓小平的总结,大体印证了列宁关于十月革命后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的论断,或者说,他就是按照列宁的思路总结的。毛泽东则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等于再次强调了党一贯奉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对此,刘少奇也表示了认同,他在次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阶级斗争是如何“深入人心”的

中共领导集体之所以重视与苏共的论战,即使遭遇国民经济极端困难年代,仍全力以赴,口舌之争与“笔墨官司”(毛泽东语)不辍,是因为其自认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责无旁贷的捍卫者。毛泽东常说,与东欧那些国家不同,

我们是学十月革命,通过“实际的阶级斗争”打出来的。中共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视作搞“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先生,自己则为最优秀的学生。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实际的阶级斗争”首先证明了列宁的话:“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按照唯物史观的书本理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还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可是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马、恩曾经预料的那样,在欧洲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同时成功,却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继而又在生产力更加落后的中国告捷。于是“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新理论成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对此毛泽东等中国同志最能够理解,他们的经验也是“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至于唯物史观要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问题,亦如列宁所言,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先进的社会制度迎头赶上。实践中的道理是那么简单易懂,深奥的学理在胜利者面前似乎无须细究,中共八大决议中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之语,全党无人发现其理论上原本是不能成立的,虽然毛泽东提出过异议,但他注意的并不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恰恰在于不同意说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

“实际的阶级斗争”又一重要突破,是由唯物史观描述的物质——经济层面,深入到了“人心”的层面。任何暴力的本质特征都是残酷,杀人、你死我活是题中应有之义,无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列宁说:“没有一个革命和内战时期是不执行枪决的”。“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阴谋引入外国军队来推翻工人政府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竟不用死刑来惩处这种行为,是可以想象的吗?”毛泽东也说:“土豪劣绅盛

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这一切不可能不对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所以列宁反复告诫:“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这种“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列宁语),即是人的畸形的复仇心理,它可以绵延不断,甚至代代相传,怨怨相报不绝。1918年布尔什维克果断处决沙皇一家包括未成年子女,以绝后患,在当时情况下,并不难理解。同样,革命者也不会忘记“阶级苦”和“血泪仇”,如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所唱:“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做好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需教育。上引邓小平在总结反右派斗争时,强调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心服”;后来中国国内在说明阶级斗争时家喻户晓的所谓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等等,讲的都是人心问题。

“实际的阶级斗争”深入“人心”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上引列宁所论的第二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小资产阶级原本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共产党宣言》说,我们时代的特点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经济发展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社会分化尚未及此种情形,却是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占据了社会的多数(毛泽东所谓“两头小中间大”)。俄国革命时的中间势力,被布尔什维克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等中国同志则巧妙地争取、利用了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级,进而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终于将强敌战胜之。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并不等于阶级观点的模糊。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在思想上实质是一家。他且指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党内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正“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毛泽东的话,并非仅是他个人的观

点,而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一个经济落后、阶级分化尚未完成的社会所遭遇的现实: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既要被当做革命动力来争取和团结,其又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们中间有的人必然会成为革命的对象。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对于大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中共历来重视“思想改造”,强调要“思想入党”。在这些人未获彻底改造之前,党组织不认为他们与革命是“一条心”,而是“半条心”、甚至“两条心”的。毛泽东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要求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我们“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可见,即便是党内同志,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也是会随时滑入反革命的泥坑的。由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直至发展到反革命问题,从“思想斗争中发现了反革命”(毛泽东语),是中共自延安时代就抓得很紧的处理阶级斗争的模式之一。小资产阶级“自发”思想的核心是对私有制的眷恋和对资本主义的向往,革命中,它又可能变成“随时会叛变”的投机性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条心”问题。所以中共党内斗争总是十分严酷。在中国这样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国度,进行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思想的阶级斗争,其广度和难度可想而知。毛泽东于“文化大革命”时提出“要斗私批修”,开展全民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活动,都可以看做是执行列宁教导、切断“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之源的努力。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全国有数以亿万计的民众受到各种批判冲击(据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革”期间,受到各种批判、冲击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也是符合这种阶级斗争的逻辑的。至于在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被党的政策和策略成功分化、争取到了人民阵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把他们确定为下一历史阶段的革命对象,如邓小平所说,这些人要想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前提条件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变为敌我矛盾。毛泽东说:“人民内部,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人民内部矛盾包

括着阶级矛盾”。又说“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关于两类矛盾的不同处理方法及其转化学说,是中共治理国家的一个发明,其由在阶级斗争中争取、团结中间阶级的政策演化、发展而来,属于“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语)的理论成果。操作这一学说的要领是如何拿捏矛盾性质的转化。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一致:不同性质矛盾转化的关键仍在于有关人们的态度。态度问题也即思想问题。在反右派斗争发生后,毛泽东解释说,“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这就引出了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特征——不确定性和时起时伏。平心而论,八大决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想把日常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真实愿望。建国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此讲过不少的话,但工作中心转移的前提是阶级斗争形势要比较缓和,一旦“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掀起了波浪,则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大局需要(后来常把这种情况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八大是在理论上做了一次将党的阶级斗争的纲领、路线同日常工作中心适当区分,把前者规定的阶段性任务了结,以便将更多精力投入经济建设的尝试。事情很明白:首先,党是不可能否定自己的纲领、路线的,毕竟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两种,假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解决了,还有国际的阶级矛盾存在着,但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心在一个时期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也是有可能的,1956年的形势和氛围曾经不错,可惜后来被一场“没有完全看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毛泽东语)的阶级斗争风波给冲了。当把“右派的猖狂进攻”打下去之后,一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役终于在全国打响,史称“大跃进”运动。

阶级斗争深入到“人心”的层面,所遇最大的问题便是:人心隔肚皮,敌我难分辨。明里的阶级

敌人可以真刀真枪地去搏杀，暗里的阶级敌人危险且没有固定的目标，很可能“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毛泽东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惯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把戏。于是资产阶级派遣的“第五纵队”的存在，成了革命者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也是“实际的阶级斗争”带给人们的一种特别的心理状态。早在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第一句话即为：“特务之多，原不足怪。”而对付的手段，必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高度警惕和严格清理。搜查私信、揭发言行、密告敌情，都是“肃反”的必要方法。为获取嫌疑分子的口供，“逼供信”也屡禁不绝。面对社会上特别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大量的思想言论问题，最难的还是如何划限定性，以挖出敌人。除了对人言注意分辨“善心”与“恶意”的判断之外，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还列出了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等“六条标准”。可是“有利”与否，涵盖宽泛无边，这为“无限上纲”提供了空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历史证明，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阶级斗争都似一把双刃剑，它既为革命的利器，又避免不了伤害无辜，酿成一次次“扩大化”的悲剧。

阶级斗争深入到“人心”的层面，还使斗争的时限变得无法预期，范围也难以约束。我们已经论及思想可以传承、延续、影响，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可以不断产生，加之革命是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无产阶级政权处于强大的敌人——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毛泽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讲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我们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这也是上引列宁教导的第四点。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地球上埋葬资本主义，并且让它彻底“绝种”，阶级斗争之功才可以说告成。胡乔木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时说：林彪、“四人帮”一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前面加上了‘始终’两个字。这样，就把原来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正确的命题篡改成为一个错误的命题，篡改成为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命题。”但是，即使用毛泽东所谓“几百年”来代替“始终”一词，对于现世的人们来说，

也等于是遥不可及，所以胡乔木的辨析仅存某种理论上的意义而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鉴于阶级斗争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中归纳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直到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仍然认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用“一定范围”来限制阶级斗争，显得缺乏有力的根据。谁都知道，人心（思想）及其变化是难以范围的，而用和谐社会建设来化解矛盾，用民主与法制来规范斗争，则不失为正确之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本文为作者的专题研究论文《“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其中一节的简写，引文注释亦从略。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记杜润生的三次谈话

○ 张北英

杜润生老是我父亲的老乡、同学和战友，是我父亲参加革命起到过重要影响的人之一。我第一次见到杜老是1956年，那一年我8岁，而与杜老的交往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的。“文革”中杜老受冲击迫害，从原住处搬到祖家街一座很旧很差的木质砖混结构筒子楼里居住。父亲让我经常去看看杜老。与杜老交谈的内容主要是老干部谁的问题解决了，谁被“解放”了，谁还没被解放和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1975年我从部队复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单独到杜老家的次数就多了，有时候是杜老打电话让我去，有时候是我主动去向他请教问题。杜老做过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他在科研人员，特别是老一辈的科学家中有着很高的威信，“文革”开始后杜老虽然离开了中国科学院，但还是有很多科学家愿意找他谈心和反映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担任中国科学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主任和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时，杜老多次叫我到他家，把他听到的一些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职称改革中的问题，特别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职称问题和情况告诉我，让我很好研究、帮助解决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基层一线工作的农业科技人员的职称问题。在与杜老交往的50多年的时间里，我多次向杜老请教工作和学习中的问题。有三次谈话，我印象最深。

一、取消农民搞“长途贩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就会解放生产力

1978年的夏天，我到杜老家，那时国家处在拨乱反正之中。“文革”前和“文革”中一些比较“左”的政策及影响还没有肃清，一些地区的公检法部门把农民从事农副产品运输、异地交换的

“长途贩运”看做“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限制、打压。有的地方还对承运人罚款、扣货、扣车，对态度不好的，反抗的还关押判刑。杜老收到过反映这些问题的告状信，也看到一些报刊上报道的有关“长途贩运”问题。针对当时存在的这些问题，杜老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搞过一个规定，对私人搞“长途贩运”要坚决取缔，不允许私人搞“长途贩运”。“长途贩运”只允许国有商业和供销社搞。可是，中国这么大，国有商业和供销社网络有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根本覆盖不到。农民怎么就不可以搞运输？农民怎么就不可以参与搞流通？有些地方框框少点，思想解放一点，对农民搞“长途贩运”睁只眼闭只眼。农民搞运输，搞活了物流，丰富了市场，方便了人民生活，很多人靠搞运输致富了。只要加强市场管理，政府还可以增加税收。农民骑自行车驮点东西，赶个马车牛车拉点东西都是两个轮的，拉不多也走不远就是社会主义允许的，雇个拖拉机，雇个汽车四个轮的了，拉的多一点跑的远一点就不行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罪与非罪，走什么道路不能以拉的多少、走的多远来判定，运输工具先进了，农民怎么就不能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搞运输？这个在道理上就说不清道不明。搞好农业，要搞活农村。把农民都固定在农村，这也不让去，那也不让去，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是搞不活农村的，也是搞不好农业的。搞好农业要搞活流通，搞活流通，就要允许农民参与流通，鼓励农民参与流通，要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不能阻碍，更不能排斥农民参与。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服务于农民，农民在商品流通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商品流通了，政府可以在流通环节征税，市场可以在完善服务的过程中加强监管。监管也是服务。要提倡在服务中监管，在监管中服务。共产党的好政策是让农民富起来，“长途

贩运”助长农民“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罪名要取消，否则就会阻碍商品流通，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取消了这个罪名就会解放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和农民的富裕。

杜老让我把他的这番话带给我岳父邢亦民，因为岳父长期从事法律工作，而且他们两人也认识。我按杜老的要求把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岳父。杜老对我讲的这番话都已过去30多年了，看一看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速公路里程已排在世界第一位，国道、省道、县乡公路成网状连接形成了商品流通、资源流通和人员流通的大动脉。一些高速公路和国道还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保证农副产品的流通。农民参与的“长途贩运”已发展成为中国物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仓储、运输、市场、公路管理的发展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转移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国的统一的大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的组织、管理、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想一想30多年前，人民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最初年代，杜老讲的取消农民搞“长途贩运”“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助长资本主义的罪名，就会解放生产力这番话，可以使我们看到杜老是一位站在解放思想前沿的思想家。

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不是解决概念问题，是解决指导思想问题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时间长达一年半的全国理论界、经济界和企业界参与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1980年春节期间，我到杜老家拜年，在聊天中，我说，《人民日报》没有必要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人民日报》是党报，在党报上讨论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性问题，难道我们这个政党不懂“生产是为了消费”这个道理？这会让反对共产党的人指责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太低了，连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都不清楚，怎么能领导好国家的经济工作？会让人对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产生怀疑。



杜润生近照（徐庆全摄）

杜老听完我的议论后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怎么引发的，我不清楚，但是在《人民日报》上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里讨论的问题不是一个基本概念的问题，而是我们国家经济生活中，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概念问题清楚了，不等于实际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就没有问题了。在我们的经济中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马克思讲，物质的价值在使用中才表现出来。有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被使用，企业光计算了产量产值，这实际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而且在生产过程中还浪费了原材料，浪费了资源和劳动力。《人民日报》讨论这个问题，对于端正我们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有好处。短缺经济时期，缺什么就生产什么，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社会需求和人民消费的需求。在物质生产相对丰富时期，可就不是生产引导消费，而是消费引导生产，是人民的消费需求来引导生产。生产中要有竞争，竞争中就会体现技术的价值，知识的价值，管理的价值和人才的价值。你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你就要不断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这要依靠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不能是句空话，就要落实到实处了。这个讨论，更重要的可能是要解决一个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问题，就是怎样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过去是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这样的指导思想短时间内可以，长期这样就不行，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从人民的切实生活中体现出

来。如果讨论的目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讨论就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讨论可以提高我们的经济理论水平,统一思想认识,有利于做好经济工作。要重视这个讨论,不能简单地认为讨论没有意义,讨论是有重要意义的。要在讨论中学习,在学习中讨论,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是短时期就能完成的,需要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来认识。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就结束了。在现在看来,无论是理论界、经济界、学术界还是企业界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已经没有分歧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统一了人民在“生产目的”上的认识。我佩服杜老在讨论刚开始不久就看到了这场讨论的真正目的不是解决概念问题,不是学术争论问题,而是要解决实际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

三、我后半生想要做的三件事

2003年5月的一天,我到杜老家看望杜老,杜老特别高兴。杜老说:“你不来,我也要打电话叫你来,四川人民出版社把我前些年讲话和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书中收集了我从1980年至2000年这20年间的53篇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基本上反映了我的思想和主要观点,送给你一本。”杜老话落提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北英惠存 杜润生”。这本书是杜老对中国农村改革思索与实践的总结,是杜老对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大爱的结晶,更是一本留给我们晚辈的中国农村制度改革的历史教科书。我对杜老说:“我一定认真阅读这本书,我不是研究三农问题从事农业工作的,但我是做企业、做经济工作的,我会从你的农村改革思想与实践中吸取营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做好国企的改革和发展工作。”

杜老对我说:我的后半生想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组建一个公司,就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办这个公司的目的就是解决在市场化体制下,通过公司的良性运转,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资融资问题。投资农业有一定风险,也不会有很大的利润,国有银行都愿给工业、

大项目贷款,不愿投资农业小项目。成立中农信,作为一个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可以给农村中小项目和农民贷款,中农信办了三年还在成长发育探索阶段,后来中央决定关闭这个公司,这件事只是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个开头,但没能做下去,没有做成。

第二件事是想搞一个试验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南北两岸搞一个试验区。在这个试验区里搞种植、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相结合,乡镇企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建设好农村公路、学校、医院、文化体育设施。这个试验区可以称为中国农业农村改革与社会发展综合试验区。在这试验区里要研究解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问题。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能否大部分就地转移消化?少部分流动转移消化?这个试验区的招商引资政策要与沿海地区一样,有利于吸收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增加就业机会。现在每年春节前后,有上亿人在中国大地上流动,回家过节探亲,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返乡探亲,铁路、民航、公路交通压力都很大,农民工回家过年受苦受累,这种人口大流动,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资源、时间和人力的浪费。人口在大流动中只消耗资源,不创造社会财富。可是现在省市的领导不愿意做这个试验,就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合理布局,大部分富余劳动力在本地吸收消化解决,少部分离省离乡解决,减少每年短时间内的人口大迁徙的数量。中农信如果办成功了,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个试验区的投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会有,就会有人愿意去做这个改革试验,这件事只是有了一个想法,连个开头都没有,是个想做没有做的事,现在我老了这个事也做不了。

第三件事是想出书。把我这些年来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问题,农村社会发展问题和农民脱贫致富问题的思考、研究成果和写的有关三农问题的一些文章、讲话汇集成册,供后人借鉴研究。中国农村制度的变迁,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把我们参与过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这本书只是个文集,只收集了我的部分文章和讲话,要搞一个完整的文集,是个很大的工程,有很大的工作量,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和精力来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 朱永嘉 口述 金光耀 整理

江青为何找到姚文元

毛泽东在1967年谈到批《海瑞罢官》一事时说过，江青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姚文元的这个班子指的就是我们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江青为批《海瑞罢官》是1965年2月来上海的。在这之前，1964年10月江青在北京先找李希凡写批判文章。李希凡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把批《海瑞罢官》理解为写一篇纯粹的学术文章，与吴晗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还认为要把《海瑞罢官》与1962年的单干风联系起来很难，因为两者扯不到一起。11月间，江青为批判周扬的文艺思想又找过李希凡，但李希凡认为周扬是自己的上级领导，水平比自己高，所以也没有按江青的要求去做。

这些事都是李希凡自己告诉胡锡涛，我是从胡锡涛那里知道的。胡锡涛原是复旦中文系的教师，后调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文革”期间李希凡到上海来，当时我问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事，他没讲。江青找李希凡没能达到目的，就到上海来找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然后通过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将任务交给了姚文元。

那么江青为什么会先后找李希凡、姚文元这两个人呢？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北李南姚”之称了。他们两人都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党在思想文

艺战线上的“尖兵”。在学术上，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有其积极意义，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小人物则往往成了工具。以小人物牵制大人物，“以小制大”历来是帝王驾驭权臣的一种手段。对毛泽东来说，使用小人物还有其方便的地方，他可以进退有据。有了差错，可以说他们年青，有片面性，问题严重时，随时可以弃之一旁。而这些“小人物”又尽心尽力、感恩戴德地效忠于他，他们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这一点也正是“小人物”最可悲的地方。而小人物有了毛泽东的支持，也会以势压人。

姚文元是毛泽东在上海看中的“小人物”。姚文元出生于1931年12月，与我同年，1948年在读中学时参加了地下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崔震。上海解放后，崔震在蓬莱区委工作，做组织员。那时我是这个区清心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我是在高二时参加地下党的），崔震负责联系我的工作，是我的顶头上司。不过在“文革”时，我与姚文元都不知道我们之间还有这么一层关联。姚文元解放初在卢湾区团委任宣传干事，业余写一点文艺评论。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的文章，对姚雪垠关于文艺创作的看法提出商榷，这也是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姚雪垠是毛泽东关注的作家，所以姚文元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但姚文元真正起家的文章是“反右”运动中6

做了。出了这本书，也算是做成了一件事。

回忆杜老对我的这三次谈话，可以看到杜老的学者风范。他看问题不是看现象，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他愿意与人讨论问题，他提出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有很强的普遍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是很超前的。杜老明年就是

世纪老人了，我认识他也有半个世纪了。在我们的眼里，杜老不只是一位国家农业政策研究的领导者，他更像是一位研究三农问题的大科学家，和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先锋战士。■

（作者为中国国旅集团公司原副董事长）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这篇文章将《文汇报》的版面与其他报纸作对比,批判《文汇报》的办报方向不对。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在6月14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于是姚文元一下子成了“反右”英雄。姚文元这篇文章的着眼点是政治批判,与他以前的文艺评论是不一样的。作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兵,这是毛泽东为姚文元所确定的角色,姚也自觉地进入这样的角色,并主动地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为主人去寻找猎物,成了政治上的“撬棒”。由于他不是这些领域的行家,他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批评便不可能那么准确,所以人们会称他为“棍子”,成为一手拿框子,一手拿棍子,到处挑刺整人的人。但他乐于做这样的“棍子”,因为他是从正面去理解这个角色的,而且有党组织的需要,有市委在背后支持。

江青先找李希凡,没有弄成,再找姚文元,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人起家的路子不一样,姚文元是靠政治批判起家的,他的政治敏感性高于李希凡,李希凡则是靠学术起家的。所以,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姚文元跟上了,李希凡就跟不上,也因为这样,两个人后来的命运也不一样。就为人和品行而言,姚文元很像历史上的酷吏,如汉武帝时的张汤、杜周。张汤处理案子时都是对照《春秋》经文来办理的,按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判案,而杜周处理案子则完全根据皇帝的意旨。但张汤被逼自杀后,家中除皇帝赏赐外并无其他财产。姚文元写文章也完全是按上面的意图,自觉地去作好“尖兵”的角色。姚文元作为毛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善于深文周纳的刀笔吏,为受过他伤害的文化人所痛恨。然而,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角色与日常生活中的他还是有区别的。他在生活上可说非常简朴,平时穿着很随便,吃饭时拿个饭碗就到食堂去了。1967年1月4日,他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到武康路我们办公的地方来见他的妻子金英,正好是吃饭时间,他拿起饭碗就吃起来了。他对我们写作组成员的态度也始终没变过,并没有升到中央后就盛气凌人了。我与他前后相处十年,见面时始终非常正经而严肃,没有一句玩笑话,除了公事以外,从未谈过一件私事。姚文元与张春桥还是有

差异的。张比姚更有心机,姚比较单纯些,书生气重些。

姚文元找我提供有关海瑞的资料

姚文元接到批《海瑞罢官》这项任务后,大约在1965年的3、4月间来找我,因为批《海瑞罢官》与明史有关,而我是研究明史的。

当时我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的组长,组里还有王知常、吴瑞武和朱维铮。我们当时都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自发组成了一个写作集体。最早是我与王知常、朱维铮一起,写些关于乾嘉学派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取了一个笔名“罗思鼎”,即做革命的螺丝钉之意。1964年被上海市委集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一起去的还有金冲及,最初他是历史组的组长。借调我们是要写一篇与中苏论战有关的历史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未定稿》,用的也是罗思鼎这个笔名,从此它就成了历史组的集体笔名。那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他也兼管华东局的内刊。文章发表后,我们被集体留下来,因为内刊编辑部没有历史组。不久,石西民调到北京文化部工作,金冲及也被他带走。我们由张春桥接掌。因为张春桥不兼华东局的工作,上海市委属下的写作人员就与华东局内刊分手,单独成立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是徐景贤。写作班有三个组,文艺组由徐景贤负责,哲学组由郭仁杰负责。我们就成了写作班的历史组,由我担任组长。那时我们在丁香花园中厅老虎尾巴下的那个办公室里办公。

姚文元是到丁香花园直接来找我的,说市委布置他写文章,要我帮忙。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在这之前,我从未与姚文元见过面,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并不认识他。虽然我们都在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内工作过,姚文元兼任华东局内刊的编委,但并未看到过他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姚文元个头不高,比我矮,胖胖的,那时才30多岁,但已秃顶。他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也没改变。

当时姚文元对我说,市委让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要我帮助找些资料。他是奉市委之命,也就是以组织的身份来找我的。我这时一点也不知道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批判的对象,最初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还有就是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当时我将吴晗的书和文章拿给姚文元看,不是作为反面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的,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

在这之前我个人与吴晗有过直接的接触。1963年冬,吴晗为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事到上海来参加会议,会议是在锦江饭店举行的。我与谭其骧等都参加了。吴晗个子不高,头发微秃。虽为高官,但为人很和气。会议期间,白天开会,晚上我有时间与吴晗聊天。作为明史权威,吴晗主要研究元末明初这一段。我研究明史的重点在明朝后期特别是明清之际。我向吴晗谈了我对晚明和明清之际历史的一些基本看法,如明末的社会问题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王朝覆亡的原因,明王朝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与庞大的官僚机器内部的重重矛盾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吴晗听得很认真,并称赞我对于明史的看法。之后他对谭其骧讲,愿意收我为他的学生。谭其骧将这话告诉了我,我听后感到的不好办。因为我在复旦有自己的老师陈守实,转而去拜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为师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没答腔。但可以看出,吴晗通过与我的谈话对我的印象不错,还要我以后到北京就去找他。但到开始批《海瑞罢官》时,我是根本无法给他通消息的。

我是在看到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时才知道要批吴晗,这时已无话可说,更不要说打招呼了。当然吴晗更不会知道我在写作班帮助姚文元写文章批《海瑞罢官》了。后来展开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后,有人对姚文元说,朱永嘉是吴晗要收作学生的。在这之前,姚文元不知道此事,听了这话后就紧张了,忙问怎么回事。我就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姚文元也就不说什么了。当时如果把这一情况透露出去,肯定是一件大事。因为姚文元用了吴晗看中的人,这还了得。当然对我而言就更糟糕了。

向姚文元提供了最初的资料后,我又到图书

馆中找出《明史》、地方志和笔记中的相关资料提供给他。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在看了这些材料后,就要我谈谈如何看待海瑞这个人,谈谈嘉靖隆庆年间的历史背景。我就讲了海瑞的主要生平,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并讲了海瑞这个人耿直,敢讲话,廉洁,为老百姓做过几件事,还谈了学术界对海瑞的评价。这时我并不知道姚文元写这篇文章要批判谁。有人以为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我写的,这是不对的。但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来问我一些具体史实,以及一些资料应该怎么解释。姚文元的文章第一稿写完是5、6月间。我一直到9月第八稿出来时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之前他没给我看过。到第八稿给我看时,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这一稿我与他讨论过。第八稿差不多就是最后的定稿了,以后的修改都是局部性的修改,即材料或提法上的改动。姚文元写这篇文章是在高安路的华东局机关里,他与胡锡涛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胡告诉我,姚就在那里写的那篇文章。

我看到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时,它的重点就是批剧中的“退田”、“平冤狱”,认为海瑞的退田是退给中小地主和富农,而不是退给农民,所以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文章的第四部分将剧中的事情与1961、1962年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将退田与要求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因此《海瑞罢官》是现实中“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委的笔杆子,是市委在文艺界和理论界的代言人。所以他写文章,我们都知道是代表市委的,不会去问也不能问他文章的具体背景。我们相信市委,认为市委的决定总是正确的。当时我是共产党员,当然要听市委的,根本不会对姚文元写这篇文章有任何的疑问。那时我们的笔名“罗思鼎”,就是表示要做革命的螺丝钉,这也是列宁提倡的。

1965年9月陈丕显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给江青带去了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实际上就批判吴晗一事向彭真打了招呼,问他吴晗可不可以批。彭真接了话,说吴晗的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上海方面不向北京打招呼的问题,招呼是毛泽东

打的。当然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时不会很明白毛泽东话的含义，但姚文元文章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该会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

我是在10月底11月初知道姚文元的文章要发表了。那时我随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在上海郊区的横沙岛，与王知常等一起参加“四清”运动。我们是9月份下去的，在讨论完第八稿之后。我在横沙岛最偏僻靠海的一个大队，叫做新生大队的，担任“四清”工作队队长，负责这个大队的“四清”运动。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文汇报》的陆灏打电话到横沙岛，说姚文元的文章要发表了，要有事情做了，叫我回市区。于是我就结束了“四清”工作回到写作班。

那时我们写作班的办公地点已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到不远处的华山路与武康路转角上，门牌是武康路2号。这是一幢假三层的小洋房，属于警卫处管辖。屋前有一小花园。房子年久失修，非常简陋。我们的办公室在二楼西侧的一个大房间，内放六张写字桌，并排一字展开。我们历史组四人，每人一张桌子，姚文元也有一张，就在我的旁边。他不是每天都来，时常下午过来，见我们都在，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我们办公室的北面，他还有一个小间，许多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读书写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座小洋房先是成为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的所在地，以后是马（天水）、王（少庸）小组的办公室，马、王两人就是在此“解放”的，后来又成了关押陈丕显、曹荻秋、石西民的地方。我回到市区后就在武康路着手准备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工作，但并不知道文章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发表稿已经是第十多稿了。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几天，11月3、4或者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贤。我也在场，因为文章的最后改动，在资料上有问题总还得问我。

会议是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开的。陈丕显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方步，曹荻秋一会儿坐，一会儿站。陈丕显对张春桥讲，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

是有功劳的。杨西光问姚文元，你准备给吴晗带什么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什么？姚文元回答是什么就是什么。杨西光还问姚，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曹荻秋对文章中的具体细节提过一些意见。所以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上海市委同意才拿出去的，当然最后发表的时间是毛泽东决定的。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当天早晨，姚文元还在睡觉，陈丕显就给姚文元打电话，祝贺他文章发表了。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想到要给邓拓打个招呼，这是张春桥自己告诉我的。因为以前他们在晋察冀边区时在《晋察冀日报》共过事，邓拓是报纸的主编，张春桥是理论部主任，算是上下级和老朋友。但张春桥电话打过去，邓拓不在办公室，没有直接联系上。后来姚文元文章出来后不久，邓拓在11月下旬说过“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吴晗这时候就知道批判有来头，应该是邓拓告诉他的。

文章发表后的反应

姚文元的文章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解放日报》11月12日就在第二版转载，这是上海自己报纸的转载。接下来是华东地区的报纸相继转载，11月24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山东）、《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25日《安徽日报》26日《江西日报》。这些省份都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是知道姚文元这篇文章背景的，所以这是华东局打的招呼。在文章发表的第三天，北京市委宣传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分部来电询问文章的背景。上海没有正面回答，所以北京也就不对上海的文章作回应，两地赌气了。毛泽东9月份已就批吴晗一事给彭真打过招呼，此时就等着看彭真的反应了。但彭真并没觉得问题的严重性。这里有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毛泽东是11月17日到上海的，见北京不转载，就让上海印发单行本向全国征订。但北京最初就是不订。这反映北京对批《海瑞罢官》采取对立的态度。当时印单行本的规格是有严格规定的。上海怎么能和怎么敢擅自印发单行本呢？毛泽东是借此来进一步看北京的态度，也就是对毛泽东他

个人的态度。北京不订，毛泽东也赌气了，所以文章的是非已退居次要的地位。这种僵持的状况延续了半个月，是前所未有的。上海批了北京的副市长，北京却不作任何回应，这是很说明问题的。一些书上说，北京问上海姚文元文章有什么背景，上海没讲。这实际上并不是张春桥个人要封锁，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是陈丕显嘛。而毛泽东这时也在上海。最后打破这个僵局的还是陈丕显。11月25日，陈丕显在上海将文章的背景告诉了罗瑞卿，并托罗瑞卿转告周



朱永嘉(左一)、朱锡琪(左二,原市革委会常委,因4.12炮打张春桥下台)与本文整理者金光耀(左四)以及文革研究专家金大陆(左三)合影

总理。罗瑞卿让《解放军报》转载，总理则让《人民日报》转载。这样，十多天的僵局才被打破。《北京日报》也在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随后与北京相关的华北地区的河北和天津也在12月初转载了。《广州日报》是12月1日转载的，这是陈丕显通过陶铸的妻子曾志打的招呼。这时候转载就是政治表态，所以广州转载对陶铸是幸也是不幸。幸是“文革”开始后不久，陶铸就上调到北京任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而他的不幸也是从调入北京后开始的。

11月29日，上海在《文汇报》第二版以《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问题》为通栏标题开始刊登讨论文章。《文汇报》为此刊发的编者按语是张春桥自己写的，说要“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这篇编者按连续登载了六天，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11月29日当天《文汇报》发表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历史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来信，主要介绍了各自单位对姚文元文章的各种反应，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这几篇文章都是我们事先组织好的，待北京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才刊登出来。接着几天《文汇报》刊登的主要

是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姚文元观点的文章，以期引起争辩，这样讨论也就可以展开了。12月6日《文汇报》又在第一版将各地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间排列出来，并转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以这种方式将对待姚文元文章的不同态度显示出来。《解放军报》的口气很强硬，《北京日报》做出欢迎讨论的姿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是周总理定下来的，比较和缓些。12月7日起，《文汇报》开始陆续刊登吴晗《海瑞罢官》的剧本和赞扬这出戏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为此，张春桥又专门写了编者按。这时候，张春桥基本上还是按照1962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阶级斗争的路子来批《海瑞罢官》的。因为196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问题有过一系列的批示和讲话，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已经很激烈了。

12月上旬，彭真来上海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为批《海瑞罢官》一事找过张春桥，张春桥对此是高兴的。他对我说，彭真问你们上海准备怎样做，张对他说批《海瑞罢官》是学术讨论，并将上海组织讨论的计划和报纸上的按语都给彭真看了，彭真看了很满意，说等这一讨论结束了，你到北京来我请你吃烤鸭。实际上，上海批了

北京的副市长,彭真心里是不会高兴的。但张春桥给彭真看的确实是上海制订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张的办公室一起参与讨论和策划的,是在北京转载姚文元文章后制订的。而这时候的张春桥并不完全清楚这场批判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整个部署和指挥的都是毛泽东,张春桥也不过是毛泽东的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只是毛泽东这时并未走到台前。前台是彭真与张春桥之间的较量。彭真到上海是参加中央处理罗瑞卿的会议,会后毛泽东还让彭真负责罗瑞卿的案子。到后来处理彭真时,毛泽东又让刘少奇来主持中央会议。这是很厉害的一着。一面继续予以观察,一面让这些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不能抱成一团。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把他们当做走资派,用对付敌人的方式处理他们的问题,但在当时这还是党内问题,这种方式当然是错误的。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北京和上海的学术界、文化界都引起很大的震动。吴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后,一方面很紧张,一方面对姚文元联系现实政治所做的批判不服,认为《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而鼓吹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是1962年出现的,他无法在1960年预见1962年出现的事。吴晗的这些话,光明日报社编的《情况简编》和《文汇报》社编的《文汇情况》这两份内部刊物都刊登了。《文汇报》为此印的是白头的《文汇情况》,平时印的红头的《文汇情况》有固定的发放范围,而白头内刊不按原发放范围,除两份留底外,由张春桥直送江青,报给毛泽东。负责搜集情况的是《文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为此张春桥还讲过,艾玲对批《海瑞罢官》是有功的。所以“文革”中张春桥保过艾玲。姚文元为什么会在他文章的最后一节将“退田”与“单干风”联系起来,结合现实政治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呢?这不是姚文元的发明,他自己没有胆子这样去批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这是江青布置姚文元写这篇文章时便确定的主题。

毛泽东在12月下旬明确提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但我们写作班并不知情,仍是按照学术批判的要求着手准备文章。姚文元的文章在批吴晗时,认为吴晗美化了海瑞,海瑞退田并没有退还农民的田,退的只是属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投献”的土地。吴晗在他《关于〈海瑞罢

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则回应说,海瑞退田不是针对“投献”,而是针对“白夺”农民的土地。另有一些文章也对姚文元的上述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与历史事实不符。于是我们写作班就以“罗思鼎”的笔名写了《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一文(刊登于1966年2月1日《文汇报》),找了许多史料证明“白夺”与“投献”是一回事,从学术上帮姚文元堵漏洞,支撑姚文元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最初是我起草的,后来由王知常或吴瑞武改定。我们还以罗思鼎的笔名写了《论“告状”》一文(刊登于1966年4月1日《文汇报》),也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批判的。这是王知常执笔的。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复旦大学有人批判斗争我时,就拿出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关于“投献”的那篇,说我对吴晗假批判、真包庇,将批《海瑞罢官》引向学术讨论。

报纸上展开讨论后,上海在12月下旬组织过一次专家座谈会。由《文汇报》的陈虞孙出面召集,地点在北京西路的政协俱乐部。复旦的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华东师大的束世澂等都去了。我也参加了。因为我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是市委定的,且有中央的背景,会前我给谭其骧、陈守实打了招呼,要他们少说两句。但没跟周谷城和周予同讲,因为他们都住在市区,离学校比较远,结果周予同就对姚文元的文章放炮了。而谭其骧和陈守实在座谈会上就事论事地只讲了学术问题,不涉及吴晗的政治倾向。

关于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有没有击中要害的问题

以上是从我当时的经历来谈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过程。那时我所能见到和经历的只能是低层次的,有关这场讨论的最高层次的决策者是毛泽东。

对姚文元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胡绳、田家英等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里是讲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1970年12月

18日,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斯诺又提到姚文元
的文章与“文革”的关系,说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
不能理解两者间的关系。毛泽东说:“就是关于
《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
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
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
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
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
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
——《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
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
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毛泽东第一次说
没有打中要害,第二次又说击中了我们敌人的要
害,如何来理解毛泽东这两个相反的结论呢?

毛泽东第一次说没有击中要害,是指姚文元
的文章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与1962年刮单干
风、翻案风相关,而吴晗表示他的《海瑞罢官》发
表在1960年,他没有本领预见到以后要刮什么
风。毛泽东看了刊登吴晗意见的光明日报社编的
《情况简报》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后
来毛泽东说要害是“罢官”,是接受了康生的说
法,而那只是事后补救的一个说法而已。而姚文
元在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时与1962年的“刮风”
联起来,与江青的提示有关,所以才会在文章的
末尾加上与现实政治相联结的尾巴。事后徐景贤
问过姚文元,他当时知不知道要害在哪里。姚文
元说他也知道。

至于毛泽东与斯诺所说的姚的文章击中了
敌人的要害,那是从广义上讲发动“文革”的目
标而言。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可以看到,从1965年
初起,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都是在为“文化大革
命”做准备。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
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了一句:“你
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
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他在陈正人关于搞社教蹲
点的情况报告上写了分量很重的话:“官僚主义
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
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
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
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
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

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
人昭昭,是不行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插话
讲:“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
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
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
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
了,其他狐狸你慢慢清嘛!”后来斯诺问毛泽东,
什么时候想到要打倒刘少奇,毛泽东说就是讨论
“二十三条”的时候。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
从1965年初一直酝酿着如何发动这场运动。彭
真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对着干,
所以毛泽东才认为姚文元的文章击中了敌人的
要害,找到了对着斗下去的口子。因此,毛泽东前
后两次讲姚文元的文章没击中和击中要害,是对
着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讲的。■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书屋 2011年第5期目录

三湘阅读	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九十年,九十个伟大壮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九十个第一》	曹有鹏 刘金田
人物春秋	蔡元培的历史功勋 顾颉刚与谭慕愚 芝加哥的中国风 鲜为人知的李庄才女——游寿 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 清末民初热心扶植“新人”的说坛前辈	张家康 胡晓进 姜异新 耿法 李凌 孙超
口述历史	艺术创新和大学艺术教育 ——与陈文明对话	黄林非
艺术天地	谈书论画 在传统艺术面前慎言创新 巫术里的中国服饰	王宏任 陈昌友 颜湘君 伍魏
湖湘人物	国家主义文艺倡导者——胡云翼 邹汉勋咸丰元年系狱事考	陈正茂 弘征
说长论短	没有灯光通明的夜晚 “金刚不坏身”小议 “异史氏曰”的法律议论艺术 孔子“本相”初探	刘剑梅 吴子明 余宗其 宋红
书屋品茗	当古典遭遇世俗——谈阿袁的小说	张中驰
前言后语	《鲁迅藏品丛书》序 《批判与想象》序	黄乔生 杨扬
域外传真	税权与革命	李工
史思佚篇	茶叶贸易与中国近代化 1898—1927:王国维的反俄态度 培养学生向上的真实意志 ——读余家菊先生的《教育之生命》	周牧之 周帅 李良明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陶铸主政时的中宣部

○ 郝怀明

1966年6月6日上午，党中央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长陶铸到部上任。此时，办公楼内已是大字报满墙。“阎王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陶铸初到中宣部

陶铸精力充沛，马不停蹄，高速运转。当天，他首先接见了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收发室的同志，称赞他们放出了革命的第一枪。

接着，他同副部长们和处（局）长们见面。他说：在座的相当多的人是认识问题，我对同志们寄以希望。对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也还寄以希望。总的责任在彭真、陆定一，我们应负多少责任就承担多少责任，犯多少错误就改多少。思想认识问题，主要靠自觉。像我们这些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谁个没有错误，讲清楚就是了。问题是要改，改了就好。

陶铸的这番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到几分温暖。

中午，陶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会上讲话说：过去的中央宣传部，是修正主义的、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是彭、陆、罗、杨反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信心把中央宣传部变成革命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搞阶级斗争的宣传部。进行这场斗争的方针是坚决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问题。不论是谁的问题，有什么揭什么。充分揭露以后，再来分析，实事求是地定案。他要求犯有反党罪行的人彻底交代问题，指出只要真正愿意重新做人，党是允许革命的。他号召：“彻底捣毁阎王殿，把中央宣传部变成革命的中央宣传部。”

当天，中央书记处决定：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四人停职反省。陶铸说：“周扬有病，暂

不停职反省，让他安心休养。张子意是老革命，要区别对待，不停职反省，要照样送文件给他看。”



陶铸革命事迹陈列室陶铸雕像

当天，根据陶铸的意见，绝大多数党支部进行了改选，选举“真正的左派”领导各支部的运动。

第二天，成立中央宣传部临时联合办公室。主任为新到任时间不长的国内宣传处副处长吕少泉，副主任是阮铭。阮铭是部办公室的一般干部，行政16级，不久前，因为他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同聂元梓等站在一起，在部里还处于挨整的状态。不料《文艺座谈会纪要》出笼，他抓住机会，同阮若瑛一起写了一篇《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并上书江青，陈伯达即令正在郊区搞“四清”的他返城，江青召见后，即按照中央文革的旨意进行修改，令他时来运转。陶铸到中宣部走马上任之前，中央文革不知是哪位领导向他介绍了阮铭、阮若瑛的情况，说到中宣部后可找他们两位。陶来后对阮铭很器重，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陶铸在对待中宣部几位领导同志的问题上，应当说，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6月8日，他在中宣部所属各单位干部会议上说，陆定一有时很“左”，现在我也不认识他是什么人。周扬在文艺方面过去是个权威，有才华，我也很尊重他。对许立群，我在延安时就认识他，直到东北时期，对他印象不坏，他在好的领导下可以做许多工作。在当时对“阎王”们的一片“打倒”声中，陶铸能够这样讲，还是比较客观和公道的，是很不容易的。他还叫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代表他给在天津养病的周扬打电话，要他好好养病，并特意派人前去探望。

6月14日,陶铸召开工作队员和各支部正副书记会议,宣布中宣部文化革命工作队成立,张平化任队长。张平化来京前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陶铸在讲话中说,运动的主要锋芒,要对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黑线,解决敌我问题。强调要划清界限,用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来划清界限。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抵制、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左派、右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要在运动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他还说,不要把那些错误性质严重的人看做铁板一块。什么阎王、判官、牛头马面,都是纸老虎,是泥巴,是稻草,是木雕、泥塑,一击即垮。

新领导很有魄力,讲话很有感召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了“彻底捣毁阎王殿”的斗争。不管真积极也好,假积极也好,半真半假的积极也罢,反正是统统卷入到了运动中来了,各色人等的分化和组合,各种人物的表演,一幕幕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开始了。

我对运动的态度

我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部领导的号召,投身到运动中来。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接一篇,火药味一篇比一篇浓。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叫:“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必须“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的威风扫地”。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珏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革”结束后我才知道,此事是康生策划的“北大点火,往上搞”的阴谋。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大讲“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样一场搏斗中,丧失警

惕是危险的。”还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6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6月3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以及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同时配发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说:“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6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咄咄逼人地提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火辣辣的煽动性极强的语言,在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中不能不让你热血沸腾。

我在“阎王殿”没有做过多少工作,没有什么账可还,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党和人民培育了我,我一定要积极参加运动,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当资产阶级保皇派,一定要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周围,保卫红色江山,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不久之后,通过学习下发的文件,知道“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原来出自林彪之口,当时我觉得这话讲得好。尽管也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也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但此时已完全放在了脑后,大势所趋,不由你不努力跟上。这就是“文革”初期我的基本态度和总的取向。所谓“积极”,其实主要也就是照着文件上或报纸社论空表态,促老处长揭批“阎王殿”。由于自己来部里时间不长,没做过多少事,就我所做过的一点点工作和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想来想去,实在也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的。后来好不容易总算想出了一条:中宣部的办公室没有挂毛主席像(大礼堂除外)。当时还郑重其事地批了一通。

一些中层领导的态度

当然,对于阅历较深、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老

领导来讲,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对一些处长们来说,在运动来临的时候,他们当然也是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干革命的。既然毛主席已经给中宣部定了性,那么,他们就得来揭发、交代,甚至认罪了。但他们在思想上又怎么也想不到,中宣部怎么会是“阎王殿”,陆定一、周扬等部领导怎么会是“阎王”呢?即使在工作中有些不同的意见,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他们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自己又怎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搞,现在这么搞对不对呢?

从部长到处长,都处于极度的不解、不安和痛苦之中。

在天津养病的周扬对陶铸派来探望自己的同志们说:“这样闹下去是不行的啊!国家要出事啊。就没有人向毛主席说一声吗?”“江青她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怎么能这样搞?打倒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文艺界的同志们是一直跟党走,拥护毛主席的嘛。”(露菲:《生无所息为人民》,《忆周扬》第546页)

理论处处长陈道对说中宣部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心里也很抵触,难以接受。在处里的揭批会上,他在口头上不能不承认自己“有罪”,但又很不服气,他反问自己:“难道我对毛泽东思想一点感情也没有吗?”

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全处的揭批会上则公开表示,他不认为中宣部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他自己不去揭露什么“黑线”,也不同意别人去这么做。他公开为林润青、龚育之辩护,在全处的会议上说:“咱处的同志我都信得过。林润青、龚育之既有革命的积极性,又有修正主义的积极性。龚育之若在个好的领导下,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定会像姚文元、戚本禹那样发挥作用。”

出版处处长包之静根本否认陆定一长期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也不赞成对陆压制毛主席著作出版的指控,他坚持认为陆定一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粗制滥造,是怕出纰漏”。他说,1961年起草的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的文件,提出克服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简单化”、“庸俗化”的问题,心是好的。

理论处副处长洪禹,在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自

己是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心里又觉得委屈、苦闷。这位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经过考验的老革命,再次表现出了他的硬骨头精神。他在会上发言针对张平化在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他的意见:“对毛泽东思想怎样才算忠诚了,高举了?说说容易,不但要看过去,还要看运动中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他说:“揭露黑线是革命的,但也要实事求是,把问题说得越严重越好,那不是革命!”别人给他贴大字报,凡是不实事求是的地方,他都要加以“说明”或“解释”。在批斗他的会议上,他仍然坚持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都可以一分为二的观点。他说,毛主席说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呢?他的这种看法,那时遭到的自然是一通批判。他非常苦恼地说:“现在的气氛,很难使人讲话,连‘说明’都不允许,难呀!难呀!”“还看不清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左派的标准是什么?不能认为过去负责任多的,比如处长,都是右派;凡是负责任小的干部就是左派!”

干部处副处长郝一民贴出一张题为《十天来错误的检查兼为阎王殿的将校以上军官排队——履行管人事的‘牛头马面’副手应例行的职责》的书面检查,以调侃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运动的认识和情绪。他说:“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十天来扪心自省,感觉尤深,可以说一天等于二十年。不联系实际,不把自己摆进去,毛泽东思想是学不好的,林彪同志用字当头,活学活用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我想错了,大不过杀头(主席政策不可能),罢官有可能(一定会给饭吃),黑帮打黑枪我不怕,将来隐藏下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棍子,不必想那么远,总之为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保卫毛泽东思想胜利,把我字抛到九霄云外,对了活着跟毛主席走,死了去见马克思,错了活着重新做人,死了去见考茨基。”他给部长们和处长们排了个队,“阎王爷的位置:大阎王——‘一贯正确’地蛮横霸道,明红实黑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野心家。二阎王——赫赫一时三十年代的‘一贯正确’的文艺界学术界的权威。几名主将——年轻力壮‘善文有理,能说会道’硬钻死爬的‘一贯正确’的主将。一名老将——心怀不满,善于随机应变,坚决追随大阎王的‘老黄忠’。阎王殿的参谋长——不吭

耀邦同志向我了解西欧情况

○ 宋万国



“文革”中胡耀邦在干校劳动

1975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与在王府井大街散步的胡耀邦同志不期而遇。见到我阔别数年的老领导，我惊喜激动，疾步向前问候。耀邦右手

用力地握住我的手，左手拍打着我的肩膀，连连说笑道：“老同学、老战友、老领导，小宋同志你好哇？”我了解耀邦同志一向平易近人，说话风趣幽默，所以也就毫无拘束，没大没小地笑问：“这‘三老’又是从何谈起？”耀邦同志一板一眼地解释道：“我们都是团中央‘五七’干校的学员，算不算老同学？我们都是‘五七’战士，算不算老战友？在干校你是班长，我是普通一兵，我应不应该称你为领导？”

我听团中央老同事说，对耀邦的所谓“审查”早已结束。“四人帮”扣在耀邦头上的“走资派”、“修正主义”等帽子纯属诬陷。1971年他就从干校回到北京，

可在当时“文革”噩梦还未结束，历史尚未复苏的特定政治环境下，他一直赋闲在家，等待中央分配工作。

不响，‘胸怀大志，精明强干’，誓死效忠阎王的参谋长。一个根本共同点：‘一贯正确’？”“‘将校’级角色排队：1、牛头马面和判官；2、忠实的奴才，或贾贵的后代；3、驯服的工具（有的挨过棍棒，有的思想共鸣）；4、明驯暗不满的准备逃跑懦夫；5、叛逆的英雄（极个别或者还得发现）。”对他自己，他说：“我是十级干部，大约相当‘大校’，在阎王殿主管人事副手，我从最坏处着想，暂且列入牛头马面判官之列，对我的一言一行，从早到今，诚心地心悦诚服地欢迎同志们手枪、机关枪、大炮加重炮轰击我。我们这些大大小小都是有嫌的甚至有罪的，怎能不还？还清就能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将来为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当然轰击时，感情上是难受的，但毛泽东思想加上‘眠而通’，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一旦毛泽东思想在你的灵魂深处占据了阵地，你就精神解放了。”郝一民的这张

大字报当时被批判为“暴露了他的反动阴暗心理，同时向党施放了很多恶毒的暗箭”。这篇大字报隐晦曲折地道出了这位处长当时的真实的思想。虽然在高压下不得不跟，不得不做这样的“检查”，但在思想深处，他并不认为“阎王殿”、“阎王”们，以及他本人，真的有什么可以构成“罪行”的问题。当然在态度上还是要表示欢迎“重炮轰击”，愿意“重新做人”了。可谓中宣部局级干部在“文革”初期的态度中让人赏心悦目的一景。

陶铸说得对，含义也很深：“陆定一有时很‘左’，现在我也不认识他是什么人。”试问，在中宣部的其他部长们和处长们以及普通干部中，又有谁能够认得清楚陆定一“现在”是“什么人”，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从思想上完全认同毛泽东对陆定一和中宣部的判定呢？■

（责任编辑 萧 徐）

耀邦询问我离开干校后的情况，我告诉他：1971年调外交部后，很快被分配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工作。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4月下旬即将访华，我随大使回国参加接待工作。我又透露，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管外交事务的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爵士也将于5月上旬访华，商谈与我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事宜。闻此，耀邦同志兴趣倍增，忙说：“小宋同志，你在西欧工作生活多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一定有所研究。我很想了解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我知之甚少，但也很感兴趣。这样吧，我们专门约个时间，我请你来家吃饭。我院子里的香椿又嫩又香，恰是采食的好季节，我请你吃香椿炒鸡蛋。咱们好好聊聊，请你详细地介绍一下西欧国家的情况。”我深知耀邦历来重视调研工作，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并把再次会面议约在那个周日的下午。

届时，我如约来到耀邦同志的家。他当时住在灯市西口富强胡同六号。这是一处分前、中、后三个庭院的四合院，原是满清一个官宦人家的房产。“文革”前耀邦就住在这里，前院和中院是他办公会客用房以及他家人住室。后院则是团中央另一位书记胡克实同志的住处。四合院高墙耸立，与市井的嘈杂声隔开，安静极了。我对这个四合院并不陌生，“文革”前耀邦在这里接见过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我当过翻译。还有，“文革”初期，耀邦遭“四人帮”陷害，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前院的房子均被分配给团中央机关无房户居住。我当时刚结婚，还临时在前院已用隔山墙分为两室的大屋中的一小间住过。没住几个月，我就搬走了，不过这处四合院留给我的印象还是满深的。

晚饭很丰盛，除了香椿炒鸡蛋，还有从全聚德买来的烤鸭。

饭后，我和耀邦从餐厅回到会客室继续品茗聊天。我概括地介绍了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情况后说，这些国家工农业生产都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我们要高出一大截。大部分家庭拥有比较宽敞舒适的住房，当然非洲、中东等国家的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居住条件比较差，多数家庭购买了小轿车，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也很普及。人家已经用上了彩色电视，而我们连9英寸的黑白电视还要走后门，凭票才能买到。他们的

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又多为家庭式适度规模经营，生产率很高，只有百分之几的人口从事农业，农产品却自给有余。法国、荷兰都是世界主要农产品和农业食品出口国。而我们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90%人口从事农业，却缺吃、少穿，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我接着补充说，这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总的来看社会是比较稳定的，罢工、游行示威也有，但经济性的居多，政治性的很少，劳资纠纷也往往通过协商或政府出面调解而得到解决。最后，我用一种戏谑的语气说：“反正，我至今还得出资本主义已经危机四伏，腐朽没落到行将就木的结论，我也没觉察到那里的人民正在热切等待什么人去解放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耀邦淡淡地笑了笑说，我从别的渠道也了解到一些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你谈的基本一致。资本主义诞生几百年来，已经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看来这些体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在适应和自我调节中，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空间，还没到垂死阶段。耀邦接着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是一次革命，其核心是要消灭剥削，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逐步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光喊政治口号，只抓革命，不抓生产，不发展经济，不创造物质财富，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他沉重地说，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中国还是这么落后，老百姓还是这么穷，连吃饭、穿衣、住房这些人类生存基本条件都没有得到解决，值得好好总结一下。我看不是社会主义不优越，而是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耀邦同志越说越激愤，突然站起来，从身后的书柜拿出一本《马恩全集》读了一段，引经据典地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这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发展经济，只搞政治，基础不牢，上层建筑能巩固吗？

在当时那种诡谲难测的政治环境下，耀邦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令人振聋发聩。

我们一直聊到十点多，但仍觉得谈兴未尽。我依依不舍地与耀邦握手告别。■

（责任编辑 萧 徐）

政治与学术：一篇文章的遭遇

○ 苏双碧

1989年10月,正当思想理论领域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际,我写了一篇题为《略谈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企图在这场大批判中划出一条界限,避免广大知识分子人心惶惶。不料这篇我自以为在当时可供有关部门参考的文章,却被权威部门的掌权者扼杀,甚至连当时我国最高理论权威之一胡乔木的肯定意见也无济于事。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一些什么呢?为说明问题,把文章的相关要点摘录于下:

主要观点

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能不能分开,要不要分开?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确实,有一部分学术问题,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的学术问题,同实际政治问题是不太容易分开的。不过,学术和政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从这点来说,它们又是可以分开的。这个问题的争论,本来是个认识问题,或者叫做对问题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实际上,它又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

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不少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担心某些学术观点被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有的学者又重新提出,希望政治和学术应有个界限。这是可以理解的。近年来,学术领域出现一些错误观点,这些大部分都可以靠百家争鸣,或叫做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加以澄清。如果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分开,把学术上有错误的观点都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那还能开展什么百家争鸣呢?实际上,这个问题过去已有不少人论证过,政治和学术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尽管社会科学某些学科的学术问题是和政治问题很难截然分开的。但是,大部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等同的。一般说来,政治问题在不同性质的国家以及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

理解,在我国现阶段,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这些都是属于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学术问题,则是指科学领域中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如何认识的问题。以社会科学为例,大约可以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学术问题和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如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和法制问题,新闻的真实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有无时代局限性,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当做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但这些问题本身又都是政治问题。那么,诸如这类的问题如何区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呢?我认为根本问题是出发点和目的性问题。如果探讨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或者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介的作用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即使有截然不同的意见,甚至错误的意见,那仍然是学术问题。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局限性,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一样,都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部分是科学的,特别是它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个别观点和个别论断受时代局限;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观点都受到时代局限,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充满着活力,它应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观点去看待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

当然,有些问题,本来就是政治问题,如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问题,是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必须坚持贯彻的。但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坚决贯彻,在一般情况下同样是可以讨论的。这种讨论可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更好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应该提倡,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可以

“百家争鸣”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重大政策方针的精神，以及更好地阐明这些理论观点。有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最好在决策之前进行讨论，这有助于中央对某一问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可以减少失误。

其二，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有间接关系的。即本来是学术性较强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对现实有借鉴作用。如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长期性，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以及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这些都属于学术问题的范畴，都是可以通过“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的长期性，有儒家思想影响说，有小农经济影响说，以及其他种种说法。这些说法各自都可以找出几条理由和根据，也可能各自都有其片面的一面。但不论持什么观点，都属于学术探讨，不同意见可以争鸣，都应该受到尊重。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作用，在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后，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较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时还会沉渣泛起，从某一方面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因此，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本身又是带有政治性的，它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任务。不过，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剔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树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想和观点。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学术讨论和理论争鸣的程序来进行。

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有的主张是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有的则认为农民战争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的主张功过兼有，或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各种观点有正确或错误之别，讨论时可以各抒己见。各种主张都是不同学术观点的反映，谈不上是政治问题。但有些论者，把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评价，引进现实政治生活之中，借以论证社会主义社会的所谓弊端，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例如封建社会的历史人物，如陈胜、刘邦、李世民、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以及现代史上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学术界都有不同的评价，褒与贬都是学术问题。应该允许自由讨论、不应随便扣上“政治”的帽子。

上举三例，可以看出，对有些问题的讨论，争鸣者如果都是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讨论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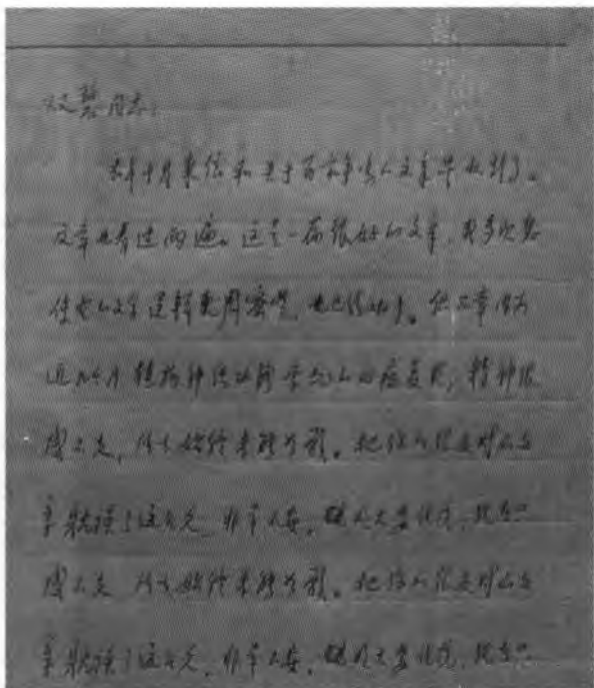
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那么，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只能是学术问题，是可以自由讨论的。

其三，学术问题和政治相去较远的。如果不是蓄意借古讽今，学术问题是不会转化成政治问题的。这方面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占大多数。诸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学术流派，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宗教、道德、文化、艺术，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是学术问题。尽管在讨论中，观点分歧截然，很难弥合，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都应该受到欢迎。有人也许会问，在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一伙不是把研究海瑞逼徐阶退田，诬称为要退人民公社的田吗？把研究海瑞平冤狱，诬称为替地富反坏鸣冤叫屈吗？那么，那些海瑞的研究者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呢？我认为在“四人帮”那个指鹿为马、是非颠倒的年代，他们是以权力来衡量是非标准的，并不需要遵循什么客观的学术讨论规律。包括过去被“左”倾思想扭曲的年代，把学术问题任意上纲为政治问题的例子是大量存在的。不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这些做法已经为广大学术界所否定。

其四，纯技术性的讨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基本上没有关系。如考古年代、文物鉴定、版本考异，等等。这些问题的学术争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而不论正确和错误的判断，都和政治没有关系。不一定过多强调研究者在研究这些课题中必须遵循某一种指导思想或立场、观点。

关于学术和政治的关系，谈了上面四种情况，可以认为就学术领域而言，绝大部分学术研究者和学术工作者，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学术争鸣，应多是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的。因此，他们所参与的学术争鸣，都应当受到尊重，而不应被任意当做政治问题加以批评。

百家争鸣方针是1956年提出的，三十多年来，百家争鸣之所以没有贯彻好，主要是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把不同的学术观点，上升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观点。这样一来，任何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就变成不同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里的反映，学术问题随时都可以上升为政治问题，“百家争



胡乔木同志给苏双碧的信

鸣”被扼杀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党克服了曾经犯过的“左”的错误,最近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我们党又从另一方面纠正和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可以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在学术领域里开展百家争鸣,提倡对学术问题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许多重大的科学成果和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见解,都是在勇于探索中产生的,只有解放思想,才会突破前人的窠臼。学术问题大多是在短期间里看不清楚的,只有经过长期而深入的探讨,真理和谬误才会逐步明朗化。因此,我们提倡在“百家争鸣”中,争鸣者只要介入对某一学术问题的争鸣,就应该对某一问题认真研究和深入理解,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才能把百家争鸣开展得更好更健康。

乔木认为文章“很好”“很及时”

上面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当时写这样的文章用意应当是清楚的。文章脱稿后,我把它交给当时《求是》杂志的编委会,本意是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一位编委看过后,认为这篇文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立即越级向上级主管部门的掌权

者报告。这位掌权者偏听偏信,在缺乏对文章分析的情况下,下令扼杀这篇文章。

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几天之后,胡乔木在《求是》杂志会客室接待外宾,我作为《求是》杂志副总编辑陪同接见。送走外宾之后,乔木问我“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就把这篇主张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分开的观点说了一下,并告诉他文章“内部有不同意见”。乔木表示要看看这篇文章。几天后我把文稿寄给了他。没有想到乔木这么认真,他不但抱病看过两遍,而且动笔进行修改,并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连同修改过的文稿寄给我。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双碧同志:

去年十月来信和关于百家争鸣的文章早收到了。文章也看过两遍。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我多次想使它的文字逻辑更周密些,已经动手。但不幸因为近几个月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旧病复发,精神很感不支,所以始终未能如愿。把你的很及时的文章耽误了这么久,非常不安。明天要住院,现在只好把大作退回,请求是编委酌定。情非得已,万乞鉴谅!

胡乔木

二月二十日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乔木是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的,并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而且,他写这封信是十分严肃的,绝不是一种“客气”。因为这篇文章谈的是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要不要贯彻“百家争鸣”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不论是谁对这个问题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时,都不可能会是随意即来的,乔木也当是如此。鉴于前面有不同意见的原因,我只把乔木的信送给总编辑看,并在来信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字:“这是乔木同志给我的信,请你看看,看后退我。”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了解,也有同意我文章观点的,那位编委的意见未必是对的。

一个荒唐的传言

乔木的意见虽没有在《求是》得到重视。但当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张云声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就要了去,说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并排出

一位党史教员在百家争鸣后的遭遇

○ 张寄谦

荣天琳同志(1918—2009)是北京大学最资深的中共党史与中国现代史教员之一。早在1950年代,他在党内就是北大历史系党总支委员,在教学行政上是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副主任,负责现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1957年下半年,他因撰写并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横遭批判。

荣天琳出生在东北辽宁一个产业工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二中教书,在北京二中的校史中有这样的记录与评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二中是反动派竭力严密控制的学校之一。但历史教师荣天琳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在二中发展了‘人教联’,建立了读书会,将革命的火种带到了二中。”(校史编写组集体讨论、范基公执笔《北京二中建校75周年纪念册》,1985年3月印。)

大样。张云声亲自在文字上进行一些处理,并将标题改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百家争鸣”的关系》。他认为“题目似可改得明确些好。”说明张云声对这篇文章是积极的,认为可用的。但是《人民日报》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事被那位当权者知道了,他又以这个问题“说不清楚”为由,出面干涉,不让《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并说乔木处由他去解释。

怎样解释就不得而知了。几天之后,一个荒唐的传言出来了,说乔木给我的信是“客气”。这个说法之所以荒唐:其一,乔木如果仅仅是为了“客气”,在信中说明身体欠佳,不能看稿,表示歉意,就足够了,何必违心地写了这么长的信,又提出这么肯定的意见。其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不要贯彻“百家争鸣”,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要不要分开,是个原则问题。乔木当不会拿原则去作交换,违心地肯定这篇文章。其三,如果是为了“客气”,对文章说句“客气”话也就可以了,何必

建国后,荣天琳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班学习,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了党史专业的学习,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党史与现代史教学与研究的骨干。19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在北大像荣天琳这样既有光荣革命经历,又能直接从事教学科研的人才屈指可数。所以,他很快担任了教研室副主任。

荣天琳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现状的剖析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论十大关系》的讨论作总结讲话,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

亲自动笔去修改呢,而修改的落笔是很认真的。例如,在文章的开头部分有一句:“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太好分开的”,乔木将后半句改成“同实际政治问题是不大容易分开的”。在原文“或者叫做对问题的理解角度不同”之后,他还加了这么一段:“在我国过去历史上,包括新中国历史上,确曾有过把学术问题强行政治化,产生学术自由受到无端干涉的严重局面。近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基本改变,学术界逐步出现繁荣景象。但又出现了另一种令人注意的倾向。”凡此等等,和“客气”能划等号吗?我怀疑这个“客气”,是某些人为了需要编造出来的。退一步说,如果“客气”两字当真出自乔木之口,这实在也太可悲了。作为我国可数的理论权威,身体又长期处在病态之中,还得被迫说出违心的“客气”话,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作者为《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着一个胜利；对于那些暂时加入了党以后又叛变了的知识分子，不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进行分析，对陈独秀是用简单的方法骂倒，对其他人物也不敢恰如其分地安排其历史地位，对复杂的历史事件，不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肢解了历史的真实全貌。

其二是缺乏大量的历史资料。首先是旧政权原始档案缺漏分散和已编成的历史资料非常贫乏，解放后对于旧档案旧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迟缓不前，又无区别地禁止了一大批资料的流通。其次是党的原始档案、文件、资料及领导同志著作固然因战争残酷有所散失，但人为的困难就是对这些资料

过严的保密制度。例如，要批判“王明路线”，没有《两条路线》一书；要批判支持王明的斯大林的“共产国际路线”，又没有共产国际决议的原文；要讲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性，又未见过原决议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结果必然导致人云亦云。荣文也特别批评了把阅读党史上有关资料作为一种政治待遇，实际的研究工作者却被拒之门外的做法。许多党的历史上的文件，国内研究者看不见，国外的大学图书馆里却有。希望对研究者放宽限制的尺度，否则，势必束缚自己手脚，延长了教条主义的寿命。

在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成为党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繁荣的根本方针。

“双百方针”既然是党中央的决策，历史学界当然也就会有所动作。当时，北大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邵循正先生不知在什么场合下见到范老（范文澜），范老就史学研究贯彻“双百方针”谈了一些意见，其中谈到了可以开始民国史研究等涉及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问题，邵先生回到系里后，在教室内传达了 this 精神。荣天琳听后受到鼓舞，开始把他在现代史教学与研究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梳理，以荣琅为笔名撰写了《克服教条主义，加强中国现代史的科学研究》一文（以下称荣文），在《光明日报·史学》上发表。（荣琅（荣天琳）：《克服教条主义，加强中国现代史的科学研究》，《光明日报》1957年6月20日，《史学》双周刊第110号。）

荣文提出，解放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

其一是教条主义的束缚。由于研究者缺乏大量历史资料，只能引证党的文件决议和经典著作中的现成结论，不敢独立思考，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叙述得简单化、概念化。例如叙述党的成立时期时，有如党一成立就很成熟，一个胜利接

其三是百家争鸣中的思想顾虑。荣文认为，“目前现代史许多方面‘放’不出来‘鸣’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怕资料不全讲错了受批评；又因现代史革命史在政治上理论上现实意义大，研究者不敢对某些定论大胆思考，怕讲错了发生原则错误，也怕引起误解，被扣上大帽子。”荣文中还指出，虽然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口号，可史学界却又产生了“重古轻今”的情绪，现代史依旧默默无闻。有人把古代史比作一杯“浓茶”，说它味道醇厚，左右逢源，把近代现代史比作一杯“淡水”，说它除了讲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反抗斗争外，再没有什么重要东西。最后只能是搞现代不如搞近代，搞近代不如搞古代，必须及早注意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荣天琳提出，对科学研究加强思想领导，必须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倡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风气，鼓励研究者根据充足的资料对传统的看法有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精神，以解除其思想顾虑，在资料上给以足够的支持，对研究上的困难给以热情的帮助。他认为，从1919年“五四”到1949年，已经整整三十年，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讲，这已算作历史的陈迹了。按中国传统惯例，修前代的历史，是后代不容推辞的道义责任，除了私家大量著述外，就是封建君主，也都在开国之初，延揽鸿儒，成立史馆，搜集史料，修为正史。“中国向来是以历史悠久史料浩繁著称于世界的。只有中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争气。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但一定要无愧于先人，而且要继承这一个光荣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阶段。”

作为建国后即从教的历史教员，我感到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对我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当时开始的全面学习苏联。1937年5月，斯大林发表《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一文，要求将联共(布)历史的叙述与国家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并亲自拟定教程大纲，作为编写教科书的参照。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苏联史学的政治功能被人为地夸大，史学成为一种专为政党服务的舆论宣传工具。对历史科学研究过多的行政干预，必然妨碍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研究被纳入政治轨道，掩盖了一些客观存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苏联的史学研究体系，在建国初期开始为我国史学界接受，同时，这套体系给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这包括对历史学研究内容的限制，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形成大量禁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已经引起了像荣天琳这样直接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者的注意与焦虑，在党中央“双百方针”精神的鼓舞下，老荣很自然地也就写出了上述文章。

文章发表后的遭遇

我本人当时是《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的责任编辑之一(该周刊的编辑任务由北大历史系承

担)，但我已经回忆不出当时刊发荣文的始末了。这篇文章的刊登日期是1957年6月20日，而在6月8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也就是说，当荣文发表时，大规模反右派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篇文章直到6月12日才印发党内。但是，到6月20日，反右运动的降临应该已经比较明显了，《光明日报》为什么这时还会发这样的文章？一种情况可能是荣天琳坚持自己的观点，要求发稿；另一种情况则是上面授意继续发这些争鸣文章。总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还远未意识到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从编辑的角度讲，在前一期《光明日报·史学》于6月6日刊出时，后两期的文章已经大致选定，除非有特别重要的文章可以调整之外，就有待于上级审批最后见报。也就是说，荣天琳的文章交稿时间应不迟于5月20日，可能还要早一些。因此，荣文作为贯彻“双百”方针的学习体会，其写作和编辑得到《光明日报·史学》的支持，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是在荣文公开发表前，反右已经公开化，审批者的判断标准自然也就随之改变。如果对同志负责任，荣文完全可以拿下不发，荣天琳作为老党员，也不大可能坚持要求发稿，这毕竟只是学术探讨，不是所谓帮助整风或鸣放的内容。

结果却是荣文被发表，而且在公开见报后就立即被作为批判对象，在北大历史系，荣天琳开始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做检查，《光明日报》也在组织进行公开的批判。

10月10日，还是在《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上，发表了署名夏自强、张注洪的《驳斥荣琅‘克服教条主义，加强中国现代史的科学研究’一文的谬误论调》的文章。这篇文章以超过荣文近一倍的篇幅，对荣文大加鞭挞。该文指责荣文抹杀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成就，把解放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状况描写得漆黑一团。指责荣文从否定现代史档案、资料工作成就出发，向党的领导和保

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指责荣文极力散布一种怀疑情绪,即“党过去所作的现代史上的若干结论是缺乏充分的材料依据的。而今天党又严格地垄断着资料,压制着研究者不可能也不敢进行‘独立思考’。”批判文章说,“荣琅为什么要大声疾呼对‘定论’大胆怀疑呢?我们认为除了由于阶级立场的对立外,还由于对‘百家争鸣’‘独立思考’作了错误的理解。他认为百家争鸣就是‘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就是独立于定论(也就是马列主义)之外去思考,片面追求人云我不云,我云人所未云。”文章的最后一小节,以“反对封建和资产阶级‘史学’复辟,坚持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口号收尾。(夏自强、张注洪:《驳斥荣琅‘克服教条主义 加强中国现代史的科学研究的谬误论调’》,《光明日报》1957年10月10日,《史学》双周刊第118号。)

夏自强时任北大历史系的党总支书记,他与别人联名撰写批判文章应该是受到反右运动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当时夏自强与荣天琳同为总支委员,应该是很有感情的,但荣的文章确实又处在了风口浪尖上,他无法不做出批判的姿态。批判文章的另一作者张注洪也是北大历史系教师,他不是党员但却积极参加了有组织的批判,而且其负责的批判文章的后半部分上纲上线更为严厉,也可反映当时运动的一部分特点。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中的记载,北大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教职工120人(教授、副教授12人),学生596人。(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970页。)当时戴帽右

派人数占到北大师生总数的近7%,教职员中的右派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周一良先生的儿子周启博写过一篇短文《邻家小儿话‘翦老’》中说,历史系教师中只划了向达、夏应元、张广达三个右派,低于各系平均数。他引述张广达(原北大历史系教员,一位旅居海外,在中西交通史上很有造诣的学者)的看法,张认为夏自强在反右中保护了系内教师,应予肯定。(周启博:《邻家小儿话‘翦老’》,燕谈/历史长廊。http://www.yantan.cc/bbs/thread-86026-1-1.html)确实,荣天琳由于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本人又有革命历史,最后只是在党内受到处分,撤了总支委员,并未被划为右派,应该说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中国现代史的教研工作受到极大影响。在1958年的“跃进”浪潮中,北大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在五年规划中提出:“中国现代史必须以革命史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为主干,全面地讲授革命斗争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五年规划修正草案》,《光明日报》1958年7月21日,《史学》双周刊第137号。)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内容已为中共党史所替代,而那时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成了“十一次路线斗争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现代史的教研工作才得以拨乱反正,应该说,当年荣天琳同志在其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在今天都已基本解决,1919年到1949年这一段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已几无禁区,现代史研究默默无闻的局面得到了根本转变。■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已离休)

(责任编辑 萧 徐)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介绍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是从《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至1995年计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的重点文章150万字,编辑为五卷珍藏本,分别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该珍藏本出版后一度脱销。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精品书系五卷珍藏本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由于数量有限,恕不分卷出售,欲购从速。定价125元,另加邮资12元。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联系电话:010-68532048,传真:010-68532569。

信访制度存废议

○ 邵燕祥

信访制度应存？应废？这还真是个问题。

信访，全称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最近看到一则旧闻，说把接待群众信访形成制度，建立接待室、接待站，最初缘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动议。田家英在1966年文革初起就死于非命了，因此信访制度之兴，当在文革以前，乃至1950年代。据说是当时田家英所在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每天接到的来信太多了，穷于应付（这是我今天的用词，田家英他们应该是欣喜于群众对党的信任，想方设法做到有信必复，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于是乃有把处理来信来访有关工作制度化之议吧。

当时似乎是来信多于来访，因为没听说中南海门前排队等着接待（在中南海西门外不远处设中共中央、国务院信访接待室，该是后来的事情）。而来信大抵能做到件件有着落。不久前，影视名演员王刚在电视中说起，他上小学时受到一些偏见导致的歧视，就曾写信给毛主席，后来收到中央办公厅的复信，对他开导勉励有加，他的处境也改善了。你想，连一个小学生的信都作复，这工作量岂不可观。这不奇怪，建政初期，进入中南海不久的毛泽东，对于来自湖南等地亲朋故旧的来信，也多是一一亲笔回复，我们见到过在“中央人民政府信笺”八行书上龙飞凤舞的毛手迹，远不止一件两件。

还可以举我的父亲为例：一个“留用人员”，在“三、五反”运动期间，因私房出租给公家，牵连所及，关涉产权，他情急之下写信给“中共中央毛主席”申诉，经中办转有关单位查询，问题得到较合理的解决。在这过程中，没有人对他进行“政审”——没有因为发现他“解放前三年”曾是“联勤总医院”的“上校军医正”而不予受理。

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共和国的上升时期，颇有点四海升平、言路畅通的开国气象。到了1958年，“大跃进”后果显现，从吃不饱到饿死人，各地干部群众纷纷上书中央，多数泥牛入海，

没有下文。没有下文算是好的，否则就是受到追究查办。饿死100万人的河南信阳就是这样，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反映真实情况的信，在当地全被截留，连写“内参”的新华社记者也在郑州火车站被阻。隐瞒不报，难道仅是吴芝圃一手遮天的河南的土政策吗？后来证明，其他省份以至市县莫不皆然，究竟各地之间是经验推广，或无师自通，还是上级有统一布置？直到现在也没有邮政部门的经手人出来作证。

到了1966年开始的文革，一切坏事都变本加厉。各地通过邮局查扣的信件，成为制造冤案的依据。在了解傅雷夫妇自杀及后事时听说，与他们并不相识而为他们收尸下葬的基督徒江小奇女士，就因她给周恩来总理反映情况和意见的信被查扣，随之遭受拘押批斗。几乎从那时候起，不管是什么观点的群众组织或个人，要有信件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以至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全都不走邮路，而是各自找“关系”，通过不同的渠道上送（这种风气似乎一直迁延至今）。

这就是原先宪法明文规定公民享有的通信自由在文革中遭到彻底践踏的状况。

“上书”有罪！这就是大体上从文革开始公开化明朗化的一个事实。

当时很多年轻人不知就里，轻信“北京”，冒犯禁区。老实农民恪守“屈死不告状”的经验信条，保全性命于乱世。

有了这个十年文革的背景，便知毛泽东死后文革告一段落，为什么人们会有“解放”的感觉。誓言“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胡耀邦，率先为平反冤假错案开路，一时他所在的中央组织部，以及统战部、公安部等部门的信访接待站门庭若市。由于以党的名义拨乱反正，伸张正义，那段日子里，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达到一个后来难得再见的高度。当时，接待来访的工作人员，大多也在极“左”统治下受过打击迫害，他们倾听来访者的

陈述,往往感同身受,不能不唤起同情。文革前任公安部群众出版社领导的诗人张志民,这时一度参与接待群众信访,但他在文革中坐牢多年,身体衰弱,精神上再也承受不起过分的激动感伤,最终不得不调离接待工作。说这些,只是表明,当时做信访工作的,和来信来访的当事人,心往一处想,话能说到一块儿。来信来访者对信访站的信任,体现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信访工作人员的工作值得信任,也就提高了党的亲和力。这样的情景,可惜不复见于今天了。

今天,为什么要谈信访制度的存废呢?

因为,围绕信访,成本太高了。从来访者这边说,不仅时间投入过大,有的一拖经年,甚至不止一两年,三五年,反反复复,不得要领;而且有时出县跨省,仆仆于进京路上,身心交瘁,财力支绌,但只落得一张状纸转来转去,一无所获。更甚者,他们还要承担横加的罪名(把合法行为指为违法,如破坏安定团结之类),从乡镇起,遭遇层层“截访”,强制递解,穿制服的不穿制服的都可以对他们推搡叫骂,拳打脚踢,随意诬为“缠访”“闹访”,滥施侮辱,直到非法拘禁。就是说,上访的人满怀对共产党办的信访接待站的信任而来,一路上却频遭兜头的冷水,还要付出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代价。

而从各级政府那边看,为了防备和制止上访,把上访群众截于乡,截于路,截于信访站门前,要出钱,出车,还要出动人力,警力,甚至借助于类似黑社会势力的“保安公司”及雇佣社会流氓打手等等,哪一样不要靠国家财政拨款,不要靠党政干部运筹。这方面的投入也不可谓不大。

双方的巨大投入,换来的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矛盾的深化和积累,是官民裂痕不见修补只见加深,是访民及其家属怨声载道,是各级政府派出截访的人员疲于奔命,劳而无功。

既然如此,就须好好作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统计,如以一个地方为例,一段时间内发生多少人次上访,他们带来要求解决的大小不等的案情,真正得到合情合理合法解决的有多少起,各花了多长时间,各经过多少部门以至几次往复,还有多少看来一时难以解决,或还需多少时日,还有多少看来根本无法解决,只能成为陈年积案的。核算下来,真正能靠信访部门插手解决的问题(或称“案

件”)能占百分之几的比例。以此“产出”,对照投入,如果是赔本买卖,还有必要保留这个得不偿失的信访制度和信访接待站的设置吗?

今天的现实,是这个制度本身陷入了悖论。这个制度不废除,群众一如既往地认定这是一线解决问题的希望,于是络绎以赴之。但这个制度又不能保证有一个可以顺畅解决问题的机制和流程,于是转而视群众上访危及社会治安,为把不稳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一系列针对上访的动作为焉开始,访民的苦难历程随之启动。

这样看来,这个鸡肋似的信访制度,不是成了政府对访民的一种“钓鱼”战略了吗?

实事求是地说,现任决策层以至前此历任(届、代)决策层,在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的问题上,似乎并无“钓鱼”之谋,但限于现行体制的积弊,行政关系的不顺,各项措施的失当,致使执行中出现仿佛“钓鱼”之实。而为了把已有的访民和潜在的访民从这个纠缠不清的罗网解放出来,也把各级政府从“访民危机”的噩梦般泥淖中拖出来,我看,不如经过一个时期必要的酝酿,索性下决心干脆取消这个可能起过好作用但确起了许多坏作用(至少是陷众多访民于无妄之灾,从而陷各级政府的截访行为于不义)的信访制度。

我们不是在建设法治社会么?不是在法治的大框架下,也还在试行民事调解么?有冤屈要申诉,有权利要维护,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发生任何纠纷,一概依照现行法律寻求解决之道,这才是长远之计。手工业式的上访,无论是到县衙门击鼓鸣冤,还是到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告御状,都是过时的戏码了。

但我们的司法部门准备好了么?难说。可是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不此之图,仍然维持一个捉襟见肘的信访制度,吸引访民到明知不能给他们解决问题的信访站来,然后又一路加以拦截,施加压力,旧案之上造新案,这是何苦来!?

我相信全国信访工作者,绝大多数都不满足于现状,希望把工作做好,有助于官民矛盾的缓解。但我从有限的见闻,发现种种纠结如上。我从来没上访过,于信访工作的内部规制更是知之不多,我更不具备行政工作经验,姑妄言之,或属书生之见。千虑一得,聊供采择吧。■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

○ 刘泽华

张绪山教授《“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一文,对流行至今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原理进行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解说和探讨,很值得关注。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这个课题。是耶,非耶?或许有天地云泥之评,这不要紧,打开思路,转变观念,才可能找政治体制改进的途路。

传统政治体制与农本社会相适应,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它有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没有“制衡”机制,所以特权横行于古今,腐败贯穿于始终。在皇权—臣民社会,特权被视为正常,贪腐虽从来没有被认可,但由于特权和权力垄断被视为理所当然,贪腐也就成了常见不怪的事实,所以对“无官不贪”大致也是默认的。但进入公民社会,情况就不一样了,公民不认可特权的正当性和权力垄断的合法性,由此对贪腐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

在传统社会中,帝王、权力、国家等等是混为一体的,虽然也有哲人试着分化,但没有从根本上分解开来,权力始终以帝王为核心。帝王的神圣性与权力的神圣性是一体的。韩愈说的“天王圣明,臣罪当死”不是一句谦卑的个别话语,而是整个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核心价值。

张绪山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是“权力神圣”,我认为这个概括很到位。在观念上,“天王圣明论”是与“权力神圣观”密切相连的,可以说是二位一体,互为里表,同为皇权专制制度的基础,也是流行至今的“唯上”和“官本位”的基础。“天王圣明论”有其理论演绎起点,这些起点主要表现为:

一、天王合一论

在中国古代,“皇天上帝”一直作为万能的主

宰而受到人们的尊奉。中国古代祭政合一,是古代王权与生俱来的一块胎记。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合一,帝祖交混,政教一元,宗教化的宗法制度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帝王神化称谓的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

从中国文明开端,神权与王权就是合一的。王与“上帝”对应称“下帝”,“天帝”、或径称“帝”。西周王干脆自命“天子”、“天君”、“昊天之子”,更直截了当的表述是:“君,天也。”(《左传·宣公四年》)君与天同体,帝与王合一。在漫长的历史中,“天子”成为帝王的神格化的固定称谓,具有说不尽的政治神圣意义。君为上天之子,受命于天,代天施治,是其核心意义,具体说来,其含义及政治效应有三:其一,君权神授。所谓“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天之所予也”。天是拥有绝对权威的神,君是天选定的“民主”。王者参通天地人,“天胙之,为神明主。”“天子至尊也,神精与天地通,血气含五帝精。”君王通神或即神。其二,天子以天为宗。天是人的曾祖父,天和天子是父子关系。“天子号天之子也”,“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这在观念上将宇宙神秘世界也宗法化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君主的神圣宗法地位。其三,君命即天命。君主代天行事,“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子秉天命主宰人世,君的权威等同于天的权威。总之,天子称谓将宗教意识、宗法意识与政治意识杂织在一起,全面地论证了最高权力的一元性、神圣性和绝对性。

天子观念是传统政治文化历久不衰的重要范式。神化君主的称谓还有很多,如君主的别称“六飞”、“六龙”,代称“袞职”,俗称“真龙天子”等

等。这些称谓大多反映了世俗对君权的认知、情感和信仰。

二、“体道”——王据有真理

古人一再提倡“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得道者得天下”、“以有道伐无道”等等。道作为政治理性，似乎与现实的王是平起平坐关系，人们可以高举道的大旗对王进行制约和规范。这方面的积极意义的确不能忽视。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面，是王对道的占有，并以“体道”自居，“道”就在朕手里！我们的先哲在理论上也纷纷把道的发明权奉献给王，为简便，我把主要论点条列于下：

1. “先王之道”从理论上说“道”无疑出自先王。先王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如唐尧虞舜等等。先王都具有神性，甚至上帝都是先王创立的：“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之。”（《国语·周语上》）“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先王与造物主同列。先秦诸子多数认定，中华文明始发的制度几乎都是先王创立的，诸如礼乐制度、祭祀制度、宫室制度、等级制度、行政制度、田制、度量衡等，而这些都是“道”的体现。

2. “王道”比先王之道更为抽象，更具有普遍意义。是政治理性的最高境界，是政治理想中真善美的最佳状态。在“王道”这个概念中，道是依附于王的，是王之道；反过来，“道”把“王”又托到了顶端！

3. 圣人、圣王为道之源。圣人与圣王不尽一致，但主体基本重合，所以常说“圣人之治”。圣人是道的人格化，又是道之原创者。“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说卦》）如果细加分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圣人立天道、地道，但对圣人立人道这一点几乎没有大的分歧。圣王比圣人更高一层，是贯通客体、主体、认识、实践的枢纽，是一个超级的主体，是真、善、美的化身。圣王之道成为绝对的真理，只能遵循、崇拜，不可怀疑。

4. “礼乐”是道的具体体现，不仅是人道，有时还说成是天地法则。礼乐出自何人？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占主流的是圣人、圣王，“礼义法度

者，圣人之所出也。”（《荀子·性恶》）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既是“自天子出”，则毫无疑问，礼乐之道非王莫可出！

5. 关于王道一体，《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有一段极著名的话：“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董仲舒把王、王道、天道、地道、人道混通为一体，王居于枢纽的地位。又说：“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对王道一体观念的理论化，董仲舒厥功甚伟。

6. 对王的歌颂，主要是颂扬王与道的一体。韩愈和柳宗元写过不少表奏，其中有不胜枚举的歌功颂德的妙辞，如：“神化”、“神功”、“大化”、“与天合德”、“法天合德”、“感通天地”、“参天两地”、“功参造化”、“整齐造化”、“政体乾坤”、“移造化”、“革阴阳”、“仁化”、“德化”、“统和天人”、“顺时御极”等等。总之，将王神化、自然化、皇化是三位一体的，核心是王体现道。

7. 祖宗之法具有权威性，常常是继业之君与臣的教条，在一个朝代内，具有“道”的意义。祖宗之法无疑出自祖宗王！

有人注释《春秋》“王正月”，也是从“道出于王”入手：“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人道立矣。”（宋·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四）“古人终日只是事天，故无时不言天，天道即王道也。”（明·马明衡《尚书疑义》卷五）。“诸侯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知王正月之为春，则知王道即天道矣。”（宋·高闾《春秋集注》卷一）

王权的合法性与道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秦始皇把自己的胜利就归结为自己有道，因此而战胜了六国的“无道”，自己就是最伟大的“体道”者。历代帝王不管如何作为，都要把自己说成是体道者。且看皇帝谥号，首先是说与天的关系，接着就是说与道的关系，如“应道”、“法道”、“继道”、“合道”、“同道”、“循道”、“备道”、“建道”、“行道”、“章道”、“弘道”、“体道”、“崇道”、“立道”、“凝道”、“明道”、“达道”、“履道”、“隆道”、“契道”、“阐道”、“守道”，等等。表达方式可谓丰富多彩，但要旨则一，即强调帝王是道的体现者。既然王道一体，体“道”的帝王圣旨自然就是不可违抗的，否则就是违“道”。

三、圣王合一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以春秋战国为界，此前以崇拜上帝、上天为主，其后以崇圣为主。由崇神向崇圣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一大创造，也是政治理性发展的标志之一。

圣人作为理性的化身，主要表现在通晓一切事物的道理和规律。孔安国注《尚书》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说文》：“圣，通也。”周敦颐说：“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

圣最初是张扬聪明、才智、道德，这本来是一个张扬人的认识与实践能力的概念，但在中国王权至上的社会环境里，凡是好的东西，王都要设法占有，我们哲人们也主动把圣的桂冠戴到帝王的头上。两大思想巨擘老子和孔子给王披上了圣的桂冠，其后哲人们创造了“圣王”一词，那些被理想化的先王也都升为“圣王”。先王之道、王道，也就是圣王之道。

“圣人”、“圣王”观念的演进过程大致是：从以先王为圣，到圣应为王，再到君主即圣。圣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绵延至近现代。

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不停地制造古圣王的神话和理想境界，同时又呼唤新的圣王出世。秦始皇的伟大功业把人们想象的圣王从遥远的古代移到现实中来。人们不禁大呼，圣王就在阿房宫！秦始皇在同他的臣僚们总结自己胜利的原因时，说了这样和那样的原因，而其中富有理论意义的是十二个字：“原道至明”、“体道行德”、“诛戮无道”。诸子喋喋不休地说“得道而得天下”，秦始皇把自己的胜利说成“道”的胜利，是顺理成章的。圣人是道的人格体现，作为“体道”者的秦始皇称圣是合乎逻辑的。于是，他被称为“大圣”、“秦圣”，他是圣的化身——“躬圣”、“圣智仁义”；他立的法是“圣法”；他的旨意是“圣意”；他做的事是“圣治”；他撒向人间的是“圣恩”。总之，圣与现实的帝王合为一体。

秦朝短祚，秦始皇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不停地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谴责，可是秦始皇制定的一套皇帝制度却被继承下来，秦始皇整合和规范的一套皇帝观念同样被继承下来，其中便包

括帝王与圣同体观念。其后两千年，帝王的一切无不与圣结缘。帝王的尊称为“圣上”、“圣皇”、“圣王”、“圣明”、“圣仪”、“圣驾”、“圣主”、“圣帝”；帝王的命令称为“圣旨”、“圣令”、“圣喻”、“圣策”、“圣诏”、“圣训”、“圣敕”、“圣诲”等等。

古代思想家虽然有一些人，一直在努力把圣人与王分开，力图让圣人代表理性和道德，让王代表权力。然而由于王权太强大，圣变成王的附属物和王的一种品格，使圣为王服务，为王张目，成为王的合理性的依据；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思想家们大多数依赖于王权，认同王权，又把对圣的理想寄希望于王，所以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把圣与王分开。相反，更多的是把圣交给了王，特别是当朝的王，而不管其政绩如何。

或许有人说，称颂帝王为神圣是当时的套话，这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套话恰恰包含了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套话常常是人们不假思索的前提，是人们的思维定式，是当然的、无可怀疑的理论论说基础和起点。帝王对圣的占有，是对理性占有的一种表现，是权力支配理性的证明。在中国古代，理性始终没有摆脱权力婢女的可怜地位。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四、圣王过性

人性问题早在西周就已经提出，春秋战国诸子进行了深入的争论，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看法，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一簇奇葩。约略而言，大体有六种：一是性自然说；二是性善说；三是性恶说；四是善恶兼具说；五是性品说；六是性好利说（好利不分善恶）。

儒学的人性论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为起点和中轴，上下左右移动。由于《三字经》普及，似乎“人之初，性本善”说占据了主流，其实并非如此，从理论上讲，性品说更为深入和流行，也就是说，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影响更深远。董仲舒提出人性分上中下三品，以后还有九品之说等等。理学家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落在实处是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是有优劣之分的。在性品论中，圣人、圣王是最上等、最优秀和最完美无缺的。他们承当着对

天下人进行教育、引导、改造的使命。

在理论上,帝王也有好坏之分,两级符号性的代表就是尧舜与桀纣。两级符号的使用方式,正如张分田教授概括的:非彼君——尊此君。前朝的帝王虽不是全盘否定,但桀纣式的帝王或有桀纣行为的帝王基本上都是前朝和过去的,面对现实的君王,固然也有极少勇敢之士以桀纣之行进行指斥,但占主流的是歌颂,即使有所批判,其目的也是“致君尧舜上”。有些思想家,如理学家中很多人认为三代以下无圣王、无圣制,多数帝王都不合格;照理,面前的宋朝帝王也应靠边站,但其主流言论却是歌功颂德,大宋帝王大多都被称为圣或期待成圣的帝王。对帝王的仁慈的认定无需肯定所有帝王,只要认定当朝就够了。帝王们总是以导师的面目出现,对臣下进行教育和改造。

五、君王为民之父母

中国古代君主制度滥觞于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君主制度的母体和原型。因此,在文献中标明君权的宗法属性的称谓出现得最早。这类君主称谓主要有“后”、“君父”、“宗”、“宗主”等。“君父”是使用频率很高的。在传统社会,宗法观念是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观念。祖宗崇拜、血缘亲情、宗法道德及由此衍生的心理上的从属感,成为专制王权操纵社会的工具,也是民文化的起点。

宗法价值观的核心是父家长崇拜,依样画葫芦的君权观念,必然把君权至上奉为最重要的价值尺度。这就在观念上确立了几条基本政治原则:其一,君主绝对权威原则。宗法家长权威以个人专断和绝对服从为特征,并以等级特权保证这种权威的实现。宗主对族人、大宗对小宗、父家长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特权,转换为政治关系准则,就是君主独裁与专制。其二,君主领有一切原则。宗法家长是家庭一切财产的占有者和支配者,妻妾、子女、奴仆也是其私有财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法则转换为政治准则就是尺土、子民莫非王有,王权支配一切。君王们皆称其国为“我邦”、“我家”、“王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三,君权宗祧继承原则。

依据宗法观念,父产子继乃是天经地义,转换为政治准则就是王位世袭,权力垄断。其四,臣民绝对义务原则。“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易·系辞上》)君为民之父母,所以君与臣同父与子一样,是隶属关系。于是,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合一,忠与孝成为道德准则的一般概括。“事君以敬”与“事父以孝”,“君命不贰”与“违命不孝”相辅相成,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行为准则。

“君父”、“子民”是传统政治认识的一个重要的固定观念模式。春秋战国以后,政治体制发生很大变化,但“君父”观念历久而不衰。“君父”、“子民”观念成为政治理论的基础之一,并通过各种社会化方式使之成为普遍认同的社会政治意识。“君父”所内涵的帝王观念,概言之,即“家天下”和“王道三纲”。家天下,即“王者无外”,“王者以天下为家”。(《公羊传·隐公元年》)“国君一体”、“忠孝一体”,帝王是百官臣民之父母,君位严格依照宗祧继承原则世袭。皇帝制度使“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成为政治现实,“公天下”与“私天下”以皇帝为中介合二而一。“国家”、“官家”、“大家”、“县官”、“社稷”等帝王称谓,正是“国君一体”、“天下一家”政治观念的产物。蔡邕的《独断》说:“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故称天家。”皇帝制度及“天下一家”观念,使权利与权力高度统一,王权是名副其实的绝对权力。

“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般说来,“三纲”之中君纲至大。人类社会由无数主从关系构成社会网络,君是网络之中的纲中之纲。他不仅作为全社会的大家长掌握着宗法权威,而且拥有父所不具备的政治权威。基于宗法伦理的君父与臣子规范,亦即“君臣大义”,是中国古代分量最重的一具精神枷锁。君主专制是宗法向政治延伸的必然结果。

六、王是秩序的化身

中国传统政治实践创立的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秩序,王则居于顶端。后来的思想家们大致都是沿着这个模式论证社会秩序。王是握有至上权力的政治角色,是强者和权势的代名词,同时是社会秩序的核心。

甲骨文“王”字形象是斧钺。在古代文献和考

古材料中,玉钺、青铜钺是军事统率权和刑赏大权的物质标识,类同权仗。从文化内涵上看,“王”标识着君主尊贵的等级地位和生杀予夺的权力。帝王取天下、治天下,刑兵而已矣。在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充斥着血腥的征伐和厮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血缘集团的军事首领,把个人的利益和权威建立在支配和奴役他人之上,这就是“王”。于是有“能用天下之谓王”(《荀子·正论》)、“臣诸侯者王”(《荀子·王制》)、“夫王者,能攻人者也。”(《韩非子·五蠹》)孔子把礼乐征伐视为王的专利。成为最高统治者,叫做“王天下”。正是在军事征战和权力角逐过程中,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把王权推向极致。“成则为王”是政治争斗的铁则。在传统政治思维中,兵为武威,法即文德,兵刑乃“帝王之利器”。王权的再造,政治的变革,统治的实现,社会秩序的建立,无不依恃强权。君高踞于社会人群之上,占有土地,支配人口,所以董仲舒说:“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君主处于社会政治等级的巅峰,故又称为“上”、“至尊”、“元首”。“上下,君臣也。”(《周礼·夏官·训方氏》郑玄注)上相对下而言,尊相对卑而言,“上”、“君上”、“皇上”等称谓皆取至高无上之义。在等级金字塔的顶端只能容下一个人,所以在尊卑有别的社会中,君为“至尊”,“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唯我独尊的君主是整个等级系统的主宰,即“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在这个意义上,君又是“元首”、“元良”。不过,与古罗马自称“第一公民”的元首有所不同,中国古代君主称谓从不具有“第一公民”的内涵。在传统政治思维中,君好比头脑和心脏,臣民好比肢体和九窍,君是中枢和主宰,臣是附庸和工具,君与臣是绝对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君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管子·任法》)故又称“主”、“主上”、“人主”、“至尊”、“元首”、“民主”等。所谓“民主”,即“民之主”,与近代民主观念在逻辑上完全相悖。“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君是主人,臣是奴仆,臣民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主宰一切的人必然被视为秩序的化身。古代的政令法律是转化为国家意志的君主意志,君主言出法随,赏戮由心,因此君主又称为“辟”、“辟

君”、“辟王”、“王辟”。辟,本义法律、法度。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是法的主人,法是君的专利,所谓“法者,王之本也。”(《韩非子·心度》)法又称为王法,故辟可引申为君。“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尚书·洪范》)君主失位而复得,就可以重新作威作福,故称之为“复辟”。

君主政治有几个基本原则,即社会等级上的独尊原则,权力配置上的独头原则,政治资源上的独占原则和权力运作上的独断原则,即“乾纲独断”。乾纲独断,即“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皇帝制度,集地方之权于中央,集中央之权于皇帝,宰相以下皆为臣仆,庶民更无政治权利可言。虽有法制之设,但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虽有言官之设,但兼听是为了独断;虽有监察制度,但目的是制驭群臣。皇帝是最高权力主体,没有任何制衡王权的机构设置。

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主流认同“胜者为王败者寇”,也认同以强力为基础的金字塔式的秩序。

七、天下王有,皇恩浩荡

宋儒程颐说:“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周易程氏传·大有》)这句话可作为“王有天下”原则的典型表述。“王有天下”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最高权力观念,而且这种权力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性。不管任何社会成员地位如何,也不管他们拥有什么,只要与“王有”原则发生矛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王有”原则,所谓“君于臣有取无假”是也。王有天下好像一个其大无外的穹庐,死死地扣在社会之上。君主们“无法无天”的种种作为的理论依据就是王有天下原则。

翻开历史,君王们“率兽食人”的恶举可谓数不胜数,但理论上却永远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洒向天下的总是阳光雨露,“皇恩浩荡”。何谓君,何谓臣?有一个经典定义:“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管子·形势解》)“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管子·君臣上》)面对君主的生杀予夺之权,臣民如果不是对抗,大抵只能是感恩和畏惧。韩愈、柳宗元把自己的“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

有知识,皆由上恩”。这些颂扬皇恩的说辞,并非文字游戏,所代表的是皇权制度下的臣民心态。既然一切都是皇上给的,结论自然是“皇恩浩荡”。与这种称颂相应的,是说不尽的自责和自罪之词,愚昧啊、鄙陋啊、负恩啊、惶恐啊、有罪啊、该死啊,等等,没完没了的自尊、自责、自贱、自罪!这绝非韩愈与柳宗元个人品德问题,而是普遍的思维定式造就的文化心态。

“天王圣明论”是“权力神圣观”赖以确立的前提和基础,而“权力神圣观”则反过来强化了“天王圣明论”,这一对孪生概念互为依存,直接促生了“权力向善”、“权力即真理”的观念,也导致了两千余年一以贯之的权力崇拜,催生了掌权者自我感觉“完美无误”与“一贯正确”的心理,更导致了愚民和驯民。然而,历史证明,无限制的权力为恶的机会要比为善的机会大的多!我们自身的经验仍历历在目:一段时期内,“天王圣明”曾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信条,“天王圣明论”甚嚣尘上之时,面对圣明导师的“无法无天”,上至高官,下至平民,除了山呼万岁,几乎一筹莫展,即使全国大饥荒,遍地饿殍,经济崩溃,人们依然要高歌“圣明”!

过去对权力的善恶,常用阶级性来界定,这无疑还有意义,不过要修正一下,抽象的阶级性是无法落实的,沿着阶级分析的路子接着走,落实到利益集团和掌权人操作的利益分配,这就与人性有密切的关联了。

人性是什么?至今无定说。我相信人性善恶兼具,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权力是由人掌管的,掌权人也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因此不能只相信人性与权力可能向善的一面,掌权者为恶怎么办?要有办法能堵住恶行,才可能使掌权者向善。到目前为止,人们发明的政治制衡机制,应该说是抑制为恶办法中最有效的办法。制衡机制的理论前提,是不能一相情愿地相信“权力向善”,而是要睁大眼睛盯住“权力向善”的因素。制衡机制中最有力的组成因素应该包括:以权力制约权力,阳光政务和舆论开放性监督,还有公选。正像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一样,靠掌权者的自律是不会有太大效用的,这已经是被历史反复证实的真理。如何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这才是政治改革的关键。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图 书 介 绍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作者包括李雪峰(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北京市委书记)、萧克(上将)、李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慎之(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室副主任)、韦君宜(著名作家)、于光远(著名学者)、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李昌(原中纪委副书记)等。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那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1980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

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制建设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党的十五大已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摒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定价28元,邮资7元,汇款地址见本刊址)

“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

（附：方徨信）

○ 钱 江

本文所言“卫星”，特指1958年6月始于中国媒体的一系列令人瞠目结合的小麦、水稻和大炼钢铁等高产新闻。此前不久，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了与之对应，国内媒体将难以置信的工农业“高产”也称为“卫星”。

谁在那个沸腾狂热的年代里发出了第一篇“卫星”稿件，这消息又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继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卫星”？简而言之，荒诞是怎样发生的？

将近50年过去，一位勇敢的新闻记者站出来，细致地叙述这个沉痛的故事，剖析这场荒诞之所以产生的原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应该永远记住惨痛的教训。她，就是今年85岁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方徨。

赶往嵯岬山采写“奇迹”新闻

1958年6月初的一天，按照推算应该是6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徨在编辑部办公室接到从豫南信阳地区遂平县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兴奋地说：“遂平嵯岬山夏季小麦大丰收，出现奇迹了，你赶快来吧。”

到遂平嵯岬山做什么？当然是去写关于“奇迹”的报道，这是“大跃进”时所有记者的追求。方徨是河南分社分管农业报道的记者，她当下决定，第二天就赶往遂平。

这么急切，和方徨特别盼望赶紧在河南打开农业报道局面是分不开的。就在这年2月，她和丈夫胡敏如一起从新华社浙江分社调到郑州。胡敏如担任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方徨任编委，他们的调动是新华社领导定下来的，意在加强河南的农业报道。当时一身而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

报总编辑的吴冷西，1958年初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知道小麦生产大省河南今年必出高产大新闻，这是将要升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向领袖作了保证的。

由于全家刚刚搬到郑州，孩子多，底子薄，方徨向负责总务的干部借了一个背包，装上一条薄被子，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前往河南南部的遂平。方徨到站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她赶紧来到遂平县委，可是县委和政府机关里只有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干部全都下乡组织麦收去了。方徨本想先在县里了解情况，再下乡到现场，看到这番情景，就决定先去嵯岬山。

嵯岬山在遂平县以西近60余华里，是一座风景名胜山，不过当年并没有人去旅游，沿途多是高高低低的山路。第二天，方徨起了一个大早，背上背包就上路了。在战争年代，她打背包行军是常事，如今也很有底气。一天的步行，在天色擦黑的时候走到了嵯岬山农业社。县委副书记赵光一看方徨这副模样，大声叫了起来，你怎么不在县城打个电话来，我也好派人在半路上接你一下嘛。

不过，一旦到达目的地，洗脸喝水，方徨觉得精神好多了，马上就惦记上了自己的工作，赶紧问赵光，这里的“奇迹”在哪儿？

当晚，赵光和农业社干部向方徨介绍，“奇迹”就在眼前发生着。

方徨没有想到，若干天以前，“奇迹”已经在嵯岬山下冒头了。这个农业合作社有一块5亩多一点的小麦高产田，打场下来一算，平均亩产2105斤，超出这里的小麦平均亩产大约10倍！《河南日报》抢发了消息。就在方徨从郑州出发那天的6月8日，《人民日报》在1版版面中间、算得上第三条的位置也把它登出来了，标题是《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下边还有一道副题《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

了新纪录》。

这天的《人民日报》还没有送到嵯岬山，不过赵光他们已经知道消息上了《人民日报》，却远远没有满足。赵光告诉方徨，之所以打电话叫她亲自赶过来，就在于农业社又发现了一块2亩9分地的高产试验田，平均亩产可能超过3000斤，不仅超过了刚刚发现的高产典型，而且可能是河南全省小麦的最高亩产记录。这就需要新华社记者亲手来写这条消息了。

赵光的介绍激情四溢，听得方徨激动万分，感到好新闻就要出在自己手里了。她从小在安徽桐城长大，知道小麦产量要比水稻低许多，当年家乡的一季水稻亩产不过几百斤，小麦亩产平均达到百十来斤就算很好了。可是现在居然能达到3000斤！那么现在她面对的，正是创造“奇迹”的人，想抓新闻的记者不就是要找这样的题材吗？

赵光的介绍使得方徨一下子兴奋起来，第二天清晨就由赵光和几位农业社干部带着，到几里地以外做现场采访。

方徨去的地方是打麦场，因为那创造奇迹的土地里的小麦连夜收割，运到这里来脱粒称重。需要方徨在现场看到的，就是验证最后称重的结果。

那确实是壮观的丰收景象。打麦场四周高高地垛着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在阳光照耀下闪耀金光。靠麦垛排着一溜装满了麦粒的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场地中央铺着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打麦场上空弥漫一股浓浓的麦香。

方徨不由地一声惊叫：“有这么多麦子呀！两亩地能插下这么多麦秆儿吗？”这惊呼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在战争年代里转战农村的方徨从来没有见过这番迷人的丰收景象。

她不叫唤还好，这一声喊把周围已经忙碌了一阵子的男女农民都不约而同吸引过来了，对方徨没大没小斥责起来。有的说：“你不相信我们吗？”有的人说：“你们这号连麦苗和青草都分不清的人，咋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麦子？”

其实这才是第一个破绽，按说方徨一身女干部装束，由县领导陪同，淳朴的嵯岬山农民怎么会一见面就这样没有礼貌的说话呢？

而随后一个女社员的话更让方徨吓了一跳，她对着方徨大声喊道：“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

这句话才真正打到了方徨的痛处，她马上解释，不是不相信，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太兴奋了。

整整一天，方徨都守在打麦场，看着农民把新收获的麦子运来打场。但这里藏下了第二个破绽，没有人领着方徨到丰收试验田边上去看一看，那小块地里的割下的麦子怎么源源不断呢？

运麦子和打场劳作持续到深夜，入夜后打麦场上挂起了几盏汽油灯，照得四下里通亮。方徨在打麦场奉陪了一夜，不时和亢奋的农民和干部交谈。

“卫星”消息登上《人民日报》头条

第二天清早，脱粒之后最后过秤的结果出来了，2亩9分地总产量为10238斤还多一点，平均亩产3530斤7两5钱，大概精确到了最后落地的那个麦粒，肯定是当时河南全省，也是全国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方徨立即回到农业社办公室写出一篇消息。为了快点见报，她直接将电话打到了北京《人民日报》编辑部，找熟悉的老资格女编辑李克林，她们都曾在战争中经历过长期的农村生活，彼此信赖。方徨口述文稿，把稿件传到了北京。

只隔了两天，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方徨采写的消息。这个头条标题做了3行，第一行引题《卫星社放出第二颗卫星》，第二行主题大大的，非常醒目：《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底下的第三行题是发自湖北的“卫星”消息《湖北幸福社十一亩亩产3215斤》，显然是被嵯岬山“卫星社”压住了。刊出的800多字消息原文为：

本报郑州11日电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消息传开以后（这个消息登在本报6月8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二亩九分地总产量达到一万零二百三十八斤六两，平均每亩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七两五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二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



水方法是采用小水畦浇,播种以前,浇了一次抗旱底墒水,播种以后,又浇了三次水。第四,及时地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往年这个地方吸浆虫非常严重,今年吸浆虫快要繁殖的时候,先后喷射了三次药剂,免除了吸浆虫对麦子的危害。当小麦遇到冷霜的时候,还及时熏烟防霜两次。

这个高额丰收的喜讯传出后,全省人民都欢欣鼓舞。现在不少地区正组织干部、群众前往卫星社参观学习这一先进经验。

不过,“卫星”这个词,在方徨原稿中原本没有。消息的最后一段话在原稿里也没有,因为渣岷山的新消息,如果报纸不登,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看来这就是编辑的生花妙笔了。

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六个同志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二亩九分地的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一百二十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二亩九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委副书记、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武,卫星社社长钟清德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数次丈量,丰产的事实完全可靠。

这块二亩九分地获得高额丰产奇迹的主要经验是:第一,肥料多,分期施,从种到收一共施了十次肥。播种前施三次底肥,第一次施三万斤,第二次三万七千五百斤,第三次施了十担人粪尿,播种后,每亩又追施厩肥、人粪尿七十担,以后又分期上两次杂肥四十二车、两次化肥共三十五斤。在麦子拔节前后,为了防止小麦倒伏,连续上两次草木灰,每次是二千斤,这样使麦子生长五尺多高,没有一株发生倒伏现象。第二,普及良种,加大播种量,实行匀播密植。每亩平均下碧蚂一号良种三十斤,比过去增加一倍,全部种子都经过可湿性六六六粉拌种,并且还全部采用了五寸见方方格密植播种法。第三,分期浇水四次。浇

让方徨吃惊的地方在于,这天的《人民日报》还为她的消息配发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社论以打油诗起首:“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然后大说了一通“大跃进”必然创造奇迹的理由。不仅如此,1版上还刊登一幅漫画:一个硕大的麦捆上写着“3530”字样,把一顶写有“低产”的帽子扣到一个小人物头上。显然,社论和漫画都是赶出来的,怪不得消息晚登了一天。

已经写出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消息,方徨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小通讯《麦场上的风波》,文中增写了一个“老保守”信服了“卫星”的故事。这回,稿件是邮寄给李克林的,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2版登出来了,不过题目改成了《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事后她对李克林说,改成这个题目我有意见。李克林说,稿子已经登出来了,就算了吧。

对“卫星”往事的反思

自从1958年6月遂平县高产“卫星”登上了《人民日报》,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媒体,掀起了一场竞放高产“卫星”的大竞赛,蔚为奇观。方徨报道的“卫星”纪录仅仅保持了4天,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消息,湖北谷城县

《王明进创小麦亩产 4353 斤》。过了 7 天《人民日报》于 6 月 23 日又报道谷城县有小麦试验田亩产 4689 斤。此后新“卫星”层出不穷，到今年 9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登当年小麦卫星最高记录《小麦冠军驾临青海出现亩产 8585 斤纪录》，算是为 20 世纪的小麦高产“记录”画上了句号。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最初赶往嵯岬山采写“奇迹”的方徨正在冷静下来。她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是自己，最早赶往嵯岬山去“放卫星”？待到“大跃进”风潮过去，终于有一天，她打听到了事实，当时采写的那 2 亩 9 分地产量，原来是从 20 多亩高产麦地里集中起来堆到一起打场的。她顿时感到心灵的巨大创痛。

不仅如此，当时与她合作推出这几篇“卫星稿”的人民日报“三八式”老干部编辑李克林，也很快从思想狂热中摆脱出来，勇敢地站出来批判“大跃进”是“劳民伤财”、“蛮干”，结果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深深的伤害。

方徨和李克林在一起反思，为什么她们推出了“卫星”消息？是她们都年轻幼稚吗？

偏偏不是，方徨和李克林都是在农村成长的革命干部，在此单说说方徨。

方徨，1926 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文化世家，大家族中有众多兄弟姐妹在抗战前后参加革命。她本人在 1943 年未满 17 岁参加了新四军，经历了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1949 年进城以后，她成为新华社记者，先在安徽，后调浙江，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报道。

来到河南这年，方徨 32 岁，14 级干部，已是 5 个孩子的母亲。应该说，革命和生活经历都比较丰富，而且她有强烈的志向，热爱新闻工作，希望自己能成为范长江那样的记者，对虚假新闻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

1958 年 2 月下旬刚到河南，方徨就赶往古城登封的唐庄镇，参加河南省委召开的“大跃进”现场会。因为采访发稿在路上耽搁，她迟到了一天，结果受到会议主持者批评，质问她有没有“右倾保守”思想，为什么不重视会议？甚至提出撤换她这个采访记者。把方徨吓得不敢。

在这次全面组织和发动河南“大跃进”的会议上，方徨认识了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不久即调往遂平挂职），一位有文化的南下干部，他安慰

了方徨，并和她交流农村情况，使方徨很感激。所以当赵光从遂平打来电话，她就很自然地决定赶去采访了。

影响方徨的还有一个原因，登封会议后的春夏之交，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领头斗争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扣在潘复生头上的罪名主要是：“反右”运动中包庇“右派”，认为河南没有那么多“右派”，从而使河南的“反右”运动前期发展缓慢；在合作化问题上，潘复生“反冒进”，主张步伐要稳妥一些；在 1958 年农业生产指标上，潘复生是“保守派”，认为不能把指标定得太高。结果，潘复生被打成河南“右倾保守”代表人物，受到残酷打击，被撤销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吴芝圃在 5 月间取而代之，随后在全省范围内抓“小潘复生”，这就为河南“大跃进”扫清了舆论道路。

几个月下来，方徨清楚地意识到，河南要拼命创造生产奇迹，这是省委新任主要领导的意图，因为只有创造了“奇迹”才能印证对潘复生的批判，而且迎合了领袖的意愿；另一方面，来自北京的信息也说明，新华社总社盼望河南分社多多报来创造“奇迹”的消息。在嵯岬山那个堆满了麦垛的打麦场上，最令方徨心灵震撼的倒不是那麦垛，而是女社员一声喊：“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句话使方徨不敢往深处追究，照着眼前景象写出了消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嵯岬山的高产卫星，是由登封会议发端，从上到下一层层压出来的，如果没有方徨，也会有别人在狂热气氛中写出“卫星”稿。那时的媒体记者群体中，差不多人人都在抢着写“卫星”消息，即使头脑清醒者也挡不住“放卫星”势头。当时，《人民日报》刊登了遂平高产“卫星”后，马上派出“三八式”记者、国内政治部主任金沙直奔嵯岬山而去，打算以他的笔将那里的“卫星”再好好渲染一番。金沙到了现场一看，发现了大破绽。但是他没有“抗上”，没有将真相挑出来，而是保持了痛苦的沉默，悄悄回到北京。在金沙身后，又不知有多少人涌向嵯岬山赞颂“卫星”和“公社”去了。

明白了真相，“大跃进”之后方徨再也不去嵯岬山了，那是让她产生痛苦的地方，她对这段痛苦的反思持续到今天。

当年写“卫星”消息的记者很多，但像方徨这

样坦荡剖析自己的,毕竟很少很少。笔者从事这一段新闻史研究,能当面访问方徨老师,听她叙述往事,百感交集,心中油然而起的是对这位新闻前辈的敬重!

对一个锐意前进的民族来说,需要牢记历史教训,那是一个永远给你教益的课堂。

附:

方徨审阅文稿后致作者的信

钱江同志:

大作收到,看了几遍。谢谢你写出了好文章,只是把我评价得太高了。

其实这是我50年前干的一件荒唐事,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历程中不堪回首的一大败笔。近些年来,人们逐渐反思、正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差不多都要提到我在嵯峨山放的这颗“卫星”,甚至把我当成罪魁祸首。

我开始是不服,觉得冤枉。当年若不是我的好友赵光打了那么一个电话,也就不一定是我去采访这件事,而可能是由别人来写了。总之这条消息是肯定要发出来的。

不过后来我想通了,我那时是够幼稚的,没有独立思考,在当时那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领袖一发号召,我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

其实1958年“大跃进”乌托邦在1955年已经发端。那年我在杭州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是狂热投入的,杭州工商业改造在一夜间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消息就是我采写的。那天浙江省开大会庆贺,会后我将写好的稿子交给省长沙文汉审稿,顺便说了一句:“沙省长,你看这个稿子能发吗?”因为我有些犯嘀咕,我采访的不少被改造的小企业主、小店主,不少人心里不愿意,痛哭流涕,有的全家人抱头痛哭,有人甚至自杀。可是我的稿子没有写这些,而是说一片拥护,敲锣打鼓愿意将财产交出来,实行全民所有制。

沙文汉省长看了我的稿子听了我的话,抬起头来瞪了我好久不说话,最后把稿子还给我,说:“就这样登吧。”看得出来,他心里是觉得不妥当的。这件事在我心里印象深极了。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是“右派”中级别最高的。

接下来就是1958年采访嵯峨山犯的大错

了。那时我如同和沙文汉省长对话一样,又问了在场农民一句:“二亩地能插那么多麦秆吗?”这就引起了随后写的《麦场上的风波》。后来我不同意李克林将通讯原题改为《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也说明我当时心里是有些矛盾的。但我那时主导的思想还是对“大跃进”的迷信,对虚夸的“高产”也就相信了,那消息就写出来了。

前因后果这样一想,我也就心服了。对稿件引起的后果,我不能逃脱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良心上应受的责备,要向读者们说:对不起!以后我虽然也写过站得住的新闻,但这篇“卫星”报道实在是大错。你说我敢于面对和解剖这个错误,我就是这样想的。

嵯峨山这条消息发出后,全国简直是“群星乱飞”。我也奇怪,为什么那时那么多人、那么多记者都写“卫星”新闻,怎么后来都噤若寒蝉,怎么不见多少人出来说清楚自己做的事情了?我最初看到关于我“放卫星”的文字是在一本《中国左祸》的书上看到的,作者说我虚夸报道“巧舌如簧”。我想不如我自己承认并把经过说清楚才好,就写了《一次难忘的教训》一文,由此引来了包括你在内的一些媒体的采访。

我建议你再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剖析一下,看看这些所谓“奇迹”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系统、认真地剖析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问题,将为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对待历史的态度。

方徨

2011年4月15日

(作者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北京市房山区

102488 信箱 3 分箱

收款人:崔秀岭 邮编:102488

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纪实

○ 平乃彬

“反动学生”之由来

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了“利用小说反党”和“推翻一个政权，必先制造舆论”的问题。在“宽松”了一段时期后，新的思想政治运动在北京高校中酝酿、蓄势待发。

很快，北京市委大学部，以部长吴子牧为首，蹲点到北京大学重点地开展“调查研究”，开座谈会，摸“敌情”。在接着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后来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快挖出了化学系、外语系的学生“反动集团”；哲学系以郭沫若、于立群的长子郭世英为首的，起名X社（爱克斯社）的“反动集团”；政治经济学系学生书写论文“攻击”、“诬蔑”农村大好形势的调查报告等一批案件。北京大学学生林世中为首的“反动小集团”案，又牵出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郭祝胜。事情其实都很简单，要么是学生几年来在宿舍内的日常说话，毕业前校方有目的地组织全体学生来集中回忆、收集起来，以片言只语，比照上面文件关于阶级斗争的表现，加以想象编造，无限上纲上线，涉及数人的，便加上“反动集团”帽子，要么是学术探讨文章，被视作异端，要么是1961年北京市委组织文科学生随工作队下乡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时布置书写的调查报告和以此素材书写的毕业论文，被指斥为反对“三面红旗”，散布修正主义观点。

1963年5月郭世英的“X社反动小集团和叛国投敌事件”被人告发，涉及各校学生十多人，在周恩来干预下由公安部做了处理，郭世英在1963年6月中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习，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两年后回到中国农业大学继续学业，1968年4月遭迫害致死。张鹤慈、

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被处劳动教养（已平反）。恰好又一件事发生了，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的当晚，原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1963年应届毕业生尚育森（已平反）——一个正直的山东汉子，连夜挥笔疾书给中共中央（有说给中央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对《建议》的不同看法。

信件很快被转到了北京市委，在彭真的指令下，北京市委起草文件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遂有彭真和以陆定一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行文，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意见通知》（63年496号文件）。《通知》称：“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于是，在中国大陆诞生了“反动学生”这一个群体，并为日后各大院校乃至中学生中揭批“反动学生”开了历史先河。

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经国务院文教办批准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具体规定了清理“反动学生”的标准、办法、人数控制等细则。其中“反对反修斗争”这一条“罪名”就是为尚育森量身定制的。尚育森事件又被报到了周恩来这里，据尚育森日后陈述：当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大会上，周恩来为了了解这个写信人，有意安排他坐在大会堂的第一排的中间座位。周在讲

话中提到了此事,说了“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有人反对我们,有胆量的,可以上来辩论么!”。尚育森还真要上去,被坐在他左右座位上的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和书记按住(会前已被控制)。《通知》下达后,其他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已经鉴定结束,当年已经来不及执行,所以仅在北京的部分高校毕业生中清理了24人(蔡荣庆,陈良荣,陈寿康,高志佩,郭祝胜,胡存玲,金振邦,伉铁保,李明昌,李仲进,刘书栋,马家骅,苗含英,尚育森,孙永江,吴启元,肖书常,肖省民,严逸民,谢重琨,张大万,张慎行,赵英,朱志曾)。事实证明:尚育森署真名向中央上书对《二十五条》的意见,也是青年学生赤子之心的表现。这个《建议》自称是坚持以“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1957年,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决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纲领”,其实这两个《宣言》和《决定》是苏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和中共妥协的产物,主要还是苏共的理念。中共无非是从中挑出小部分字眼,说成是国际共运“纲领”,以占领道德高地的说辞而已,并无现实可行性。况且这只是一个《……建议》,自然可以评论、批评。1979年8月原北京市高教局长魏明先生谈起尚育森,感叹其人“了不起”,“有远见”。和“政治上反动”,“猖狂进攻”是凑不上关系的。

在这件事上值得褒扬的是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先生,他不表同意,采取了提前将学生毕业分配走的办法,拒绝在清华学生中搜寻斗争对象。有尚育森事件引发的清理“反动学生”事件,主要还是出自彭真、陆定一和高教部无关。

建立南口北京高校师生劳改营

1963年暑期清理出的“反动学生”先被留在学校劳动,1964年2月被分成两批,其中12人被集中到位于北京昌平区回龙观的国营北郊农场(又称“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劳动。另外11人被集中到东郊双桥农场黑庄户生产队劳动(患病1人)。1964年7月,集中转移到北京南郊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又称中朝友好人民公社)建新生产队劳动。

北京市委大学部出于“反修防修”的长期需

要,决定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高校师生的内部劳改基地,为全国树立“再教育营”的经验。1965年1月,精心地选择了位于北京郊区昌平县的国营南口农场二分场,建立了对外公开名称叫“高校大队”的“劳动营”。1965年1月3日,1963年被清理的毕业生除2人外,其余22人转移集中到了南口农场二分场。1月4日,1964年被清理的毕业生20人(曹天予,郭宝昌,郭春堂,柳世绵,李法文,路广义,潘伟平,平乃彬,齐永田,孙金山,孙思楹,王学泰,吴道永,吴祖俊,谢炳强,解基伏,杨成林,尤长岭,张平,赵冠芳)也从各学校集中到了南口农场二分场。南口劳改基地建成后,在高校中清理“反动学生”进入日常化(不再集中到毕业),陆续又进来18人(贾玉珊,陈锦谷,陈湘华,戴兴发,杜秉炎,樊渝杰,李春林,刘希贤,刘尧阶,马育元,王济清,向如玉,羿蜀华,于绍怀,张士林,张忠南,曾锦春,庄俊华),直到“文革”爆发,彭真的北京市委倒台。至此,前后被非法关押到南口农场的学生计60人,包括因病、因为各种原因被遣送到其他部门劳改的2人,共62人。他们来自北京地区的26所院校。

“高校大队”分成教职人员和学生两个分队,教职人员最多时集中了以北京市属院校为主的右派分子和有其他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和家庭成分问题,以及犯有其他错误的教职工近百人。除有右派帽子的外,人员有来、有去。学生是连续三年从北京高校中清理出来的“反动学生”。“高校大队”归口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市高教局领导,具体由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处长姜云(音)负责。组成了管理工作组,工作人员也来自北京高校。组长黄勇志,来自北京矿业学院保卫科,另有岳金良,鲍景春,廖传模,和来自北京市教育局的干部袁林(管理教工分队为主)。

学生在南口农场的待遇略有不同。区分有劳动教养和劳动考察处分两类,年限有2年、3年区别。又有毕业和没有毕业之分。毕业又考察的,每月28元,毕业又教养的,每月23元。没有毕业的,按照19.5元助学金发放生活费。

开始时每10天公休1天,公休日可以请假上南口镇或昌平区购买生活用品,到市区则要专门请假批准,一般都是因病原因。可以继续享受在校时的公费医疗待遇。粮食定量是按照北京地区重体力劳动标准,每月45市斤。“文革”开始后就改

成了每两周休息一天，且不能保证。劳动时间延长到了10小时。

南口农场所在地本是一片荒石滩，遍地是石头，农场成立初期栽种的果树此刻已经继续成长受到了限制，需要“扩坑”，也就是需要将果树根部周围的沙石换成沙土。农场所有的最苦最重的活，几乎全部由学生们包干。1965年，经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二十三条）发表，针对前期“四清”（刘少奇的两个“十条”）问题，特别指出“群众问题一律不整”。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



“四清”运动中，每逢开会都要把“四类分子”集中起来，由武装民兵押解到场听会

文发表，追查“三家村”事件，显示出北京市委地位的岌岌可危。为此，1966年5月，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市教育局一方面通过给14名“改造表现好的学生”（陈良荣、高志佩、胡存玲、金振邦、仇铁保、马家骅、孙永江、吴启元、张大万、张慎行、柳世棉、吴祖俊、解基伏、赵冠芳）提前和按期解除处分释放回学校的形式来安抚人心。另一方面又将2名学生（曹天予、贾玉珊）升级由公安收押，并以所谓向“反改造”斗争的形式，给其中6名学生戴上“反改造”分子帽子，企图从学生内部分化瓦解，搞“窝里斗”，达到稳定军心的目的。

1966年8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其中关于“学生问题一律不整”的文字让学生们眼睛一亮，感觉到了些什么。管理组也因姜云、魏明随着北京市委一起倒台，此刻感到了处境的不妙。于是煽动部分青年农场职工，首先起来造反，成立了“‘鹰击长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8月26日，“鹰击长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黄勇志、鲍景春、丁闯（原名丁沛林，二分场青年农工）等的策划下，又同二分场的另一个对立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一道，将全分场的“四类分子”、“右派分子”和“反动学生”集中到会场兼食堂前的开阔地，先是给每个人挂上身份“黑牌”，然后一场预先安排好的“赤色恐怖”开始了。在他们的直接指挥下，组织农场职工用棍棒、铁锹、镐头围着一阵乱打。

将一个叫周福利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当过国民党新七军的兵，后随军起义）和一个北京市粮食局下放改造的男性“右派分子”当场乱棍打死。有好几个学生的头部被打得开了花，那标明身份的黑牌上滴满了血。学生回到住所后，黄勇志立即凶神恶煞地进门训话，要每人写一篇对他们的法西斯暴行的“正确认识”，还要学生细心保护那块留有学生鲜血的黑牌，不得丢失，出门便要挂上。

他们假冒北京新市委（李雪峰为书记）的名义，伪造了一份《北京新市委对南口高校大对反动学生的七条管理规定》，规定了“不得反对管理组，不得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串联、不得看大字报，处分到期学生等待运动后期处理……”等，以限制学生的自由。其实所谓的“新北京市委”纯粹是子虚乌有。是利用“文革”斗工作组的机会，强逼北京市委派驻二分场的“文革工作组”（“四清工作组”改名）姓王的组长，在黄勇志起草的布告上，盖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工作组的章（红纸上盖红章）。在学生内部，隔三差五地召开文武全场的批斗会，每有不服，便不准睡觉，名曰：“写检查”，实质是法西斯的精神折磨法。减少休息日为每两周一天，加强劳动强度。1968年全国出现了自杀潮，毛泽东关于“给出路”等政策已经明朗，结合以前的多种疑点，我对南口高校大队管理人员在文革中的暴行和他们的非法性已经确信无疑，于是利用一次回城检查看病，住在学校的机会，向

中央文革和北京市写信,反映了我的疑点并请他们核实,要求解散“高校大队”,让学生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回农场后,我明白告诉黄勇志等,我已经向上级反映,监狱犯人和劳教对象都按期释放,你们将我们长期关押是没有道理的。这下他们慌了,立刻组织对我的查抄,要我交出底稿,并且收走了我的所有文字材料。接着在二分场的大会上,将我押上去批斗,加上“翻案”的罪名,多次组织斗争会,晚上不给睡觉“写检查”,白天派人跟踪劳动。

1968年8月以后,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工、军宣队进驻北京各大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高教局也实行了军管。1968年底,“高校大队”来了两个身份不明的人,这两个人宣布学生们必须每人重新按照“人时事地因历果”的六项要求重新交代自己的“罪行材料”,交代自己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所谓的“人时事地因历果”的含义他作了解释,即与罪行相关的人物,发生时间,事实,发生地点,起因,过程(历程)以及导致的后果。从一方面来看,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案件办成“事实清楚”(口供)的铁案,从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他们在看了学生的材料后认为并不符合定案的“事实清楚”要求,才要求学生重新“自证其罪”。有的学生日后捏了一把汗,说“真要如此自己给自己栽赃,如实写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当时枪毙也可以了”,可见来人的恶毒。

不出一月,1969年元月,北京市革委会通知各校派车接回所有被囚南口的学生,1月23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首先来人,此两人不肯放人,要求验看证件,于是发生争执。僵局延续到下午,可能联系到了对口上级,于是放人。我在1969年1月25日回到北航,除北京师范大学专科学校因已解散,2名学生暂时无处可去外,由彭真前北京市委设立在南口的高校师生劳改营在1969年1月底终于被解散。

没有言论的“言论罪”

1964年7月,我的母校北京航空学院在我已以5年学习期间全部考试科目成绩优秀的排名第一状态毕业的前夕,送给了我一个什么大礼

包呢?——打成反动学生,劳动考察两年。罪名是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散布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我在北航5年,既没有发表过文章、出版过刊物,也没有写过“思想汇报”,“效忠文字”(表决心之类)或其他稿件(含黑板报类),更没有上过台发表演讲或有什么建言献策,陈述某个政治观点或学术思想。批判大会上,一篇我的书面文稿,即使是记录稿都端不出来,我何“言论”之有?没有“言论”,又何来“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下面原文录出1964年作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定性的最为主要的两句话。原文字是在过去通用的16开书写稿纸上用圆珠笔、复写纸逐条写成,约10余条,都没头没尾。我看到这份材料时,后面“揭发人”一项为空白,无法与之对质,所以至今我也不清楚,也不想查究。

原文1.“人为制造紧张,让人没有思考问题的时间,好做驯服工具”。

原文2.“中国的教授骑自行车上班,美国的工人开汽车”。

首先我承认,这两句话在批判我后,我想起来了,确实在两年前(1962年)说过。我没有主动交代,不是什么“顽抗到底”,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起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第一条被定性为反党言论,其实是1962年6月,同学们在空军六航校(涿县)实习期间,不习惯那种高度紧张的军中生活,尤其对每天数次动辄吹哨集合,看来并无必要的排队、点名、唱歌颇有抱怨,感觉厌烦,说的一句牢骚话。

第二条被定性为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教授骑自行车上班,美国的工人开汽车”,这话错了吗?说这话的背景是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时任北航航空发动机原理教研室主任的宁晃教授,几乎每天猫着腰,骑一辆矮小的老旧自行车到系里上班。他体态较胖,链条咯吱咯吱作响,经常与我们同行在上课路上,同学们看了发笑,我也就调侃一下而已。在上世纪60年代,不就是“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是一句真话吗?我并不是在引用这个事实来写论文,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理论问题。能想象到“反对社会主义”,也确能显露出棍子们的超凡想象力。

北航党委还很认真,安排了一名留美的国内

著名航空科普专家——我的《飞机结构学和飞行力学》课老师，副教授史超礼先生，用他在美国多年的亲身经历，操着苏北普通话登台专题批驳。据说他回国多年还保持着吃面包的生活习惯。要他睁着眼睛说瞎话，也煞是难为了他。史教授还认真负责，我看到他手上的稿子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显然作了充分的准备，批判中不时还转过头来，面对驳斥我是“胡说”。1979年8月，我在北航十间房大门内的路途遇到史超礼先生，上前招呼，问他是否还记得我，“1964年你批判过我的”。他显然是记得的，一面笑对，一面告诉：“我要到协和医院去看病，去看病……”，匆匆而去。

其余的所谓“反党言论”罪证我就不提了，因为都不是我说的。全部是将受到批判的彭德怀的“观点”，诸如“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浪费很大，炼出的是废铁”，社会上大饥荒的流言，“××地方饿死人”，“各地五风顺行”，将“尿盆子”一股脑儿扣在我头上，我平日很少和人交往，哪有闲暇去跟人说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估计是同学承受不住压力，无可奈何，又编造不出，就捡起当年在校内外公开或私下流行的话语来交差。“反对三面红旗”，这是一个万能罪，百发百中，说谁都行。不信你去问十亿农民，在饿肚子时，有没有说过公共食堂的坏话。有哪个人家里的锅被砸了去炼钢，是觉得1070万吨钢比他家的铁锅更重要的。为尚育森量身定做的“反对反修斗争”罪，也扣我身上了，莫名其妙地给我加上说过“要实行高薪，物质刺激有好处”这句话。高薪阶层据说是苏联修正主义的基础——“特权阶层”，因此我就是“反对反修斗争”了。

1969年1月25日北航革委会两名学生模样的人和一名工宣队师傅，搭乘一辆上海牌三轮卡车改装的客车将我从北京高校劳改营接回了学校，从此恢复自由，通知我参加学校一切活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开始了落实政策（“解放”）工作。学校给予我毕业分配，发毕业证书。1969年5月3日办完离校手续后去学生科领取派遣单，负责的人事干部姓汪，男性，50多岁了。他告诉我原北航党委给我整的那些“言论材料”（反党罪证）经过复审，全都没有旁证（孤证），不好定案，决定全部撤出档案。但是“暂不销毁”，等

待上级通知处理。考虑到各地对大学生——臭老九，还有排斥、拒绝接受的情况，要我这段历史就不要再谈了。如果有人要问起，就要他们跟学校联系。幸好“暂不销毁”，要不1979年学校还没法为我复查、平反了。

复查平反

1969年5月5日我离开了首都北京，在江苏省的一个农业大县——兴化县的一所百余人的县航运部门的船舶修造厂干了11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开始向北航数度投寄信件，要求恢复工龄，补发工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肯定是得不到解决的。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翻入新的一页。我在1979年7月26日北上，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招待所。1979年9月17日，北京航空学院对我做了复查决定。全文抄录如下：

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

航党办字【79】第119号

对平乃彬同志的复查决定

平乃彬同志原是我院航空发动机设计专业一九六四年暑期毕业生，在一九六四年毕业前夕的清理思想中被批判和劳动考察，又因文化大革命运动，迟至一九六九年五月才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

经复查认为，平乃彬同志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某些问题有些看法应该是允许的，因此，对其进行批判和劳动考察是错误的。经研究决定撤销有关决定材料和其毕业生登记表中的组织鉴定，恢复名誉，工龄（应为“龄”）从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算起，并根据[79]京教字180号通知精神，补发工资。

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

“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某些问题有些看法”其实是一种搪塞，负责复查的人事干部张绍桐先生说：“你说的都是对的”。我不假思索地给以回绝。我回答他：“这都是彭德怀说的，我没有说过，是彭德怀说对了”，“我当时还没有这个觉悟”。我一直坚持大学期间我只是一个一心用功读书的学生，是一个正直的、富有责任心和同情心，有强烈上进心的青年学生。对党派，对政治斗争没有兴趣。见下页

“穷棒子社”白薯亩产之谜

○ 刘一皋

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的“穷棒子社”(或称王国藩社),因1955年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作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闻名,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故事叙述方式。然而,随着1978年11月王国藩被免职回家,逐渐出现了不同的故事叙述,从而引发了争论、攻击甚至法律诉讼。其中,最具社会影响的是王国藩诉作家古鉴兹及作家出版社



1960年代的王国藩

2000年版,第11~19页。)由此,“穷棒子社”不仅激发了研究者的探究兴趣,而且刺激起了一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

熊向晖的故事有出处

在有关“穷棒子社”的回忆中,熊蕾的《我那被称为“传奇人物”的老爹》(《中国妇女》2005年10月,总第658期,第18页)影响颇大,其中讲述了一个“大跃进”期间预

侵犯名誉权案。尽管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均辩称《穷棒子王国》为小说创作,未出现王国藩真实姓名,不构成侵权,但是,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为:“凡了解或知道王国藩的人均认为《穷棒子王国》一书写的是王国藩,并确有侮辱、诽谤的情节,贬低了王国藩的人格,给王国藩造成了不良影响。”1993年3月10日,宣判王国藩胜诉。判决一时引发各种议论,激烈者甚至指责法庭受到权力干扰,质疑调查取证程序和判决的公正性。(戴煌编著:《新格斗:〈穷棒子王国〉案》,上海:学林出版社

报白薯亩产量的故事:

老爹的有趣,还在他不跟风。比如“文革”后,很多文人给当年遵化县的全国劳动模范、“穷棒子”精神的代表王国藩泼脏水,说他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老爹不大以为然,说,当年“大跃进”时搞极“左”,王国藩就顶得住,不“放卫星”,实事求是。老爹讲了这样一件事:全县各公社领导开会报产量,大家争相“放卫星”,产量越报越高,有个公社书记居然把白薯的产量报到亩产百万斤。只有王国藩不为所动。会后,王国藩问那位“百万”

接65页

我不感谢

学校没有给我从新分配工作,理由是“北京市落实政策人员已经户口刹车,除非特殊人物”。后来我自己联系进入了省内的一所高校,从事教学工作直至退休。1980年1月,教育部党组下发《中共教育部党组文件(80)教党字090号》,“反动学生”的荒诞历史结束了。62名受害人中的33人已经取得联系,另过世的5人(李法文,李明昌,尚育森,杨成林,伉铁保),生死不明的1人(贾玉珊)。

其中海外定居的2人,担任副省级领导职务的1人,绝大多数都成了科学、文学、艺术创作、教学、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骨干。

2007年4月8日,2010年4月28日,部分难友相约两次重访南口农场。当年风华正茂的年纪,被囚在这里遭受蹂躏和压迫,现在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尚育森已经辞世,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反动学生”。大家为他和已经作古的难友默哀。旧址犹在,只是人去屋空。这里已经留下了我们永久的痛。■

(责任编辑 萧 徐)

书记：你体重有多少斤哪？那人一愣，说，一百多斤。王国藩说：就你这么大小儿的白薯，一亩地能堆下一万个吗？说罢扬长而去。

这事是老爹亲眼所见，印象极深。他对王国藩在那样的风气下实事求是，非常欣赏，认为那么做极不容易，所以对他不能全盘否定。我不认识王国藩，但是我老爹讲的这个故事，也给我打下了实事求是的烙印。

故事情节十分生动，作者的态度更是鲜明，虽然回忆并未提供王国藩所报产量是多少，是否实事求是，但还是在互联网上受到热捧，以为这是共和国功臣说的话，自然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并利用这个故事批判被认为是诋毁王国藩的人。一些小报也加以转载，甚至在王朝彬编著的《共和国的村庄》（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中，基本照录了这个故事，却未注明故事的出处，似乎这只是一件确定无疑、家喻户晓的事实。

其实，花些工夫在“穷棒子社”故事中寻找，可以发现“文革”时期就有这个故事，只是讲法有所不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政治经济学系师生编写的《“穷棒子”精神放光芒：西铺大队的经济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页）称：

在一次制定生产跃进计划的会上，有的人提出白薯亩产十万斤、二十万斤的指标，可是王国藩同志沉着地说：“西铺大队每亩计划产白薯四、五千斤，争取能达到万斤就是特大跃进。”并在具体算了细账以后指出：“我们共产党员要老老实实，决不能瞎吹，不能欺骗党和群众。”给大家做出了反对“浮夸风”的好榜样。

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穷棒子”之乡斗争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75年版，第94页）中，故事的讲述更为夸张：

在一次县里制定生产跃进计划的会上，一些同志受到“浮夸风”的影响，提出白薯亩产五十万斤，一百万斤，最后竟一直报到一百五十万斤。会场上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咋建明社还不报？”有的说：“人家是压轴的，全国闻名的社，还不得超过二百万斤？”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这时，建明社社长王国藩站起来沉着地说：“我们与社员反复讨论，计划每亩四、五千斤，争取达到万斤就是特大跃进。”

“先进不先进，不能光看数字报多少，得看实

际产量。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决不能瞎吹。没边的大话成筐地说一坑国家，二害集体，三挫伤群众积极性，给人民公社抹黑，那才是真正的右倾呢！”

两种“文革”出版物，同样将王国藩塑造成实事求是、反“浮夸风”的英雄，不过，两个编写组都把“浮夸风”当做“刘少奇反革命路线”、林彪一类骗子的干扰和破坏，自然就不便于后来的编著者作为事实加以引用，也出现了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之间的冲突，大大降低了故事的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的“文革”版本，提供了王国藩所报的白薯亩产指标，可以作为分析是否实事求是的一个尺度。

尽管典型报道的亩产数字比较散碎，有时还会自相矛盾，仍然可以观察事件发展的前后逻辑关系。1956年秋后，等不及最后的统计结果，便对外报道了转为高级社第一年获得全面丰收的消息，其中涉及白薯亩产：

预计粮食作物平均每亩产四百八十六斤，超过原王国藩初级社一九五五年每亩三百零五斤的百分之六十，比一九五二年没组织起来时亩产一百二十斤增加了三倍。其中六十五亩丰产高粱，预计每亩产一千斤；三十五亩丰产玉米，每亩一千四百多斤；八十五亩直播白薯，每亩能产一万斤，全社预计农业、畜牧、果树、林业、副业收入三十余万元，每个劳动日可分到三元四角。全社共五百四十九户，有五百三十三户比一九五五年增加收入，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七。其中增加收入一倍以上的四百七十户，占总户数八十六。（《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农业合作社增产增收》，《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2日第3版）

早在1956年，“穷棒子社”就已经实现了白薯亩产的“特大跃进”，为什么还要在“大跃进”中“沉着地”报一个更低的指标呢？难道人民公社化不应该更上一个台阶吗？显然在逻辑上不通。如果说，“大跃进”中王国藩的举动是反“浮夸风”，实事求是，那么，在“大跃进”前的报道，不是在自招已经搞了“浮夸风”，并不实事求是吗？为什么会出这种变化？无论是顶住极“左”还是反对骗子的干扰、破坏，都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古鉴兹在小说《穷棒子王国》（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88~89页）中，对同一故事有着完



1970年代中期,西铺“穷棒子社”群众在打麦场学习毛主席著作

全不同的讲述：

一九五八年春,县委第一书记陶寿旬召开有社主任、本县劳模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丰产田产量,叫大家报白薯指标,开始谁也不报,有殷大龙在,都盼他先说。殷大龙一看不说不行,憋了半晌,没办法,大着胆子,使了个劲说:“亩产四万。”这一报,可以看出陶寿旬很不满意,因为他去地委开会报全县白薯亩产十万斤还挨批评呢。……陶寿旬不好直接点名批评殷大龙,只说有一部分人还有右倾,叫大伙再考虑。……第二天会一开,赵雷就到场。陶寿旬见赵雷来了,问他:“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人家都是几十万斤,你们才报了四万斤,你们是黎明社,大伙都在向你们学习呢。”赵雷说:“昨天夜间我们又重新考虑,四万斤不合适。”“多少?”很多人都望着赵雷,看他能再加多少。赵雷说:“我们把一切所有劲都使上,最多亩产八千斤。”

“八千?”

“八千——这是跃进指标,实际我们是争八千,保五千。”

这一下哗然了。

“殷大龙呢?”陶寿旬把脸沉下来。

正说着,殷大龙走进来,他纠正赵雷的话说:“不,不,陶书记,我们报八十万。”

……

回来的路上,赵雷跟殷大龙吵了一道:“你带头报八十万,你真不知道这是发疯,你起了啥带头、起了啥影响?!你掂掂你自己有多沉?就算一百斤,像你这么大白薯得八千个。八千个放在一亩地里装下装不下?!”

实事求是的英雄,变成了前战友日后成为王国藩对头的杜奎(小说中的赵雷),王国藩(小说中的殷大龙)却成了迎合“浮夸风”的投机者,以便确保已经到手的模范地位。当然,故事这般描写,有作者创作的成分,尽管法庭判定此书确有所指。另一方面,故事中的

情节,也非作者亲眼所见,但是,由于作者自1960年2月起任建明人民公社副书记,距离故事发生时间不长,所闻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穷棒子社”的“千百万运动”

王国藩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讲,1958年“战胜了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旱灾和百年不遇的暴风雨,夺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原来建明合作社四个村,粮食平均亩产700斤,棉花平均亩产皮棉60斤。(《人民日报》1959年5月1日第3版)没有提供白薯亩产数字,三个多月后,王国藩又对粮棉亩产进行了下调。(《人民日报》1959年8月30日第5版)事实上,由于“浮夸风”中高产数字距事实过大,公开报道中,数目字被处理的十分模糊。

在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思想的最紧要时刻,毛泽东再次注意“穷棒子社”的情况。1959年8月6日,毛泽东对《经济消息》所载《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批示:“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取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8月19日,毛

泽东写信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要求组织一次包括“穷棒子社”的人民公社调查研究,每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三个月交卷,编一本书并加上万言长序,并强调“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62页。)11月26日,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向毛泽东报告,亲眼看到“穷棒子社”“今年生产的结果是五业齐跃进,全面大丰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596页)

为了继续“大跃进”,1960年“穷棒子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千百万”运动,集中全县、全地区乃至河北省的大量人力、物力,制造新的高产奇迹。所谓“千百万”运动,特指亩产达到千斤粮、百斤棉、万斤薯的高指标,由于白薯亩产直接关系到粮食平均亩产的计算,尤其重要。因此,除兴修水利和书记包干外,对指标和措施均有规定:

春白薯:共种13112亩,1582块,平均亩产10438斤,比原计划亩产提高4866斤。

在增产措施上,除了全面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外,计划突出抓四条:①白薯地普遍深翻,根据土质深翻6寸至1尺,消灭6寸以下浅土层,通过深翻和换茬,更新土层,消灭重茬;②多穗高粱普遍改下杓上种,即打垄种植,保证多分蘖;③保证不缺苗不断垄,没有废弃地;④开荒,全社计划开荒5000亩,仅这一项即可拿到150万斤粮食,生产队并统一组织社员开展百吨杂粮、百吨薯的“双百吨”运动。(《中共唐山市委关于建明社“千百万”运动情况向省委的第一次报告》,1960年4月20日)

从表面上看,地方党政领导降低了指标,接受了“大跃进”初期由社队干部提出的数字,似乎只要经过努力,就有可能实现计划。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为了实现这样的指标,地方党政领导需要借助组织优势,集中人力、物力精心加以培植,说明之前所谓“实事求是”的数字,水分也很大,不是一个在较大范围内能够实现的亩产数字。其实,即使降低指标和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落实还是困难重重,天旱和人的思想问题被列为最重要的内外因素,措施上则主要是水和劳力问题。兴修水利的成绩,可发挥作用的尚不足一半,各生产队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劳力一般不足70%,因此,深翻、开荒和充分利用田埂、地头等措施,都要打个大大的折扣。进入夏季,眼看计划

就要泡汤,于是,“千百万”运动被推向新阶段:

在抢种方面:首先抓住了一人一亩薯运动。……措施是:(一)春薯不足夏薯补,耕地不足开荒补。……(二)建立薯秧基地5000亩,保证了全社各个生产队有足够的薯秧。对一些薯秧不足的生产队,已开展了协作。……(三)集中人力大突击。6日雨后,展开了锁门运动,集中力量抢栽白薯,共投入劳力4000多人,同时还从工厂、学校抽出1400名职工、师生支援任务大的生产队,抢栽抢种,公社、管区两级抽调120多人组成工作队,深入第一线包村、包队,亦兵亦帅,和社员生活、战斗在一起,大大鼓舞了社员的干劲。(四)妥善安排劳力,提高劳动效率。西铺管区建立了打垄、剪秧、栽薯专业组,开展“三追、三保”的一条龙大竞赛,栽薯日进度由200亩提高到250亩。炸糕店生产队把任务逐天落实到各组,采取晚上剪秧备战,白天抢栽,当天任务当天的办法,大大的提高了进度。截止到7月13日止,全社已栽种白薯19662亩,平均每人已达0.79亩。全公社44个行政村,已有14个村于7月10日实现了一人一亩薯。(《中共唐山市委关于建明社“千百万”运动情况向省委的第十次报告》,1960年7月17日)

一人一亩薯,主要在于确保粮食总产量,尤其是解决现实中的口粮问题,与亩产万斤薯存在不小的距离。目标的变动,已经宣告前亩产指标失败。事实上,自4月始,浮肿病已在建明社蔓延。在“千百万”运动的进一步报告中,1960年仍然取得了农业大丰收,可是白薯亩产指标却不再见诸于文字了,以后,也鲜见“大跃进”时期白薯亩产情况的回忆。

有关“大跃进”中“穷棒子社”白薯亩产的记载和回忆表明,历史故事具有多种面相,一个村庄白薯亩产的小事,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也可以承载丰富的内容和情感。仅靠某人亲眼所见,还不能说明事实的全部内容,回忆就更为有限。至于是否实事求是,也不能依据关系远近和政治需要,凭借“欣赏”或“泼脏水”加以判定,需要收集尽可能多的、各种类型的相关材料,放在当时环境背景下进行动态的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小说《刘志丹》的三次被禁

。 李 原

长篇历史传记小说《刘志丹》经历了一个1962年被否定—1979年被肯定—1986年被最终否定的过程。1979年至今30多年来,各种传媒发表了不少有关这部小说的文字和谈话,其中既有重要史料,也有事实性原则性的疏漏和差错。特别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从1962年被否定,讲到1979年作为一部好小说得到平反为止,根本不提它公开出版发行后,因为“确实存在严重错误”而于1986年再次被中央否定的历史事实。

1962年,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批评意见。笔者当时是省委副秘书长兼阎红彦的秘书组长,直接间接地接触过有关的若干历史资料,并在2003年云南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第十六章作了披露。本人现已年近九旬,作为一名老党员,深感有必要、有责任再说说有关情况,主要是1979年、1986年及后来的一些情况。

1986年习仲勋主持否定小说《刘志丹》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量的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纠正。中央组织部委托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研读小说《刘志丹》后,向中央写出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8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为受牵连的习仲勋等同志和小说作者以及所有有关人员平反。

于是,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后来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三卷本《刘志丹》。本来人们期待着看到一部可信之作,遗憾的是,作者未能正视1962年书稿本身确实存在的

问题,未能正视有的西北老同志提出的在重大原则上应该符合历史事实的意见,未能遵循党史题材的传记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修改。虽然1962年批评过这部小说的阎红彦早在1967年1月就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但是这部小说一面世,仍然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一些老同志纷纷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这部小说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有关方面负责人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的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同志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总书记就上述意见做出报告。

胡耀邦总书记所作的重要批示

1月12日,胡耀邦总书记对冯文彬的上述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这个报告是中央同志审阅和批准了的文件。有关党员同志必须严格遵守。我们说过多次,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

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

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

在《刘志丹》一书被否定—肯定—最终否定的过程中，单就文学创作而言，涉及一个本来就十分明确的原则。这就是胡耀邦批示中所说，党史题材作品特别是文学传记作品，“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任何以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为由而否定这个原则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1962年，阎红彦看了《刘志丹》部分章节，特别是看完全书以及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等转来的出版社提供的有关背景材料后，对《刘志丹》提出的主要意见是：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全国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其基本精神同上述1986年中央认为这部小说存在严重错误的内容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阎红彦建议暂缓出版，并在9月3日致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信中，建议组织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谈，以便于作者对小说进行修改。1986年中央则采取了小说停止发行和对作者进行批评、处理的组织措施。

薄一波对《刘志丹》的述评作了修订

1979年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把它认定为一部比较好的小说，还说小说问题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了解情况的有关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对此很有意见。西北老同志贺晋年向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提出了意见，宋任穷说：我没有注意这个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



刘志丹

生联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

中央组织部1979年的报告，被一些文章和著作作为宣传《刘志丹》是一部好小说并指责阎红彦的依据。有人还引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关这部小说原来的错误表述，而避开了作者很快就作了修订的文字。当几位西北老同志委托贺晋年对最初的版本提出意见时，薄一波当即诚恳地说：“哎呀，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很快给贺送去修改稿，并请他把改稿给有意见的同志都看看。改稿指出小说有错误，肯定了阎红彦等同志对样书提出意见是很正常的。

在1994年6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第1版第4次印刷时，删去了有关阎红彦的所有文字，改为“对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当然可以进行批评”。明确指出，小说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作品本身是有缺点或错误的。因此，曾参加过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中，有的对它提出批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康生却别有用心，制造了一起大错案。至于1984年至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刘志丹》涉及的政治领域中的是非问题，中央领导已明确指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著，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2004年2月第1版第11次印刷时，也经过认真研究后，修订了涉及小说《刘志丹》的述评，明确指出“小说《刘志丹》确有缺点或错误”。

阎红彦被迫害致死20周年之际，薄一波为阎红彦作了一个既有感情又有个性化的题词：“为人正直不阿为真理奋斗不息”。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题为《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文章。文章说：阎红彦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二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三任总指挥。

《大公报》记者笔下的苏军日侨和内战

○ 张 刃

1946年夏季爆发的国共内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交战双方在东北地区的较量，决定了国共最终胜负的走向。

对于这场战争，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先后有吕德润、徐盈、张高峰三位记者，对东北局势做了充分报道。时隔一个甲子，重新翻阅当年作为新闻，现在已成故纸的文字，今天的人们或许仍能从中了解某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所谓“污蔑苏军”问题

国共在东北的较量，实际上从接收东北就开始了，而接收东北，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苏军问题。

苏联红军从1945年8月进入东北作战，到1946年3月开始撤军，在中国驻扎了半年多。苏军对于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起的作用是历史性的，苏军为此牺牲的将士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同时，苏军在中国土地上的某些行为，特别是对中国东北工业的破坏，也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地与他进行了斗争。阎红彦直到“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致死，可以说一生中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为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三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地发现并制止

1949年以后，在“一边倒”的外交氛围下，在中苏友好的岁月里，凡是关于苏军在东北的负面宣传都是不被允许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当年《大公报》记者关于苏军的报道，特别是苏军拆毁东北工业设备的记录当然不能提及，甚至成为报道者“污蔑苏军”的“罪行”而被迫“检讨”。直至1980年代，有人建议吕德润与张高峰把当年东北内战报道结集出版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婉拒了。这其中，国共关系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关于苏军的评价也是原因之一。

那么，关于苏军在东北，《大公报》记者报道了些什么呢？吕德润是最早到东北的，与苏军有过直接交往，掌握有第一手信息。1946年10月21日他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通讯，题为《断了线的项链》。他把东北工矿比喻为一串彼此配合又连在一起的珍珠项链，指出：在日据年代，那“粒粒珍珠是用战争的线连起来的……日本投降后，这个珍珠项链从日本军阀的身上拿下来了，战争的线也断了。但是珍珠仍是珍珠，正是我们拿到自己身上，用和平的线上再连在一起的时候，然而苏军进来，内战起来，一拆一毁，珍珠满地而被踏碎。”

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如果把小说《刘志丹》被否定—肯定—最终否定的全过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或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在我看来，有关党史题材和党史人物的研究和写作，首先需要尊重事实，把事实搞清楚。因为尊重事实才能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才能正确总结历史，面向未来。■

（责任编辑 徐庆全）

这篇通讯是吕德润系列报道《东北工矿巡礼》之一，其中有一节专题《苏军的拆卸与经济谈判》写道：“到东北来，一般人看看工厂，便会马上看出一个惨象。事实上也真叫惨。尤其在沈阳及其附近，机器搬的光光的……东北工厂的残破，大部是苏军拆卸而致，可是苏军究竟拆走了多少东西？到现在没有一个正确的计算。同时因为打仗，有些地方看不到，连较近的估计都不能定。不过，在政府区的几个工业区看看，几乎是很少完整的。……苏军的拆卸是有计划的，军火工业几乎都完了。沈阳的兵工厂、军火厂、造坦克的机器厂、飞机厂、抚顺的轻金属厂（飞机用铝）、鞍山的钢铁厂，拆的都很彻底，而拆卸的时间是去年九月，才一出兵便动了手。……苏军拆卸走的，可算得出的主要的是电力。据报告，三十四年（1945）七月东北的电力是170多万千瓦，现在较精密的计算，苏军拆走了一半多，占51.2%。”

苏军为什么拆卸机器？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他们打败日军的“战利品”。1945年10月，日本投降两个月后，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和外交部特派员蒋经国到了长春，第一次与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见面，就提出了接收东北工业问题，但苏方以“战利品”为由拒绝了，双方没有谈下去。1946年春，蒋经国去了一次莫斯科，再谈东北接收问题，苏联最高当局依然坚持“战利品”之说，而且就在这扯皮的期间，苏方拆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中国东北的工业设备。

当机器设备拆得差不多了，苏方又提出了“经济合作问题”，吕德润写道：“据内幕的消息是苏方要合作七十多个厂，又继续谈下去，苏方要三十多个厂，这里数目字大小并没多大关系，因为像鞍山、阜新、本溪那样的厂几个便够受了。……谈判里在看法上两点距离：第一，苏方觉得出兵解放了东北，东北是日本人的兵工厂，中国应该承认他们的权利，我们认为东北被日本压榨了十四年，虽有日本的‘功劳’，但主要的是我们的。第二，两国的经济制度不同，苏联是社会主义，以政府出面合作，这和过去我们政府与外国某厂、某公司合作的方法不同，这使一些人有点‘不习惯’。于是长春谈判便无形中止。但是南京方面还继续交换着意见。……撤兵是延了期，重

庆各地是游了行，于是一切没下文。……据关系方面的人讲，合作是可以的，不过先拆机器，又要把破破烂烂的还合作，实在讲不下去。”这里所说的苏军延期撤兵，自然是因为他们要求的利益尚未实现，而重庆各地的游行，则是指中国人民表达抗议之声。

苏军拆卸中国机器，还给出了一个“理由”：“据说是记在同盟国要求轴心国赔偿的账上了。苏联拆走的，我们可以自日本赔偿中多得一点。”但吕德润的报道指出：“……可是一时仗义直言的同盟国们，现在又让我们在日方方面拿了什么呢？我们没有见到从外国来的机器。在东北现在看到的只是香烟、巧克力糖、皮鞋油、玻璃胶带。日本已在我们的领海捕鱼了，我们在日本要拆的机器还得等着分配。”显然，那是一张空头支票。

徐盈是随军调小组到沈阳的，他对苏军的有关报道记录的只是观感：

“苏联人接收去不少的战利品，沈阳从此失掉拥有东亚第二兵工厂资格。留下的是‘奉天驿’车站前的一座红军纪念碑，上面顶着一个老虎坦克；远东银行及大和旅馆门上，有两大张史达林彩色绘像……沈阳是个火药城，城东及城北兵工厂在东亚占到第二位。记者团在凭吊那拆得空洞洞的北大营之后，在那水泥钢骨的大建筑物看一看四周已少有人迹。但那最北端烟囱林立，那就是十四年来新建的九一八兵工厂。……在这个大兵工厂内绕一周，所看到的的确已经破烂不堪，整个火药库变为了垃圾堆。没有一个汽车有轮子，没有一个厂内的动力机不被拆毁，特别是从旧兵工厂及美德等国订购的良好机器，已全部失了踪，有一小部分已然用木板装好箱正安置在一架起重机下，等候起运。巨大的厂房有的整个炸毁，有的鼓风机倒在一边，大烟囱暂时停止冒烟了。就算是想要恢复，也并不是一个短时间的。”

张高峰到东北时，苏军已经撤走，他在1946年7月14日发回的通讯《崩落中的沈阳》中写道：

“苏联军队一度进驻沈阳，给中国人和日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自飞机场到城里凡是公共建筑或是工厂，满目疮痍，破坏到不能再破坏的程度。沈阳的街头随处可以看到被拆毁的汽



《大公报》记者发表的报道

东北内战结束 63 年了,作为历史,关于苏军在中国东北的“负面”信息,如同二战时期苏联的某些“劣行”一样,也不再是讨论禁区。这里,不妨用当年《大公报》报道中引述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战时苏联游记的一段话作为结语:“苏联政府与人民都认为,他们没有责任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帮助我们打日本。在对轴心之战中,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担负过多的责任……假若苏联参战,那一定为了自己的目的。”“苏联已经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然而有一件事可以论定:苏联不能容忍在‘满洲’出现一个反苏政府。”

警觉日本的东山再起

日本在东北盘踞了 14 年,战败投降后,仍有大批日本人留在东北。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在《大公报》记者的笔下留下了记录。今天翻检这些文字,笔者常常为他们当年的敏锐观察所叹服,特别是他们对战败的日本人东山再起的警觉,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吕德润在战争结束四个月后的 1945 年 12 月 16 日报道说:“日本赫赫一时的关东军,与苏军一接手没几天便垮下来,现在这些俘虏们,有劳动能力的,苏方已征调苏联国内作工去了,一部妇孺及没劳动能力的留在这里,移交中国处治。”“日本人在这里作了十四年的太上皇,作威作福够了,今年他们是在劫难逃,长春据说还有十多万日本人,老弱妇女多,到现在冻死的也上万了。不过原来是大富翁的,现在还过的相当舒服,大鱼大肉还有钱买,普通的人便吃冷风了。日本人在这里开了舞厅及妓院,并公开招考妓女,广告上说:‘无论有无经验’均可应考。”

在沈阳,张高峰还看到过这样一个场景:一个讨饭的中国孩子到一家日本酒馆要钱。日本老板说,他们已经投降了,实在穷得要命,没有钱给他。那孩子不容分说,上去就是两拳,那个日本人不仅没有还手,还连说好话。张高峰感慨:日本败

车。我坐在三轮上慢慢地凭吊铁西区无数的工厂,窗户与门都没有了。骑三轮的山东老乡比我还愤慨,指着工厂骂大街:“奶奶的,日本人在这的时候,这些象树林子的烟囱全冒烟,连家雀都得熏黑,现在破坏得一个也不冒烟了!”

他对东北工业恢复前景的结论,与吕德润、徐盈惊人地相似,并且有第三方佐证:“鲍莱调查团到东北来过,他们也是慨叹而归,沈阳原有的工业非三年两载所能恢复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公报》记者们的判断没错。

除了拆卸工业设备,苏军某些人在东北的某些恶劣行为,也常常为百姓所诟病,《大公报》记者的报道中没有相关的事例记录,这或许因为顾及中苏关系,或许他们没有亲历亲闻,不便报道,但在吕德润的报道中有这样的记录:“苏军部分人的军风纪的问题,在东北是一个悲哀的因子。我愿意用‘部分’二字,因为我在长春、沈阳、哈尔滨都看到苏军高级军官来竭力整饬的情形。在长春,有的时候,苏军司令卡尔洛夫亲自出去调查,更时时把那些越轨的人抓起来。在沈阳高夫堂将军也是如此。今年新年我在哈尔滨过的,据当地人民讲,当地的军事最高机关天天有把越轨的人执行死刑的。”以死刑整饬军纪,问题的严重可见一斑了。

落了,过去凶极一时的日本人,不仅没有了往日的“威风”,甚至在一个不讲理的中国小孩子面前也投降受辱了。

1946年6月,张高峰被派驻沈阳,7月14日,他发回的长篇通讯《崩落中的沈阳》,就用许多篇幅记述了滞留在那里的日本人。他特别写了这样一段话:“讲到日本人,我个人常感到将来的可怕。”为什么呢?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日本人的“屈服”。

他分析道:“日本人是个坚苦卓绝的民族,过去以这股劲立国,今天仍以这股劲向同盟国家投降。我们在南京、上海、天津、北平以及东北所看到的日本军民,全体有条不紊,一声不响地低下头去,你说是因为已经投降不得不如此吗?我说这正是可以注意的地方。……在沈阳,凡是各官员所举办的舞会或联谊会,总是有日本人来做侍役或登台去表演。他(她)们永远陪着笑容给来宾倒茶划洋火,登台的卖尽力气去表演。过去每个日本人都凶得像只老虎,今天驯服得真不如一只绵羊。能伸能屈的程度如此,你说是因为已经投降了不得不如此吗?我说这是日本将来要起来的力量。”

战后的沈阳有许多以陪侍客人为生的日本下女,在张高峰看来,她们“是投降后一群生活无着的孩子们。这些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卑贱,除了少数放纵的以外,多数还是有她们的身份。甚至她们的(文化)程度超过中国的客人。每个下女都可以给你从明治维新讲起,每个下女都能与你笔谈。”

沈阳的中苏联谊社是当时记者们的聚会场所,有一位姓村井的日本下女,丈夫被苏军拉到西伯利亚去了,她一个人抚养着三个儿子。张高峰的报道中以她为例写道,有记者直言不讳地谈起她私生活的不检点,“她不否认,但她说:‘今天中国人看来,我是一个无耻的女人,等我把三个孩子带回日本以后,我就是伟大的母亲。’而且她开玩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的儿子是日本的好壮丁。’我说:‘你还希望有战争吗?我已经怕了。’她又笑着答:‘我希望有!’这该不是纯粹的玩笑吧!”

张高峰写道:“在沈阳跟日本人谈天,一提到中国之战胜,他们开口先说美国,虽然我也极力向他们争执胜利的原因,但是内心总免不了惭

愧。……今天在东北各地的日本人已经普遍的与中国人接触了。这应该是我们认识日本也是教育日本人认识中国的好机会。可惜,许多人竟利用这机会解放了‘一切’,仍没有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旧观。”这就是张高峰所说“将来的可怕”。

事实的发展证明了《大公报》记者的忧虑。1946年10月,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四个月,吕德润报道说:“现在各地日侨已经开始遣送了,去年一些不愿回国的,现在都吵着要回去了。他们不再泄气。他们乐观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看看今日的国际,听听国内的炮火,我们像明白了一些。但是日本人比我们明白的更快,他们现在争着要回去了。去年日本人说,日本复兴要二十年,现在他们说,只要五年就够了。”

《大公报》记者对日本人的认识和警觉,固然有他们亲历八年抗战的血泪印记,但更多的还是他们的理性观察与思考。

“中间偏左”的立场

如果说,《大公报》记者报道苏军与日侨行为举止,是出于民族心理,站在民族立场,那么,他们对随之爆发的国人之间的内战又是持什么心理与立场呢?

新闻报道以真实为第一生命,真实的重要前提是客观。但是,记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素材的选择,却又不能不受主观意识的支配,由此产生报道立场问题。以下引述几段《大公报》三位记者各自在报道中表露的对内战所执态度:

吕德润在1946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对于日益蔓延的内战写下这样一段内心独白:“我不知应祈祷谁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夜的沈阳又停了电,街上一片漆黑,桌上一条颤抖的烛光,外面是戒严了,连狗吠声也听不到,在黑暗里人们常常想起鬼来,于是我祈祷那些在内战死掉的冤魂,今夜应该分批出动,给那些有力量作践你们的政治家军事家们托梦去,告诉他们,你们是人!你们死的委屈,你们现在还没闭上眼!求他们开恩饶恕了你们未死的父老兄弟姊妹们!”

即使是引述报道对象的话,也表明记者对新闻素材的主观选择,吕德润的报道说:“东北人和我讲过:‘十四年中也没有看到什么党,我们等了

你们十四年,你们来了,你们逼着我们打仗!”

“一个东北人说:日本人统治的时代对一般老老实实的人民不过是让他们流汗,而慢慢的死!难道胜利后的中国非逼着人民上刀山吗?日本人在的时候,没打!难道日本走了,自己打吗?”

“在沈阳,有人喝醉了后大哭起来。有一个是一位中年人,他说流浪在关内的孩子,十四年了,连他母亲的坟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些当父亲的,又要流浪逃亡了。我们连祖坟也要丢了!这位还作了打油诗,诗中更是满腔悲愤,其中有一段是:‘等了十四年,一场空喜欢,我们流血泪,别人争江山……’。”

10月,他在另一篇报道中写道:“现在我们国家看起真富得像不在乎钱似的:枪炮尽管放。我们国家看起来又最穷:用在建设方面斤斤计较,很怕浪费。现在是全国大打了,每天双方动员至少有一百万吧,连吃穿住放的枪炮在内,每天花多少钱?而且那些人民受内战影响损失的,和用了全身之力结果一个枪子便完了一生的有多少?假如把这些财力物力都用在建设上,这是人人都会叫好的事。……当然,政治家们军事家们也许说我们打完了再建设将来也许更好。好吧,不过在寒冷的日子,人民挨冻是会诅咒战争的。”

徐盈随军调小组到东北采访不过匆匆数日,他写道:

“站在沈阳街头上,坐在美军给我们的吉普车上在各处走,看一看在这次战争中翻身起来的苏联,看一看在这次战争中没落的日本,再想一想在夹缝中翻身的中国人,要怎样来求今后的自处,是战争呢,还是和平呢?”

战争与和平的歧路中,杜鲁门的名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是由于东北脱离中国。’在这里被人一再提起了。但中国对东北的现状也应有一个新认识,使东北能永为中国所有,不至于由东北再引起世界第三次大战。每天徘徊在‘世界和平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下的人们,不能永远在那里静观了,希望越大的人常常会得到更大的失望,东北人民的大希望不应该拖成大失望。……以东北的资源,人力,建起一个征服世界的兵工厂的黠武者之梦是幻灭了。制造兵器的机关如今怎样来转化为和平服务呢?这其中是若干的债务要清偿,但清偿的方式应当

是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武力。”

徐盈在谈到军调小组的使命时说:“每个到东北来的人应有一个起码的认识,‘祖国不应成为日本的统治方式的接管者。’十四年奴隶生活的解放者,要来接种‘民主’,不要来接种战争。”

1947年7月,张高峰发自沈阳的报道中写道:“东北的局面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弄得老百姓头昏眼冒花,他们认不清是谁先打谁,有的说中共不好,有的说中央的官吏够受。他们只以为今天的内战是争地盘。政权是甚么,他们不懂。‘我们夹在中间了!’老百姓常这样说。”

从去年国军入关就在打,断断续续打到今天。究竟打死了多少人,无从统计。我只知道政府在东北招募新兵6万人(约合6个师),命令上限7月1日招齐。沈阳市征募5000人,已经报到入营。从法库等地逃出的难民说:共产党也在征兵,但数目不详。敌人压榨了14年的东北人,该多需要安定,不幸今天又要去当内战的炮灰。他们对祖国多悲哀,对胜利多失望!‘怎么还打内战呢?’老头、老太婆、年轻人都在发这样的疑问。这有谁能解答呢?

双方兵力在东北成正比的增加,军粮也成了大问题。辽宁不许老百姓吃大米,饭馆旅馆不许卖米饭。日本人在东北的时候,老百姓只许吃杂粮,政府光复了东北,老百姓还是替别人种大米。……因为东北军粮不能自足,已经下令禁止再往关内运粮。见报载平津两地也在闹粮荒,荒是荒在老百姓头上!”

《大公报》是民营报纸,一贯以“不党、不卖、不盲、不私”为宗旨,在国共内战问题上,它奉行所谓“第三条道路”,它的记者、报道也大体如此——尽管《大公报》从来不曾对记者下达过报道“指示、要求”之类。

具体到在东北采访的三位《大公报》记者,徐盈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当时为秘密身份),吕德润、张高峰都没有党派身份,他们与国共双方都打过交道,但他们的报道并不具党派色彩与倾向,其反对内战的心理、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弄清楚这一点,对于今天的读者理解他们当年的内战报道是必要的。■

(作者为《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吴满有的两段人生

○ 朱鸿召

抗日战争后期,一个自己不能读书识字的陕北农民,忽然被新闻媒体发现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不断发掘出革命的价值,提炼出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典型意义。在两个兵戎相见的军事力量团体之间,在两种矛盾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挤压下,农民的真实话语和本来意愿被遮蔽扭曲了。

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吴满有

1944年2月11日,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劳动英雄吴满有致毛泽东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毛主席:

去年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延安县也开了县的劳动英雄大会,在这大会上,热烈的响应了你的号召,全县10个区、48个乡里很多乡村,都组织起来了。除去农业之外,纺织、烧炭也定了计划。延安县大会结束之后,我回到家里又帮助本乡各村组织了变工队,并亲自帮助50多户做了农户计划。这是我最近的工作情形,我想一定是你愿意知道的。

我还计划今年多开4垧荒地,为你代耕2石细粮(一石麦子、一石小米)。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谋划全国的工作,不要为了生产多消耗你的力量。我能为你代耕,是我最大的光荣,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接受我这小小的诚意!最后还希望你在工作中注意你身体的健康!

吴满有(签名)

正月初十

吴满有(1893~1959),原籍陕西横山县石湾乡麻地沟村,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姐妹6人,吴满有为兄长,没有进过学堂的门,从小就给富



在枣园住过一晚后,毛泽东亲自送别吴满有
(徐肖冰摄影)

家拦羊干活。1928年横山大旱年,他携家眷逃荒来到延安吴家枣园,租地耕种,打柴佣工,勉强维持生存。1935年,陕北红军领导土地革命,吴满有分得土地一架荒山,大约60垧。过去受苦半生,草都不存一根,革命给了他这么大一块土地,他知恩图报,觉得自己不种好地就对不起政府。他送二弟吴满旺参加红军,自己带领孩子勤奋耕种。开荒种地越来越多,劳动积累也越来越多,全家人有吃有穿,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1936年,打粮11石,送交公粮2石;

1937年,打粮17石,送交公粮5石;

1938年,打粮20石,送交公粮8石,还养牛2头、马1匹、驴1头、羊50只。

在没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陕甘宁边区,

吴满有经过三年劳动,就解决了温饱自足,并且热心公益,积极缴纳公粮,支援前线抗日。1939年春节,吴满有挑上一担黄米馍和油糕,送到乡政府进行拥政。

1941年,吴满有一家开荒种地33垧,秋收时节,打粮34石,送交公粮14.3石、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150元、公盐代金665元。这在边区经济最困难时期,是非常令人惊叹的义举行为。

1942年初,在延安县各区长检查春耕联席会上,柳林区区长尹登高介绍了吴满有的先进事迹,“地种得多,荒开得多,粮打得多,缴公粮踊跃争先,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是一个抗属,模范的农村劳动英雄。”并且,声望高,影响好,“我们这区上有个模范吴满有,公事就好办,他一个人的行动,比一百张嘴的解释还更有效。”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旁听会议的《解放日报》记者莫艾,抓住了这个新闻线索,随即翻山钻沟,专门找到距离延安约30公里的吴家枣园去采访。

第一次站在记者面前的吴满有,时年49岁,身体强壮,不识文字,通情达理,非常憨厚朴实,热情待人,不肯多说自己有什么长处。在记者的循循善诱之下,他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偶尔冒出几句大实话,精辟透彻,字字珠玑。“我的兄弟用血保卫边区,我用汗保卫边区。”记者又跑到周围群众家采访,吴家枣园总共14户农家,无不异口同声地称赞吴满有:“这样的好人,还有啥话说。”

回到报社,莫艾很快写出长篇通讯。恰逢报社处在整风运动报纸改版讨论之中,作为改版后的中共中央党报,报纸首次以典型报道的方式,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平实的语言,报道吴满有“比别人多打粮六分之一”的经验。同时配发社论,广受好评。

一个典型,一面旗帜。报纸充分发挥吴满有对边区农民的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农时季节,报纸都宣传吴满有的模范带头作用。并且,凡是关于吴满有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是头版头条,或二版头条的显要版面,此外就是四版副刊的长篇通讯和艺术创作。

1942年5月23日,朱德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发言时说,《解放日报》发表关于吴满有的新闻报道,其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救国公粮,相当于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

粮的总数。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拨付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以及海内外的捐款。1937年至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中外援所占比例分别为77.2%、51.69%、85.79%、70.5%,由于国共关系紧张,“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边区财政收入1960.51万元,外援断绝,岁出2528.78万元,透支568.27万元,边区经济陷入极度困难之中。为了度过艰难,中共中央号召军队、机关、学校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大生产运动,力争生活用品一半自给,以减轻农民赋税负担。同时,调整农业政策,鼓励农民扩大生产。吴满有这个新型农民典型,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发现的。

天公有情遂人意。1942年陕北全境欣逢丰年,边区生产任务顺利完成。吴满有一家3个劳动力,另外雇佣一个长工、一个拦羊娃、半个拦牛娃,种地77垧,收获粮食42石,饲养牲畜牛5头、马2匹、驴1头、羊200只。“老吴这时是吃不愁穿不愁,他已经变成一个富裕农民了。”吴家枣园16户人家,全村组成一个“大变工”,计划开荒80余垧,实际开荒120垧,种地263垧,收获粮食141.5石。缴纳公粮公草后,全村每户农民生活都达到温饱水平。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讲话,大量援引《解放日报》关于吴满有的系列报道内容,充分肯定他由一位贫雇农发展成为一位有觉悟的边区新富裕农民的经验,高度称许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43年,边区机关、农村和驻地部队纷纷参加生产劳动竞赛运动。1944年春节过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先公布个人年度生产劳动计划,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机关干部都参加生产劳动。吴满有在得知毛泽东的个人生产计划后,主动提出为他代为耕种,完成生产计划的请求。

吴满有本人不识字,报纸上发表的致毛泽东的信,是新闻记者们策划运作的。其信后吴满有签名,也是别人帮助写好后,让吴满有照样描画的。

面对这样朴实诚挚的雅意,毛泽东接受了吴满有的请求。此后,吴满有每年都把收获最早最好的一石麦子和一石小米,亲自送到中央办公



1948年9月,吴满有(左)与杨经曲(右)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举办的记者会上。该照片由秦风先生发现,但在图片说明文字中,将杨经曲误作吴满有

厅。多次来往中,吴满有了成了毛泽东了解边区农村情况的农民朋友。

1946年初,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来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到吴家枣园,跟随吴满有学习农业生产劳动,从春至秋,历时约半年,占毛岸英在延安时间的一半。

南京《中央日报》上的吴满有

1947年3月10日,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19日进占延安。毛泽东、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3万部队与之周旋,先后取得沙家店、羊马河、青化砭三次战斗的胜利。青化砭大捷后,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三万人祝捷大会。周恩来当场宣布毛主席还在陕北,全场一片欢腾,当即掀起参军热潮。吴满有身为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集会上被邀请发言,他主动要求参军打胡儿子!“胡儿子”是指国民党将领胡宗南。

吴满有的态度代表了边区群众的民意,王震欣然接受吴满有从军,并破格任命吴为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民运部副部长。吴满有带领担架队,跟随主力部队先后参加了攻打榆林、围歼瓦子街战斗。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组织西府战役攻打宝鸡时,受到胡宗南和青海马继援的夹击,被动失利。此次战役西野各部伤亡6566人,另有失

踪、逃亡、被俘人数8407人,合计损失人数为14973人,吴满有也在俘虏之中。

吴满有被俘之后开始并未暴露身份,化名王文亮,被编入胡宗南设在西安的“爱国青年训练总队”第五中队。不久被同在俘虏营里的原川口区六乡的乔树勋之子乔某某认出来,国军士兵带着乔某某过来跟吴满有当面对质,吴满有不承认,乔某某说:“你就是吴满有,把皮剥了我也认得。”吴满有坚持说自己叫王文亮,并不知道什么吴满有。对方不放弃,随后,把吴满有多次带去审讯,严刑逼供。吴满有始终保持沉默。硬的不行,改软的。他们把吴满有从大通铺里抽出来,与中队副汪秉法同住一个单间,不吃大灶,改为同中队长们一起吃饭,趁晚上睡觉时,把吴满有脱下的衣服偷偷拿走,放上国民党部队绿呢子“官佐”军服,逼着他只能换上,配皮鞋,马上叫政治教官来拍照。

不久,他们把吴满有升格移住青训总队政工处,舒缓气氛,带着吴满有逛公园、看电影,后来就带到广播电台,要吴满有发表讲话。据保存在陕西省政协文史馆里的这份材料介绍,他们怕吴满有在广播时自说自话,或随口乱说,找来一大队训育干事绥德人汪铿清,语音接近吴满有,代替吴满有先后发表三次广播讲话,表示弃暗投明,声明脱离共产党云云。

吴满有被人顶替发表广播讲话后,中共中央西北局迅速做出反应,认为吴满有已经投降叛变。这样,更促使了国民党方面对于吴满有的充分利用企图。1948年9月,胡宗南用飞机把吴满有送到南京,由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安排,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和杨经曲一起亮相。杨经曲是革命元老,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曾出任鄂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后任中原军区第五师十四旅旅长,在中原突围战斗中被俘虏。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1948年9月26日,介绍“吴满有的辛酸史”、“英雄头衔”,以及“兵溃被俘”、“享受优待”的情况报道。

在《中央日报》罕见的这样长篇报道的结尾,特别预告将于28日下午三时在香铺营公余联社举行记者招待会,届时由吴满有和杨经曲“报

告匪区实况”。实际上,27日也举行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由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主办,主持人端坐当中,吴满有、杨经曲分坐两边,桌子上有茶水和点心。吴满有着军装,留八字胡,表情木讷,一副北方老农民形象,沉闷寡言,郁郁不欢。杨经曲着中式长衫,胡须花白,年龄稍长于吴满有,阅历也更丰富,其表情显得轻松些。这组照片由秦风(徐宗懋)先生撰文介绍并在《老照片》第62辑上公开发表。遗憾的是在图片说明中,把吴满有与杨经曲搞错了。

杨经曲和吴满有在记者招待会上各有一份被别人事先准备好的文字材料,署上他们的名字,散发给记者们。署名吴满有的材料上写着:亲爱的弟兄们:

我是吴满有,三十一年(1942年,引者注)冬天被毛泽东选为‘全边区劳动英雄’,还做过‘延安参议会’副会长和农民大学校长。去年(1947年,引者注)三月国军光复延安,我被毛匪强迫参军,担任二纵队民运部部长,因匪军流窜了一年多,看到他们到处烧杀掠夺的种种暴行,我才深切的认识它们的真面目,所以我非常的悔悟和害怕,时刻想离开他们回到我的田园去。今年四月彭德怀率领四个纵队南攻关中,企图切断陇海路,结果在陇东一战被国军打得落花流水,我从山顶上摔下被国军俘虏,当时总以为被俘是活不成了,因为毛匪恐怖的宣传‘国军俘虏共军官兵一律枪毙’,可是事实证明毛匪宣传的都是瞎话,可以报告各位,我在西安爱国青年训导总队,生活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由,全队有一万多人,同我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受到政府爱护和优待,吃的穿的完全与国军一样,等我们得到相当时间休息之后,还按照我们的志愿介绍工作,或者发给旅费,让我们回家去。现在我到南京来,政府正计划给我工作,这样宽大和爱护,能够说不是真诚的吗?亲爱的兄弟们!只有在政府区才有真正的自由生活,兄弟们!放下你们的枪,早日回到政府怀抱去,为建设富强繁荣的新中国努力吧!

这个文字材料在《中央日报》发表时,特意加了副标题“回到政府怀抱才有自由,吴满有向匪军官兵广播”,说明至少吴满有在南京期间被国防部政工局军中广播电台播报的广播讲话内容,就是这个版本。这里除了对共产党军队的辱骂和

贬斥,明显带有为胡宗南西安爱国青年训导总队邀功激赏的意思。这样一派政治话语,显然不是出自吴满有的本意。

1948年9月28日下午三点,吴满有被带去参加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举行的又一场新闻发布会。杨经曲讲话较多,吴满有木然冷漠,说话很少。次日《中央日报》报道中,特别介绍对于两人今后行动安排意见。“吴满有、杨经曲二人自俘虏后,即受政府优待。今后行动,听任其自行决定。吴满有希望回返故乡,故政府许俟交通情形许可时,送其返乡。杨经曲则已在西安担任战斗日报社总编辑,仍赴旧任。”

这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国共战争形势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吴满有被转移到重庆。1949年11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国民党看守所所长见大势已去,就请吴满有带他们向解放军投降。二野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陈鹤桥接待了吴满有,并将此情况向时任二野政委邓小平报告。得到的指示是:生活上给予照顾,然后送交西北局处理。陈鹤桥遵照指示,派人把吴满有送到西安交给西北局。

1950年3月,吴满有回到吴家枣园,只带着一个破包裹。回到家第三天,就被叫到县上。从县上回来,又被叫到乡里,分别交代情况。随即,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吴满有“屈服敌人自首,开除其党籍”的指示精神,在柳林区庙河乡召开党员大会,宣布开除其党籍。

据说,王震曾从新疆派人来到吴家枣园,准备接吴满有到新疆去,遭到吴满有的拒绝。吴满有曾托人先后三次给党中央写信申诉自己的冤屈,但均无回音。在19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立高级社时,柳林乡七个村就吴满有一个人不入社。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孤独,一个人在山上放羊,经常泪流满面。有几次神情恍惚,薄暮时分赶着羊,走失了方向,半夜被家人从山谷里找回来,手脚冰凉。

晚年因患白内障,吴满有双眼失明,瘫痪在炕上一年多时间。1959年3月,吴满有在吴家枣园郁郁而终,享年66岁。■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萧 徐)

夏衍的一次仗义执言

○ 方小宁



晚年夏衍

近来,整理二十多年的新闻采访资料。其中,1991年在夏公(原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府上听他谈向江泽民总书记直谏的笔记,今天读来仍让人深有感触。有些记忆是不该尘封的。

1989年后,文艺界陷入几近鸦雀无声的状态,夏衍对此深感痛心。夏公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曾写下《狂流》、《上海屋檐下》和《包身工》等大量作品,在建国之初的1954年就任文化部副部长,始终关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1991年初春,江总书记召开了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会上,91岁的夏公向江总书记坦言:“过去,周总理经常接触文艺界人士,每年总要和大众见见面,交换意见,当知心朋友。希望党

的领导同志,学习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多与大家沟通,继承好的传统。”

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源远流长,自古以来都是忧国忧民,讲求‘文以载道’的。中国的作家是很好的作家。他们的绝大部分是爱国的、进步的,为发展人民文学事业而努力工作。‘左联’以来,进步作家为革命文学发展做了许多事情。‘左联五烈士’就是杰出的表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艺界成立了‘抗敌文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上海、重庆等地的同志,在国统区坚持斗争,写了很多好作品,演了很多好戏。那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国民党特务盯得很紧,但他们照演、照写,很了不起。当时,蒋介石很生气,指责专管宣传的头目说:‘为什么共产党能把文艺界那么多人拉过去,你们一个也拉不过来!’解放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解放初期,远居美国的曹禺、老舍和在日本的冰心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马上想办法回来。他们不在乎放弃在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像吴祖光、钟敬文他们从香港回来的,就多得很了!这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大量作家跑到外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爱伦堡、阿·托尔斯泰都走了,高尔基也到国外住了好些年才回到苏联的。”

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残了左腿,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有着切肤之痛。当年,老舍先生在美国已创作出《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作品。1949年他应周总理邀请回国,满怀热忱地创作出《龙须沟》、《茶馆》等,尽心尽力地繁荣新中国文艺事业。即使如此,在“文革”中仍受到残酷折磨,他的笔已无所适从,不堪屈辱的老舍被逼得投太平湖!而书香一脉、奉行“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的吴祖光,年轻时不仅创作出《风雪夜

张学良在物资、财政上对陕北红军的援助

○ 张友坤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的长征结束。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蒋介石调动30万大军进逼西安，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和红军作战，结果逼出了“西安事变”，震动全国，影响世界。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陕北中央红军在物资、财政方面的具体援助，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或不具体，现将一些具体援助事件简述如下：

一、是张学良出资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到苏联学习。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与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宋子文的同学，张学良的好友、牧师）有一次见面时，董对张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即毛岸英与毛岸青兄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答应照办。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

归人》、《正气歌》等声震剧坛的作品，重庆谈判时还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一时全国几百家媒体竞相转载，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与文化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他与父亲吴瀛一起把家藏的241件文物（其中大部分为国家一级文物）统统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然而，后来竟为了几句针砭时弊的话，被发配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多年，“文革”中又被大摧残，令人欲哭无泪，扼腕长叹。

夏公说：“历次极左运动整知识分子，文艺界受到很大的伤害。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文艺界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拥护改革开放，创作了许多新题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

后由李杜通过各种关系，为其办好出国手续。经香港、西贡、孟买等地，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被送往苏联驻法国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亲自到巴黎接他们的康生。1937年初，康生送他们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历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但是张学良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张友坤 钱进 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91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

二、是张学良送的慰问品救了邓小平的命。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已与中共达成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秘密协定。张学良不仅想出各种办法，送给红军枪支弹药、法币、银洋，而且东北军67军协助红军打胜“山城战役”。张学良还送给红军各种各样的慰问品，也正是这些慰问品中的罐装炼乳挽救了正患重病的邓小平。

1991年的一天，杨尚昆在回忆西安事变时，对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那时在甘肃庆阳一带，

人动辄把自己看不惯的作品，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其他什么帽子，作家的创作生命受到损害，这对繁荣文艺事业十分有害。至于有个别人跑到外国只是个别人的事，自有他的原因，不能代表整个文艺界。很多人没有走，他们起码是爱国的。出去的也应弄清情况，万勿一棍子打死。说文艺界是‘自由化的重灾区’，我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个极严肃的政治概念，不能想扣帽子就乱扣！执政党要珍惜作家的创作生命。”

坦荡夏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在党的总书记面前仗义执言，挺身而出肩负起保护文化人的重任。■

（责任编辑 萧 徐）

你爸爸得了伤寒,非常厉害。他已经昏迷不醒了,什么东西都无法吃,吃一点东西就会把肠子戳破,只好煮点米汤喂他。正好那时候张学良和我们搞统战,派他的副官来慰问红军,送来两车慰问品,有吃的,还有香烟和其他物资,其中一些罐装炼乳,你聂伯伯(即聂荣臻)决定,把这些炼乳全部给小平,全靠这些炼乳,救了你爸爸的命。”(毛毛《我的爸爸邓小平》,第38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三、张学良资助大批款项支持红军渡过难关。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在肤施(今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举行会谈。

周恩来谈到许多国内国际方面的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苏联援助中国抗日、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等问题,周的精辟见解,使张学良心悦诚服。除此之外还达成六项具体协议。“张学良对会谈表示满意,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红军20万元法币。”(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第52~5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1936年11月底,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款项开始汇出,但因“苏联巨款至中国大城市之银行,再转陕甘送到红军手中绝非易事”,第一批汇款到达时已经是12月上旬了,第二批汇款1937年2月才到,因此,为解燃眉之急,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仍不得不又从张学良那里再借10万元以救急。中共和红军得张学良帮助之大,可想而知。(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40~741页,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四、1936年10月5日,张学良在西安会见叶剑英、潘汉年。5日在张学良与叶剑英会谈中,叶剑英根据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给解决一万套棉衣的要求。张学良表示,借



1936年12月,张学良在“九一八”国难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

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只是不便送往红区,提出可安排车队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半路取走,叶剑英对张学良如此爽快和机警深表钦佩。

同日,叶剑英、潘汉年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张学良的会面情况:‘已见毅(张学良化名李毅),政治方面说到,军事方面亦少(稍)说到,明天将继续’,‘款可日内拨5万元左右,大数难办,请速电王明讨论具体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13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0月10日,“叶剑英派刘象三给中共中央送去5万元借款。”(同上)叶剑英与潘汉年电告毛泽东:“拟定王立人留省主持交通,刘象三携5万元十一日动身,请在照八寺接他。”(同上)

10月31日,中共中央将蒋介石到西安大谈“匪不剿灭决不抗日”的情况上报共产国际的同时,也告诉苏联方面:“红军主力一般说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决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质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张友坤、钱进、李学群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65页,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

“据中共中央报告说,中共至此已向张学良借款达60万元。但甘北寒冬已至,除黄河以西近

六万红军每日所需之大量粮食、弹药和药品的消耗外,仅解决棉衣一项,即需耗费甚巨。难怪洛甫(即张闻天化名)心急如焚地再三致电共产国际,声称:“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死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同上)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陕北红军的困难程度。

11月8日,叶剑英回到保安。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到保安城外迎接。叶剑英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14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五、1936年12月15日,张学良派张政枋携同粮秣处秘书孙东垣(共产党员)“到陕西渭北耀县、富平两县慰问红军。于当日上午11时到耀县粮秣处补给所,午饭后由所长田道义引导到耀县红军供给部,把携带来的白金龙铁筒香烟30筒、牛肉罐头20箱、饼干25箱交给红军供给部王部长,并向红军进行慰问。大意是说,红军被蒋介石逼迫离开江西瑞金根据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过雪山草地,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此地,张副司令对大家非常关心,因他有事不能亲自前来,叫我代表他向诸位致诚恳的慰问。……当日下午8时45分回到西安。16日上午,向张学良汇报慰问红军情况和经过,并转达红军的感谢诚意。”张问到红军生活情况,张政枋说:“他们服装不足,缺少棉衣鞋帽,都吃地方粗粮,官兵有些不消化,缺少医药等物。张学良当即就说,把西安城附近的东北军部队的旧棉衣鞋帽和粮秣处在各地的存粮及军医处药品送给他们一部分,以度时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第374~37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

陕北地瘠民贫,筹饷极度困难,使刚到陕北的红军缺吃少穿,天寒地冻之时,不但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戴着单帽,而且没有像样的宿营地,只有少数年纪大的人,如谢觉哉、董必武等才能暂时睡在尚无屋门的窑洞里,年轻战士也只能露营于野地里。此时此刻,张学良向中央红军伸出援助之手,可谓雪中送炭。

张学良何以如此?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已有明确答案。他说:“像那万里长征谁能领导?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领导。让我们去领导,早把

部队带光了。而他们经过长征之后还有很强的战斗力,一连三个战役(即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消灭了我近三个师的兵力,其中两个师长阵亡,数千官兵被俘,像这样一支坚决抗日的部队为什么要消灭他们?”(《张学良口述历史》(未刊稿。))至此,他与蒋介石坚持的“安内攘外”与自己主张的“攘外安内”之争已无法化解,最终爆发了“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自传体遗著》中称:“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地讲,我可以讲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做特务的工作!

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第174页,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出版)

可见,这位慷慨无私的雪中送炭者从各方面援助红军,不仅仅是一般的出于人道和个人私情,而是出于民族大义,是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萧 徐)

本刊公告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2010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免费挂号邮寄,汇款地址见本刊目录页

本刊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序

○ 程兆奇

我和金大陆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打乱秩序的“革命”喧嚣已经过去,社会重新回到了比十七年更甚的压抑和沉闷的轨道,前程茫茫,任何向往都成了不切实际的“梦想”。由于我们生长的时代自始就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环境,对怎么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也一片茫然。但渴望自由的心火并没有熄灭。当时金大陆写了不少小说、诗歌,具体内容和词句今天已不复记忆,对未来憧憬的印象则至今犹存在我的脑际。那个时代极度贫

乏,惟有人力无法改变的“光阴”可以恣意挥霍,我们在一起不知聊过多少个日夜。回想起来,金大陆立志把身经的时代写下来的想法就是在那时种下的。以后大陆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这一想法从未动摇。这些年大陆每当发现罕见的新材料,或采访重要的当事人,都会及时让我分享,不过我从未听大陆谈过为什么他要持久坚持研究文革。我想大陆的原动力应该和大陆在文革中的特殊遭遇和感受有关。这一点有必要稍作说明。

文革在它结束后的不久即被定性为“灾难”,这是1949年以来所有政治运动中不留尾巴彻底否定的惟一例外。今天对文革的多样看法固然是因为“伤痛”的淡忘,更重要的还是随着距离的拉开,可以较容易从广阔的视野中看到文革的不同面相。即使从灾难着眼我们看到的与以往也已有很大不同。比如文革和十七年,是意外的歧出还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或者说十七年是不是“理想国”,今天的认识都远较当年丰富。但无论如何,文革对我们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确实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在这个巨大灾难中每个个体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的情况当然会有不同,大陆的手足之亲直至文革后期仍遭飞来横祸,可以说他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民族是真正称得上患难与共的。所以,大陆致力于文革研究不同于对待一般的“学术”课题,当然更不是闲情逸致式的兴趣。

我在这里特别交代大陆的“家国之痛”,是想说明为什么大陆本来完全有资格和理由像时下海内外大多数有关著述一样对文革作批判性的反省,而呈献给读者的却是一部“学术”型的专书。

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各种流派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

但万变不离其宗,研究历史总还是要以真实的人事为对象,总还是以求解真相为目的。即使认为史料不能摆脱记述者的主观因此真实本不可知的极端主张,也不可能放弃求真的努力,否则便与史学无关。金大陆近年主要是通过广征史料来梳理史实,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但大陆选择这一方向在相当程度上更是有感于相关著述对史实的轻忽。

文革是我们及身的时代,可以让我们有亲切的体会,这点对我们认识文革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但从另一方面说,“亲历”既不能保证记忆不误,也不能保证观察无偏;有时因情所系反而会遮蔽理性的眼光。大陆所举文革时期上海是否使用过“肉票”的讹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所以主有者行诸笔墨时便毫无犹豫,理所当然。其实文革未用肉票记载明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中就有现成答案。这一点最可说明:一、束书不观但凭印象的不可靠;二、误记已成常识;

三、因此,传达正确的知识就有了格外的必要。说到志书,本书“人口史”、“经济生活史”等章节的有些结论多有迳援志书之处。我想大陆在这点上所取的宁失于“浅”勿失于疑的态度,正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写史者的当取态度。我说的“浅”不是指“义理”上未作深论,作为社会生活史的一种,大陆此卷和全书一样,主要是叙述各个时期和各类群体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做理论上的总结,或借“社会生活”之酒浇自己的块垒,我说的是大陆对上海文革史料的掌握不在任何人之下,所叙相当部分内容的第一手材料都曾经眼,但在援引根据时大陆尽可能以新修志书为据,未作繁复征引。我想除了尊重前人劳动成果之意,大陆的考虑主要是志书取材多为官方文献(官私记录的信疑不可一概而论),修订也有较严格的程序,在知识的准确性上相对较高。这在“炫博”成为时尚的今天,大陆这样的朴实作风比他无征不信的态度更为难能可贵。

除了上述“有案可稽”的章节,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如“上海红卫兵大串联”、“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野营拉练”等都由大陆从广泛史料的耙梳中第一次概括。这些部分最见搜寻之功,相当不易。也许在“过来人”看来,小报、毛像、拉练……即使不说耳熟能详,至少并不陌生,但就认识“全面”而言,通过信实证据建立起来的史实毕竟不是一己体验或道听途说所能及。这里所说的“全面”既是指来龙去脉的全貌,也是指反映实情的深入。在此不妨举书中一例以为证明。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文革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我们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实是实情的写照。大陆通过当时市革会政宣组的《政宣简报》等“内部文件”却告诉我们,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贬斥的时期,居然仍有人以盈利为目的贩卖宣传革命的小报。如果不是深掘材料,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个与外表全然不同的真相。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陆以“非常与正常”作为这部叙述性作品的主题的用心。人类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静止时期,所谓“死水一潭”、“天翻地覆”,不过是形容变动不居的人类社会的变化大小而已。所以,如以十七年为“正常”,文革虽是“非常”,也只是“常”中之变的较激烈时期,而非完全逸出常道的“反”“常”。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

到,“天下大乱”的文革“非常”期,不仅国家没有分崩离析,众生的“社会生活”也在照常进行,其原因正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机制还在“正常”运转。其实不仅是社会生活,从最大处说,文革和十七年,国体、政体没有变化,领导阶级没有变化,经济体制也没有变化。……鸟瞰整个共和国史,如以十七年为“正常”,毋宁说改革开放才是相当程度上的“非常”,而文革则是其来有自,变中有常。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文革不是“非常”,和沉闷的十七年比,文革的大起伏当然是“非常”,我只是说文革的“非常”和十七年的“正常”实有一脉相连的关联。所以大陆以“非常与正常”名题确是一个有洞察力的概括。

本书是金大陆研究文革的第一本专书,对大陆涉猎的上海文革的广泛方面而言只是一个局部。金大陆正在着手和已列入计划的工作,最让人期待的是他和上海研究文革的“两金”中的另一金、复旦大学的金光耀先生合编的上海文革史料汇编。这个史料汇编以专题结集,对利用者相当方便,但这还不是它的最大特点,它的最大特点是凡与上海文革有关的有价值的材料都在收编之列,没有“画地为牢”,预先设定规模。这样开放的结果,将来究竟会编成怎么样的一部大书,实难逆料,从已分门别类的专题看,编出数十卷应该不在话下。史料汇编之外,同样十分有价值的是文革中炙手可热的王、张、姚、徐(景贤)的年谱长编。“长编”与一般年谱的不同在于征引原材料;而大陆所编的不同,在于大量引用的公私文献不仅是“第一手”,而且其中的相当部分尚未出版甚至尚未印刷,从从未为人援用的角度说,称得上是“珍本秘笈”。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金”的工作尤其是大陆的工作对上海文革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大陆命我作序时希望我能就自己对文革的心得作一篇“长篇大论”,考虑再三,觉得谈不出既有价值又符合“主旋律”的看法,而且借题发挥也未免不敬,所以就以预告也是预祝大陆的新成就作为这篇小序的结句。■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我对反右起因的解释

。朱正

徐贲先生著《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有一篇《“反右”创伤记忆和群体共建》，论述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事件。谈到此事的起因，书中说：

对反右起因现在有两种不同解释，一是毛泽东早就计划的“阳谋”；二是“先无此意，后不得不为之”。后一种说法是官方对反右的说法。（第336页）

此处设有一注：

对反右起因的两种不同解释可以用李慎之和朱正的分歧为例子。朱正在他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对此有所论述。（第380页）

注释里提到的“李慎之和朱正的分歧”，而在相关的正文中对分歧双方意见所作的概括却过于简略，也不够确切，我作为当事的一方有必要再详细说一回。

毛是在什么时候决心开展那一场反右派斗争？李慎之先生和我两人的意见不一样，曾经有过一次交谈，清楚表明了各自的意见。我以为他提出的是一个重要的、有影响的反对意见，我不能视而不见，不能回避过去。于是就在我那本写反右历史的书的“结束语”里加写了一段。“结束语”第五条原来是反驳赫鲁晓夫的：

五、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早已有了引蛇出洞的预谋，整风鸣放不过是为计划中的反右派斗争作准备。赫鲁晓夫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这当然是一种怀有敌意的情绪化的评论，把本来很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抹

煞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

在这一段的后面，我加写了这样两段：

国内一些研究者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的理由是：1957年1月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出现了后来反右派斗争一些辩论的题目、一些政策和策略。例如，他讲了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的怪议论，涉及共产党能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成绩是不是基本的，对肃反运动的估计，对统购统销的估计，对合作化的估计。毛还谈到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唱对台戏的问题，以为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里的一些提法都出现在反右派斗争之中。不过，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时他就已经决心开展那样一场反右派斗争了。

反右派斗争要打击什么，要维护什么，这些在毛的思虑中当然不会是一时灵感忽然出现的。他不但在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相当完整地阐述了这些意见，更早像在几个月之前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也就讲过要足够估计成绩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却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在计划开展这场斗争了。就在这次省市委书记会上，在谈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时候，毛说，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剥的方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可见这时他还没有想到可以采用更加爽快的第三个办法，即给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可以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在1957年初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都想到了反右派（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可是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具体想到了要开展一场如同后来实际进行的那样的反右派斗争。所以，把他确定“引蛇出洞”策略的时间定在此时，似乎是稍早了一点。

李先生当然一看就明白：我这里所转述的“国内一些研究者”的说法其实就是他的说法。他完全不能接受我的解释。他2001年4月15日写给胡绩伟先生的信，后来加上《对反右派斗争史实的一点补充》的标题，编入《李慎之文集》之中，其中还是坚持“把毛决策的时间定在1957年1月27日他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信中说：

我以亲身的经历，再经过研究，肯定1957年发生的事是一场“引蛇出洞”的谋略。但是我知道这还不是大家的共识。几年前出版的，颇得好评的朱

正的《1957年的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就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猖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1997年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实际上是对朱正的反驳。

李先生的《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末尾注明的写作时间是：“1997年9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四十周年初稿，1998年9月，最后修改定稿”。我的那本书是1998年5月初版出书的，是在李先生完成这篇大文初稿之后。可知他是在修改定稿之时才加上反驳我的内容。下面这段话看来就是修改定稿的时候加写的：

……当代史家对此多有探讨，甚至有人说，这是毛主席4月30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5月15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讯，这才是形势真正的转折点。然而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其数。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



朱正与李慎之(右)

兴的可能还更大些。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不论是对付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还是对付中国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毛主席都是伟大的战略家。

这篇文章充分阐述了他的意见，只是很长，不能多引。有兴趣的读者最好一睹原文。现在还可以找到的是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思忆文丛·六月雪》。

李先生去世之后，我写了一篇《君子和而不同》纪念他，刊登在《随笔》2003年第5期上，主要内容就是讲我跟他的这个“分歧”。其中说：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李先生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对毛的基本评价。就这一点来说，他当然是对的，我也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评价。一个讲诚信的政治家，刚刚信誓旦旦地宣布“言者无罪”，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改口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呢？根据他自己说过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人们岂不是有足够多的理由来怀疑他原先的动机究竟有多少善意吗？不过我以为这同他有时也想作一点改善形象的努力并不是不相容的。

今天来回顾当年这一场“笔墨官司”，对于对方的意见，最好照引原文，而不要转述。转述难免有出入。你驳倒了转述的意见，并不就是驳倒了

论政的意见。即如我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李先生所作的转述和概括是:

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猖狂,他才不得不反击。

事实上,我书中的说法并不是这样简单。即如说毛本来的“好心”,我说的是:

人们从毛起草的5月16日指标中可以看到,他在下决心反右的时刻,仍然怀着听取党外人士批评以克服那些太刺眼的弊端的愿望。(原文从略)从这里可以看出,毛对于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意见,例如党与非党之间的墙和沟,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外行领导内行等,实际表示了接受。他说,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可见这时他一方面要反右,一方面还是希望消除一些整风鸣放中揭露出来的弊端。

即使说,他指示部属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善一下执政党的形象,总也可以算作一种“好心”吧。

至于我书中说罗隆基说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这些言论对毛的刺激,并不是出于我的分析或想象,而是引自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一书。李维汉当时是能够直接听到毛的反应的,所述应该是属实的吧。

(上接92页)条件。中国的吏治制度如不彻底改变,而求从根本上解决“做官发财”传统支配下的官场腐败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

陈独秀对中国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国民心理——“做官发财”是其一端——彻底绝望,故将希望寄托于“伦理之改造”即接受新伦理洗礼之新青年:“予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无论属何社会,隶何党派,于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怀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幸有一线光明者,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消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

陈独秀一代启蒙思想家致力于思想先行的社会改造方案,主张以“民主、科学”彻底改造国民的伦理思维,无疑看到了中国现代性改造最为关键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对传统政治伦理的彻底改造,拒不接受以现代世界普遍接受

至于徐文所作的转述和概括,把我的意见说成是“先无此意,后不得不为之”,就与我书中的论述出入更大了。“先无此意”的“此意”指的是什么?如果是说要打击知识分子,打击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民主党派(首先是中国民主同盟),那就不但不能说“先无此意”,而是久有此意了;如果说“此意”就是要开展一场后来实际发生的那样的反右派斗争,那么,在1957年5月中旬以前,恐怕还只能说是尚无此意的。至少,已有文献证明,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的那时,毛还没有具体考虑开展这样一场斗争。

徐文把我的说法提炼到这样一个“高度”,等同于“官方对反右的说法”,看来他还是比较倾向于赞同李先生说法的。不过我自己以为,只是他对我的意见的概括简单了一点,我的详细论述和官方的说法并不相同。

尽管我在这里对徐文提了一点异议,其实我很喜欢徐先生的这本书。它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许多见解我都深表赞同。即为这一篇,对为反右辩护的王绍光的反驳,我就极为赞赏。只是书中涉及我的这一处地方稍嫌简略,就摘抄一点相关材料写成此篇,以供徐著读者参考。■

(责任编辑 萧 徐)

的“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的政治伦理作为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而继续以“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现代时髦用语即“历史规律”、“历史的选择”——为权力正义性的基础而实行权力垄断,那么,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权力制衡的防范体系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而权力垄断的官场必然是腐败者发财致富的天堂。腐败政治宰割下的芸芸众生必然是在徒叹奈何的同时,养成对“做官发财”既痛恨又羡慕的心理:痛恨正在“发财”的贪官污吏,同时又在羡慕中梦想有朝一日,风水轮流转,我家同样发大财。于此政治机制中,纯洁青年不管其最初的理想多么高尚,一旦踏入仕途,仍然会像吸食鸦片一样染上“做官发财”的毒瘾,还会腐坏堕落,不可救药。■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做官发财”有传统

○ 张绪山

一个待解的命题

“做官发财”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士大夫所追求的仕途经济的核心内容。在两千余年的历史演化中，这一观念已浸淫为我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维定式，国民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新文化运动萌发的1916年，陈独秀以敏锐而深邃的眼光洞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独特观念，以其惯有的犀利笔触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陈独秀不愧为一代思想大家，寥寥数言，即将两千年来深藏于我民族潜意识中的“做官发财”传统的本相剥露出来。

发财之念，求富之心，乃人类各族所共有之本性，不独我民族所仅有，所不同者只是程度强弱而已。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独适于商贾，也适于其他阶层的逐利之人；不仅适于个别民族，而且也适于所有民族。“发财致富”是人类本能的欲望之一。今之国人不必否认我民族“发财”传统的存在。正如陈独秀所指出，“发财本非恶事，个

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新青年》《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44页）

诚然，将“发财”与“做官”联系起来，以“做官”为“发财”捷径而孜孜以求，历两千余年而不衰，确是吾国民性中最突出的特性之一，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此种观念至今犹蓬勃遒劲，生机盎然，与名闻寰宇的长城一样气势磅礴，雄伟挺拔，实为我民族发展史上的“奇迹”，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以今日眼光观之，两千余年中，将“做官”作为“发财”的终南捷径，而不以实业为追求“发财求富”的手段，实为我民族长期滞留于前近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而这一传统演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与民族心理以后，又反过来像幽灵一样死死缠住陋习负担极为深重的我民族身躯，成为阻碍我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极为恶劣的负面因素之一。

“做官发财”观念的要害是“做官”。陈独秀对于这一点认识非常深刻，批判极为犀利。然而，对于国人这一心理意识何以养成，其坚不可摧之生命力从何而来，如何从制度上铲除这一流传两千余年的病灶等等相关问题，他没有做出直接的回答，而将这个看似简单的命题留给了后人。

发财不得不走做官之路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乃是以农业

为立国之本。这个农本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简单再生产,它所追求的不是以扩大再生产来实现财富积累,而是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保持社会稳定。

这个以稳定为追求目标的传统社会,主要由士、农、工、商——所谓“四民”——四个等级构成。在这四民等级中,“士”与“农”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工、商阶级虽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需要,但并非最重要的因素。士、农之间的主要分工形式是“劳心”和“劳力”,农民则是供养“劳心者”的“劳力者”,其关系则表现为“治人”和“治于人”。“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顺序,正表明这四个等级在传统社会中的角色。

在传统社会,就致富之途而论,手工业和商业远较农业为便捷,中国古人并非不解此中道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前人的致富经:“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可以为证。但手工业和商业被认为是逐巧取利而受到歧视。孙叔敖说:“古者必有命(指爵命——引者)然后乃得衣缙丝而乘车马。”(《史记·循吏列传》)历代王朝明令禁止工商之人衣锦绣,相循沿袭,奉为惯例。所以,“衣锦还乡”之人是政治上的得意者,以工商致富的经济上的成功者并不能摆脱遭人歧视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商业规模的扩大,不同于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形式,往往冲击社会稳定,造成国之根本的动摇,很自然成为皇权专制王朝忌惮的对象,成为抑制和打击的目标。同时,小农生产养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心理,使工商积累的财富很容易成为下层民众攻击的目标。中国历史上被民间文化推崇备至的农民造反者的“劫富济贫”,不唯针对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而且也指向工商业者苦心经营积累的财富。在传统农本社会里,以工商之途致富,除了在皇权专制王朝重农抑(工)商的基本国策下遭受政治上的歧视,其本身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性。

因此,工商业经营者的出路似乎只能是设法进身官僚阶层,使本身财产成为合法财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则只能与官府勾结受其暗中保护,走官商勾结之路。投资官场的好处,首先是买官进入官僚行列,可以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借

助“升官”取得更大的权力空间,谋取更大的“发财”目标;其次,进身官僚阶层成为“劳心者”,自然成为优越的特权等级,在这种优越性的保障下,其“发财”便获得了天然的合理性。

儒家思想并不以发财致富为恶事。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曰:“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可不辞。”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圣人之徒看来,“做官”乃求“富贵”的正道,读书不以仕途经济为目标被视为不务正业。樊须向孔子问稼穡之事业,被孔子斥为“小人”,原因很简单,在孔子看来,读书的目标在于做官,而做了官,就有俸禄,“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儒家干禄之学主张做官发财。

儒家发财之道因其“义利观”而显得冠冕堂皇。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与“君子”、“利”与“小人”联系起来,同时也将“君子”和“小人”对立起来。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庶之徒也。欲知舜与庶之分,无他,利与义之间也”。儒家的“义”“利”之分,显示出对仕途“正业”的推崇,对商贾“末业”的不屑。后代儒者所谓的“商人重利轻别离”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情感伦理。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工商之人”很少得到正面的肯定,多半被视为精于算计的奸猾之徒。儒家圣人之徒耻谈以利致富,主张以“做官”求富贵,视“做官”为“发财”的正当途径,奠定了两千余年来读书人“做官发财”心态基础。

“做官发财”的家族驱动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宗法家族制度的存在。这种制度的突出特点,是血缘关系处于人际关系的中心。

这一特点表现在家族一面,就是家族成员与整个家族的牢固关系,家族子弟的命运也就是整个家族的命运。在中国社会,供养子弟读书是家族的头等大事;同样,个人行为对于家族负有一种天然的义务,一个读书人仕途经济的成功与否,与其说关乎个人前途命运,倒不如说攸关家族的兴衰成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等中国

传统语汇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强大而牢固的家族纽带关系,而个人犯法殃及家族的“诛三族”、“夷九族”,则从反面证明了个人与家族的“荣辱与共”。

在这种关系中,整个家族竭尽全力为个人进身仕途提供必需的条件,而进身仕途的个人则尽其所能为供养自己的家族做出相应的回报。身负整个家族重望的仕途之人,不能不为改变家族的现状而煞费苦心,十年寒窗苦读的士子一旦走上仕途,必求“升官发财”以改变家族的现状。这也可以说明,古往今来仕途得意的士子中,何以两袖清风的廉吏少如凤毛麟角,贪官污吏则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读书人不想在官场上堕落腐败,而又想对家族尽到责任,可以依靠实业经营上的作为来实现。但这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实业作为增殖国民财富的正常途径得到承认和法律保护,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丁文江是现代史上的一个典型例证。作为20世纪初中国学业有成的留学生,丁文江在回国后以其在地质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被公认为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但为了其家族的利益,不得不放弃学术而去从事经营煤矿公司的实业。他的兄弟丁文治回忆说:“他(丁文江)从二十六岁归国后开始在上海教书得到收入,立即担负赡养父母和教育兄弟的责任。从二十六岁到四十八岁,二十二年中……全家的重心在他身上,全家的经济的压力也在他身上。……当时他没有丝毫资本的收入,全靠劳心劳力得到的报酬。因此他不得不离开地质调查所,去创办热河的北票煤矿。现在想起来,我们家族对他全是罪人,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拖累可以有为的人下水的家。”丁文江之所以没有走传统的“做官发财”的老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毕竟是在近代工业化最早的英国接受教育的留学生,受实业增殖财富的现代观念影响巨大,对官场腐败具有本能的反感和厌恶;但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国已经初步具有以工商业致富的条件,使他不必要走“做官发财”的老路。而在皇权专制的农本时代,一个士子的前途只有两个:与贪官门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做官发财;如果不愿意在官场腐败,那么,他只有像陶渊明和郑板桥一样挂冠而去,归隐田园。

“做官发财”如何成为必然

1926年,郭沫若曾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这是郭沫若作为一位涉世不深的青年人的直率之言。古文字学家杨树达在晚年著作《积微翁回忆录自序》中自白:“余性不喜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救药,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绝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日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在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政权并没有从制度上阻挡住官场腐败,如果杨先生今日健在,还会补充一句“权力腐败非所语于近日官场”吗?当今小腐败分子多于牛毛,大腐败分子犹如过江之鲫,已是不争的事实。平头百姓对司空见惯的官场腐败,或徒叹奈何,或冷漠相对;权力当局于腐败浪潮的应对乏策,说明“做官发财”传统在我民族实为难以治疗的痼疾,而传统吏治制度实在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在这个传统面前,以往数十年惯用的意识形态手法,已经无能为力。

中国传统吏治何以不能防止腐败?其根源在于传统吏治的伦理前提“性善论”。“性善论”强调“人之初,性本善”,一相情愿地相信帝王“大公无私”的美德,相信君王趋向“仁政”的自觉性,对人性恶质的存在视而不见,从未提出“如果执权柄者怙恶不悛怎么办?”这种法治制度不可或缺的前提设问,从未正视官场对人性恶质膨胀的催化作用,使限制大小官员乃至君王恶性滋长的约束机制无从落实,官员腐败不可能在萌芽状态中被及时发现和遏制,而只能在腐败达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后,实施不得已的惩罚,以安抚沸腾的人怨。几年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被处决前说过一句老实话:“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够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换言之,不承认“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拒绝在整体上将整个权力集团视为潜在的腐败力量,从而建立高度灵敏的制度防范,正是贪官炼成的根本(下转89页)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施用勤译	58.00	8.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难忘一九五〇——志愿军入朝参战 60 周年图文实录	丁 伟	48.00	7.00
中国国情读本	中国年鉴社编	30.00	6.00
我这九十年——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	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	38.00	7.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三路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最后的皇族	龙翔 泉明	38.0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48.00	8.00
望九垓忆——一位老者的 20 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王光美私人相册	罗海岩编著	42.00	7.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38.00	7.00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著	32.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主编	148.00	12.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张闻天在 1935~1938	张培森主编	17.00	6.00
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张培森著	20.00	6.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	张 琦主编	48.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將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 22 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高岗传》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高岗的传记。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高岗曾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作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从陕北到东北再到华北，在不同历史时期，他曾先后任西北中央局书记；第一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在高岗进京担任计划委员会主席后一年多的时间，便背上“反党夺权”的罪名，落得身败名裂，自杀身亡的悲惨下场。

“高饶事件”亦称“高饶反党联盟”，是建国后党内斗争的第一个重大事件，高岗的死亡并未使得该事件平息，相反围绕着“高饶事件”的风波却再三发生，1955年5月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又演变为“彭高联盟”。

本书是作者磨砺了十五年的心血之作，力图拂去岁月的灰尘，还原一个真实的高岗。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作为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人、最主要的领袖，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爆发后直到1918年1月间做了大量的演讲和报告。本书收录的文章和报告不仅全面细致的展现了托洛茨基的思想脉络和重要活动，而且也对革命的意义和得失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不失为研究十月革命进程、细节和影响的第一手材料。

《西路军》西路军是党史上的一件大事，西路军西征的起因是什么？失败的历史原因有何复杂性？应当怎样评价他的历史作用？本套书完整、系统地记叙了西路军的悲壮征程。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本书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清楚地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理念的改变，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具体到中国，对于正在崛起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在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式、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2006年3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作者阅读了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对于人们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必要的；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是必要的。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苏医械广审(文)第 2010110222 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BestSound Technology 博声技术

系列新品隆重上市

BestSound Technology 博声技术提供了
三种技术以满足佩戴者不同需求：

- 言语环向追踪技术 Speechfocus
- 声音解析 2.0 Soundlearning 2.0
- 极速反馈终截器 Feedbackstopper



全数字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09 第 2460889 号

全数字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09 第 2460990 号

帮您远离“听得见听不清”的烦恼！

为庆祝西门子助听器新产品隆重上市，特别推出“2011 多彩生活
我心尽享”活动，免费试听试戴，全面体验新一代助听器的完美听觉感
受。选购助听器有精美礼品赠送。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西门子助听器

总部地址：北京 东城 东直门外大街 46 号 天恒大厦 5 层 (100027)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网址：<http://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服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 201004048 号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0 第 2460986 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0 第 2460987 号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业务范围：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三千元，300页出版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出版100本4千元，300页出版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月编辑合作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作品展示



出版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chubanfaxing.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 家史·家谱·回忆录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先辈遗文：先辈遗文集、先烈纪念集、家族先贤传、家史档案。
- 4、家史传记：家族百年史、家族大事记、家族老照片、家谱族谱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基本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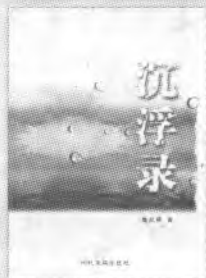
“个人文集、回忆录、自传”一般32开本，“家史传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内文黑白胶印，胶装或线装；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起，设计、排版与加印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相关说明

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北京客户上门服务。外地客户来电详询赠送样书。

老人出书，历史见证；家族出书，文化传承！

服务电话：**010-68920114** **68920399**
 单 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登陆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

1.

高瑜：唐大社怎样破坏党内民主
是时代的两种不同理解及其后果
公安工作“大跃进”
共产党是怎样“大跃进”的
精神控制是怎样控制思想的

2.

田国治：追忆关于强军的高点建议
田国治用是北的军史专家，一步
重要观点：建立现代军事制度
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
林林总总文化军事的总汇

3.

“国强民强”的福音和悖论
胡耀邦和胡耀邦手下的
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
胡耀邦的悲剧
李锐：胡耀邦的悲剧
李锐：胡耀邦的悲剧

4.

对宪政的一次精英大评议
李锐：何谓有宪政大学习
胡会政军感到解嘲
李锐：何谓有宪政大学习
从胡会政军感到解嘲

5.

文件重建：在报刊上展开批评
科学家与公民社会“共识”
何方：全球化的几个问题
世界会议与北京共识不同因此生态
苏东国家领导人选择的歧路

6.

李厚泽：胡文安文化思想
田国治：我军的现代化进程
“国殇”也发生在胡文安
李锐：胡文安文化思想
田国治：我军的现代化进程

炎黄春秋 杂志

2011年 再度扩版

独立 权威 真实 厚重

全年 96元

邮发代号：82-507 订购热线：010-68532048 68539058

全国邮局网点均可订阅 也可以通过邮局或银行直接向本刊订阅邮购



《炎黄春秋》杂志十年精选本 (共二辑) 隆重推出

《炎黄春秋》杂志独立、权威、真实、厚重，在国内读者群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十年精选本是2000年—2009年10年“亲历记”专栏所刊文章的精编集
著名历史学者吴思主编，为你揭秘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中国当代史

精选本分为两辑：《走向1949》和《1978纪事》，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后，所记录的内容偏重平凡人的视角，但也有对重大人物的审视；既反映出了当时普通的家庭生活，也展现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事件；不仅有原汁原味的纪实成分，更有还原历史的解密文字。



文章都是当事人自己亲历的活生生的历史，内中包括我在延安被“抢救”，随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日子，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宋庆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等许多著名篇章。

《亲历记：走向1949》定价29元 邮费6元
《亲历记：1978纪事》定价29元 邮费6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邮购地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咨询电话 010-68532048 68539058

解读“韬光养晦”战略

政治与学术：一篇文章的遭遇

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纪实

小说《刘志丹》的三次被禁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考察

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